

学术研究

XUESHU YANJIU



3

一九六六年

吳晗同志在史学领域里是怎样同无产阶级爭夺年青一代的?	林远輝 (1)
吳晗同志的历史剧主张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	饒芑子 黃佩玉 吳世楓 (8)
批判“清官”论的几种错误观点.....	史向新 (16)

笔談「**让步政策**」問題和「**清官**」問題

彻底揭穿“清官”的假象.....	王 起 (23)
漫談历史上的所謂“清官”.....	吳三立 (25)
从阶级本性看清官.....	李日华 (27)
——专就明代来談	
清官是人民的要求，不是統治者的美化.....	刘 节 (31)
評所謂“让步政策”.....	謝仰虞 (36)
列宁著作中有关統治阶级“让步”的言論应该怎样理解?	唐陶华 (39)
有关“让步政策”的两个問題.....	許宏然 (44)

政治统帅学术研究	黃 先 (51)
突出政治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要求	曹泽华 (57)
学习毛主席关于人民战争战略战术思想的体会	左 群 (63)

突出政治，在革命化的道路上前进	叶 浩 (68)
学习毛主席著作 改造人生观	熊茂生 (72)

壮丽的革命英雄颂歌	朱继琢 謝中征 (77)
——《欧阳海之歌》的时代意义	

试论所谓“中间人物”和中间状态人物的区别	吳文輝 (83)
----------------------------	------------

蹲点
通讯

和农民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	詹文豹 黃友林 (91)
史学工作者必须面向工农.....	余炎光 (95)

动态

广东省社联举行工农兵座谈会批判吳晗同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 (48)
广东学术界批判翦伯赞同志的反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点 (50)

吳晗同志在史學領域里是怎樣同 無產階級爭奪年青一代的？

中山大學歷史系四年級學生 林遠輝

吳晗同志的《海瑞罵皇帝》鼓動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向黨和社會主義進攻；《海瑞罷官》則鼓勵被人民“罷”了“官”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不屈服，不喪氣，失敗了再干”。越來越多的材料說明：吳晗同志在政治思想上堅決與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站在一條戰線上，一個鼻孔出氣；在學術上堅持反動的資產階級學術觀點，反對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為研究歷史的指針；在培養史學人才的路線上堅持資產階級的道路，反對黨和毛主席制訂的“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教育方針，同無產階級爭奪年青一代，妄圖培養資產階級的接班人，以實現資產階級夢寐以求的“和平演變”的目的。因此，在進一步批判吳晗同志的《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的同時，還有必要揭露和批判吳晗同志在史學領域里是怎樣同無產階級爭奪年青一代的。

鼓吹“論從史出”，引誘年青人走資產階級的歷史研究的老路

解放以來，隨着我國社會主義革命的深入發展，許多史學工作者都認識到史學領域中也同樣存在着尖銳的、激烈的階級鬥爭。如果“沒有正確的政治觀點，就等於沒有靈魂”^①。從而感到必須努力學習和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研究歷史，寫好歷史，使歷史研究真正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否則，便會在浩如烟海的史料面前，迷失方向，脫離革命的軌道，被資產階級的唯心史觀所俘虜，使歷史研究變成為資產階級服務的工具。“以論帶史”便是在這種歷史條件下被正式提出來的。據我們的理解，“以論帶史”的含義就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為歷史研究的指南，運用其立場、觀點和方法，在詳細占有史料的基础上，“加以科學的分析和綜合的研究”，即對史料進行“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批判，從中引出正確的結論來，做到革命性和科學性的統一，而不致變成堆砌史料，流於“客觀主義”的歷史研究。這是完全正確的。毛澤東同志早就教導我們：“學會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認真地研究中國的歷史，研究中國的經濟、政治、

① 《毛澤東著作選讀》甲種本，下冊，第472頁。

軍事和文化，對每一問題要根據詳細的材料加以具體的分析，然後引出理論性的結論來。”^①

可是，“以論帶史”提出來以後，卻遭到了資產階級學者的反對，特別是遭到吳晗同志和翦伯贊同志的瘋狂的攻擊，他們誣蔑它是用原則去套歷史，是“形而上學”，“帶有很大的片面性”，是“不用腦筋的教條主義的研究方法”，如果“不歪曲馬克思主義”，便要“歪曲具體史實”，叫喊“以論帶史”“必須廢除”，等等。

吳晗同志惡毒地歪曲“以論帶史”的真實內容，胡謔什麼“以論帶史”，“顯然從字面看，先講理論，後講史實，結果是論多史少，甚至是有論無史，把個‘帶字’改為‘代字’，成為‘以論代史’了。”（《如何學習歷史》）吳晗同志對“以論帶史”作了無恥的歪曲和攻擊之後，還拋出其所謂“論從史出”的資產階級綱領來。

吳晗同志的“論從史出”是什麼樣的貨色呢？

他說：“史和論應該是統一的，論不能代替史，論在史之中，不是在史之外。因此，就應該運用正確的方法，掌握大量的、充分的、可信的史料，加以合理的安排，通過對史實的講述，把觀點體現出來。……只要把真正的史實擺清楚了，觀點自然就出來了，所以我們說：‘論從史出’。”（同上）這完全是一種反馬克思主義的資產階級學術觀點。從這個觀點出發，吳晗同志還告訴我們年青人，學好歷史的答案只有兩個字：“念書”，“只能從書本上得到知識”；他還特別強調要“先學歷史後學理論”，（《關於研究歷史的幾個問題》）也就是要我們不去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只是從故紙堆到故紙堆，從史料到史料，走資產階級的歷史研究的老路。

按照吳晗同志這種說法，我們只要鑽進史料里，掌握大量的史料，再把这些史料擺清楚就行了，“論”就從史料里出來了，史和論就統一了。我們要問，按照這種做法，只是從史料到史料，何來“論”，又何來“史論統一”？找史料，擺史料，述史料，還不是堆砌史料，還不是“客觀主義”？這與“史學就是史料學”的謬論有什麼區別？這種“論從史出”，就是反對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來從事歷史研究，不是很明顯嗎？

如果說，吳晗同志在這裡，還沒有直接說出反對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來進行歷史研究，那麼他在另外一個地方便直截了當地說出來了。他說：“現在有些人卻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观点來代替，作者自己的看法呢？很抱歉！沒有。這樣，作者把自己置於寫作立場之外了，因而讀者只能看到經典作家的意見，卻看不到作者的意見了。我們要問，你既然沒有意見，為什麼要寫這麼一大堆，浪費了紙墨，還浪費了讀者的時間！”（同上）

這段話說明了，吳晗同志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多麼的深惡痛絕，對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來從事歷史研究的史學工作者是多麼的不能容忍啊！

吳晗同志叫史學工作者不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來“代替”作者自己的看法，就

^① 《毛澤東著作選讀》甲種本，上冊，第208頁。

是不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历史。試問：离开了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呢？

毛泽东同志教导我們：“就世界观來說，在現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或者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或者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① 吳晗同志既然反对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研究历史，而鼓吹要用作者“自己的”立场、观点去研究历史，这就当然只能是用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去研究历史了。

为了反对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从事历史研究，吳晗同志还不择手段，通过古人的口，发泄他对当前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风的不满，恶毒地咒罵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是沒“气节”、沒“骨头”、“无本之人”、“讲空虛之学”，（《爱国学者顧炎武》）妄想恐吓人們不敢去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

其实，吳晗同志的这一套并不新鮮。几十年前，非常賞識吳晗同志的“大才”的胡适，早就这么說，这么做了。胡适公开要人們“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义”，并說：“我这里千言万語，也只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我只希望尽我的微薄的力量，教我的少年朋友們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胡适：《介紹我的思想》）可以看出，吳晗同志完全继承了胡适这一反动衣鉢。不过吳晗同志說得更加狡猾、隱蔽罢了。

可見，吳晗同志的“論从史出”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的“史学就是史料学”的变种，是资产阶级反对用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历史研究的指南的“客观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翻版。其目的是要把社会主义时代的史学研究引导到資本主义的方向上去，并且企图蒙騙青年学生接受资产阶级的唯心史观和资产阶级的那一套治学方法，使之“和平演变”为资产阶级的接班人。

鼓吹脫离政治，脫离实际，脫离群众，钻古书堆，反对党的教育方針

为了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結合”的方針，培养“既有政治觉悟又有文化的、既能从事脑力劳动又能从事体力劳动的人，而不是旧社会的只专不紅，脫离生产劳动的资产阶级知識分子”^②，号召我們突出政治，到实际斗争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接受三大革命实践的考验。由于貫徹和执行了这一教育方針，所以教学质量大大提高了，人的精神面貌大大改变了，学校里的政治气氛空前浓厚起来了。可是，吳晗同志坚决反对党的教育方針，妄图把我們拉回到资产阶级的老路上去。

几年来，吳晗同志发表了很多文章，到处和党的教育方針唱对台戏。其中重要的

^① 《毛泽东著作选讀》甲种本，下册，第504頁。

^②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1958年9月19日。

有：《学习祖国伟大的历史》，《如何学习历史》，《漫谈资料工作和研究工作》，《关于研究历史的几个问题》，《历史教材和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大家都要补课》，《古人读书不易》，《古人的业余学习》，《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史学家万斯同》，《爱国学者顾炎武》，《谈迁和〈国榷〉》，《灯下集前言》，《学习集自序》，《史家谈治史》，等等。在这些文章中，他极尽攻击、诽谤的能事，诬蔑我们因为参加了政治运动，参加了生产劳动，便读书读得少了，以致青年教师“连工具书也不会运用”，（《大家都要补课》）“历史系毕业生连中国历朝的順序都说不清”，（《关于研究历史的几个问题》）较好的毕业生连乾隆是谁都不知道，“瞠目不知所对”，（《历史教材和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还“怎么能谈上研究历史”？（《关于研究历史的几个问题》）同时，他还给我们指出了一条直接与党的教育方针相对抗的资产阶级的治学道路：

一、个人奋斗，“钻到古书堆里去”，象古人那样，读书读得“连眼睛都读肿了”，“连睡眠都忘记了”，“从清早到黑夜，全部时间都用在读书上”。（《史学家万斯同》）

二、要“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案前书”，象万斯同那样“没有别的嗜好”，象宋濂那样把读书看做是“最快乐的事情”，象谈迁那样“国亡后更一意修史”，（《谈迁和国榷》）象他自己在“一·二九运动”前后那样脱离火热的革命斗争，以“惊人的毅力，辛勤的劳动”，钻到“浩瀚的明史资料中去”。（《史家谈治史》）

三、只要多读、多抄、多写，“越多越好”，就能“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从而解决问题”，否则，“离开念书，学历史就不可能”。（《关于研究历史的几个问题》）

四、要死背硬记，要象万斯同那样读到“能背诵的地步”，“随便举一人一事问他，都能详述始终”，（《史学家万斯同》）起码要连京戏里的“太师爷”的来历和不同时期的意义都懂得，（《如何学习历史》）“当人家提出一个问题时，你就能告诉他去看什么书”。（《关于研究历史的几个问题》）

总之，吴晗同志给我们指出的道路是“用一辈子的时间”读书、抄书，整理资料，写出文章，一切只要按照“论文——研究——论文”这一公式去做就行了，别的事不必去理会了。也就是说，社会活动不必参加了，政治不必过问了，立场不必改造了，思想不必革命了。

很明显，吴晗同志要我们走的是脱离政治、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钻古书堆，成为“旧社会的只专不红的、脱离生产劳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道路。

毛泽东同志谆谆告诫我们：“除了学习专业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①他又说：“知识分子从书本上得来的知识在没有同实践结合的时候，他们的知识是不完全的，或者是很不完全的。知识分子接受前人的经验，主要是靠读书。书当然不可不读，但是光读书，还不能解决问题。一定要研究当前的情况，研究实际的经验和材料，要和工人农民交朋友。……知识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72页。

分子如果同工农群众結合，和他們做了朋友，就可以把他們从书本上学来的馬克思主义变成自己的东西。学习馬克思主义，不但要从书本上学，主要地还要通过階級斗争、工作实践和接近工农群众，才能真正学到。”^①

毛主席这些教导，只有我們下到农村以后才格外感到亲切。在沒有下乡以前，我們有些同学对于“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一真理，只有一般的概念，毫无实际的体会，以致对吳晗同志、翦伯贊同志极力美化帝王将相、丑化劳动人民的反动观点，熟視无睹；有的同学甚至还贊同他們的意見。可是我們下到农村，和农民群众共同生活一段时间以后便不同了。我們看到貧下中农为革命而种田的崇高理想；这种理想表現在行动上，便是热爱集体，一心一意搞好生产，修沟渠，建水庫，开荒地，管作物，从早到黑，不管寒风、烈日、暴雨，日日如是。他們坚决同自然作斗争，把大批大批的粮食、原料支援給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設，而自己却省吃俭用。只有到了这时，我們才真正認識到劳动人民的伟大，而所謂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和他們比起来，只不过是“滄海一粟”。我們更看到农村尖銳复杂的階級斗争，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广大貧下中农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同資本主义势力、階級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捍卫了农村的社会主义陣地。这使我們真正懂得了劳动人民是历史的創造者，階級斗争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懂得了“沒有貧农，便沒有革命。若否认他們，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們，便是打击革命”^②的道理，从而使我們对那些污蔑貧雇农“一辈子沒有什么成就”，不應該把他們写在历史上的謬論，感到莫大的愤怒。此外，我們还通过訪貧問苦，听他們讲“家史”、“村史”，讲地主階級的剝削史、发家史，才更清楚地認識到剝削階級的罪恶，才知道历史上的一切帝王将相都是剝削者，應該罵，應該反。我們在“三同”中同貧下中农交了朋友，培养了我們的階級感情，我們迫切感到必須为农民写历史，大写特写“四史”，用以了解过去，認識現在，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所有这一切，使我們認識到：

第一，时代賦予我們的任务是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为工农兵写历史，使历史研究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如果不熟悉工农兵群众的生活，不通过斗争实践，不通过和他們的結合，改造自己的立场、观点，不把立足点“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③，就不可能和工农兵群众有共同的感情、共同的語言，就不可能写出他們需要的历史，就不可能完成这个艰巨的历史使命。

第二，一切正确的認識来源于实践。我們从书本上得到的知識，在沒有和实践結合以前，还只是一般的概念、模糊的东西，还不是我們自己的东西。要想得到正确的認識，使书本知識成为自己的东西，只有到革命实践中去。

① 《毛泽东著作选讀》甲种本，下册，第503—504頁。

② 《毛泽东著作选讀》甲种本，上册，第13頁。

③ 《毛泽东著作选讀》甲种本，下册，第262—263頁。

第三，馬克思主义是在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中不断总结、丰富、发展起来的。我們也只有参加这一革命实践，才能把馬克思主义学到手，才能成为真正的馬克思主义者。

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話去做，就会成为又紅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照吳晗同志所指点的去做，就会成为资产阶级的接班人，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歧路。

难道这样的教訓还少嗎？毛主席說：“許多专门从书本上討生活的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共产党员，不是一批一批地成了反革命嗎？”^①我們必須吸取这个教訓，必須坚决反对吳晗同志鼓吹的脱离政治、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钻古书堆的资产阶级的治学路綫。

鼓吹成名成家，用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毒害年青一代

学习历史，研究历史，是为了什么？究竟是做一个革命的史学工作者或从事其他工作的革命工作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还是象一切封建文人、资产阶级学者那样，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作为成名成家的資本？也就是說，是要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还是做资产阶级的接班人？这是摆在我們青年面前的一个严重問題。

党和毛泽东同志指出，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生死攸关的問題，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計，千年大計，万年大計。培养和造就馬克思列宁主义史学的接班人，是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一个組成部分。所以，资产阶级也非常重視爭夺史学的接班人。他們最重要的武器便是千方百計散播名利思想，成名成家思想。他們企图用此来腐蝕我們青年的革命意志，使我們蜕化变质，变成脱离政治、脱离实际、輕視劳动、輕視群众而高踞于群众之上的、养尊处优的“精神貴族”，变成他們的接班人，实现他們复辟的幻梦。吳晗同志正是代表了资产阶级这一需要，在史学領域里和无产阶级爭夺年青一代的。

吳晗同志不断地向我們年青人說教：讀書、钻书堆的好处就是能“成为学者”（《古人的业余学习》），只要“认真地收集、掌握和研究資料”，就能达到当上专家的“目的”，“成为著名的历史学家”，（《史学家万斯同》）而且“讀的书越多”，“写的书也就越多，名气也就越大”，（《爱国学者顾炎武》）他还告訴我們：至于“成为学者”以后，“阶级成分变了，那是另一回事”，（《古人的业余学习》）就是說，只要能当上“专家”、“学者”就行，即使成为剝削阶级，成为资产阶级的接班人，也是无关紧要的。因此，他大声向我們呼吁：“历史知識宝庫的大門，对于每一个有心于发掘的人都是开着的”。（《学习祖国伟大的历史》）

为了使我們青年成为资产阶级的接班人，他还告訴我們青年要拜倒在资产阶级专家的脚下。他通过古人的口，宣扬对资产阶级专家要毕恭毕敬，“弓着身子，側着耳朵，听他教誨”，要“唯言是听”，只要能从资产阶级专家那里学得一点知識就行了。“别的便

^① 《毛泽东著作选讀》甲种本，上册，第19—20頁。

不理會了”，不必去管他是正確還是錯誤，千萬不能得罪他，否則，就學不到知識，成不了“家”。（《古人讀書不易》）這是一種什麼樣的師生關係呢？這是資產階級的師道尊嚴的、保持私人關係的師生關係。為什麼吳晗同志要鼓吹這種師生關係呢？因為在這種關係下，最便於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學者對學生灌輸資產階級思想，使學生無條件地接受他們的思想，變成他們的俘虜，變成他們的接班人。

吳晗同志一系列的言論和行動，在我們青年中產生了極其惡劣的影響。

就拿我自己來說吧，我也曾覺得吳晗同志的話有一定的道理，“書讀得越多越好”，認為在學習上應該如吳晗同志說的“強弩勝祖”。（《論歷史人物評價》）所以，我便在我校圖書館的一張照片上寫了這麼兩句話：“決以鑽地獄的精神，穩坐在这幽美的古筑中；愿做一葉小小的扁舟，漂蕩在这知識的大海上。”以示決心。有一段時間，我每天從宿舍至圖書館、教室，到膳堂，循環往復，做機械的“三角運動”。我拚命地讀書，做卡片，積累資料。發現一條新資料，宛如發現新大陸。我走路看書，乘車、搭船也看書，一分一秒都不肯輕易放過，害怕畢業後機會不再來。我把讀書看做最快樂的事情，最積極的休息。我忘記自己是一個共青團員，對集體，對同學漠不關心，認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還是讀書要緊。通過幾次下鄉，通過學習毛主席著作和向英雄人物學習，我才改變了這種狀態。我下定決心，“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迈步從頭越”，要從書本中走出來，永遠突出政治，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徹底清除個人主義思想，“以紅帶專”，走又紅又專的道路，使自己真正成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

小 結

吳晗同志鼓吹“論從史出”，否定馬克思列寧主義是歷史研究的指南，要用資產階級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研究歷史；鼓吹脫離政治、脫離實際、脫離群眾、鑽古書堆，反對黨的教育方針，要我們走只專不紅的道路；鼓吹成名成家，拜倒在資產階級專家腳下，要把我們培養成資產階級的接班人。這几部分是有機地聯繫着的。按照吳晗同志鼓吹的這套資產階級政治觀點和學術觀點做下去，資產階級不但不會絕滅，而且會死灰復燃。十分清楚，吳晗同志這套路線是同無產階級爭奪年青一代，妄圖復辟資本主義的路線。因此，我們必須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積極參加這一場偉大的興無滅資的鬥爭，徹底批判吳晗同志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治觀點和學術觀點，清除掉它對我們年青一代的毒害，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

吳晗同志的历史剧主张 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

饒芃子 黃佩玉 吳世楓

在一九六〇年年底，当《海瑞罢官》“已经改写到第七次”即将出籠的时候，吳晗同志发表了他的《談历史剧》。而在《海瑞罢官》出籠之后，吳晗同志便以历史学家兼历史剧作家的身份，大談特談起历史剧来了。他談的方面很多，中心的问题只有一个，就是历史剧如何古为今用的问题。現在，《海瑞罢官》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实质已经被人們揭穿了。这就使得我們有必要研究一下，吳晗同志根据《海瑞罢官》的創作經驗而总结出来的历史剧“理論”，或者说吳晗同志为《海瑞罢官》这一类的历史剧制造的“理論根据”，究竟是什么货色。

历史剧都是古为今用的，問題在于以哪个階級的“古”， 为今天的哪个階級所用

当《海瑞罢官》受到批判以后，有一些人为吳晗同志抱不平。他們說：剧本写的是古代的事，你們怎么可以拿来和今天的政治事件作类比呢？在他們看来，古是古，今是今，其間是没有什么联系的。而吳晗同志呢，在他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評》中，也把自己写《海瑞罢官》的創作意图說成是很“糊涂”，“‘古为今用’‘厚古薄今’的原則在当时一点也沒有想起过，完全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脫离了政治，脫离了现实”。实际上吳晗同志可不是真糊涂。早在一九五九年，他已經提醒人們注意，厚今薄古不能忘記“古为今用”。就在《海瑞罢官》演出之后不久，他在《关于历史剧的一些問題》中說：“無論是历史书也吧，历史剧也吧，里面的历史人物决不是僵尸的复活，写这个人、演这个人，都要着眼于他或她的某个方面对于后一代人們的启发作用，也就是前人經驗的总结。一句話，不是为了死人，而是为活人服务……”吳晗同志这里对历史剧“古为今用”的看法，是多么清楚，多么明确！

我們认为，所有的历史剧都是古为今用的。問題不在于是否承认历史剧古为今用，

重要的是：历史剧以哪个阶级之“古”，为今天的哪一个阶级所“用”？

为什么呢？

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历史剧自然也不能例外。

历史剧写的虽然是古代的事（准确一点说，是历史上的事），但却是当代的剧作者写的，是一定的历史生活在当代剧作者头脑中的反映。我们不能忘记这个最基本的事实，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一个历史剧作者，在浩如烟海的历史海洋里，之所以对其中的某一历史事件，某一阶级的历史人物发生兴趣，产生创作的欲望，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无缘无故的，这完全是现实生活和阶级斗争激发和启示的结果。他如果没有在其中发现了他认为对现实的斗争有意义、有价值并能打动人心东西，就不会化费心血去进行创作。他或者是想通过历史生活的艺术再现，来抒发一种感情，宣传一种思想，以影响读者，影响现实；或者是想借助于历史题材的处理，对历史人物的褒贬扬抑，来表现他对现实的态度和要求，并激发读者或观众产生这样或那样的联想，以达到改变现实的目的。所以，历史剧作者选择什么样的历史题材，歌颂什么样的历史人物，用什么观点说明历史，都是同他在现实生活和阶级斗争中所处的地位联系着，特别是和他对现实生活和阶级斗争的态度联系着，并且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他的也即是一定阶级的愿望和要求。

历史剧一经问世，就必然要对现实生活发生作用。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历史剧不为无产阶级所用，就为资产阶级所用，这是不以剧作者是否承认为转移的。从历史剧创作的实际情况来看就是如此：既有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历史剧，也有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历史剧。尽管有些人在写作时也许是想借历史剧抒发“思古之幽情”，但是如果人们进一步追问，“幽情”从何而来，缘何而出，剧本创作出来，对谁有利，这些都是可以作具体的阶级分析的。总之，社会上既然存在着阶级斗争，这种斗争必然会尖锐地反映到文艺战线上来，也必然会在历史剧创作领域里表现出来。所谓历史剧的古为今用问题，实际上就是历史剧为哪个阶级服务的问题。对于历史剧创作的一切理论主张，也必须这样看，即这种理论、主张究竟是为哪个阶级服务的？

吴晗同志只讲历史剧要古为今用，不谈历史剧以哪个阶级之“古”，为今天的哪个阶级所用，正如他在《海瑞罢官》受到揭露之后伪装“糊涂”一样，都是为了掩盖他以封建主义之古，为资产阶级所用的实质。

吴晗同志主张的历史剧古为今用，是以封建主义之古， 为资产阶级所用

吴晗同志在一系列的文章、谈话中，竭力提倡历史剧。他认为创作历史剧有两大任务：一是向今天的群众“普及历史知识”；二是学习和吸收古人的“优良品德”或者“好品德”。

质”。据说，历史剧若是完成了这两项任务，就可以起“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的作用了。

吴晗同志要历史剧向群众普及的是什么“历史知识”呢？我们知道，吴晗同志从其唯心主义历史观出发，认为在历史上“起主导作用”的是帝王将相，如果只写农民起义，不写地主阶级分子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历史上的光明面丧失了”，“历史几乎成为漆黑一团”，“也就取消了历史了”。把这种反动的历史观运用于历史剧创作，他一方面指责现在有一些历史剧“不适当地强调人民群众的作用”，“不敢写统治者在历史上的作用”，另一方面鼓吹唐太宗、武则天都起过很大作用，历史剧“对这样的人应该肯定、表扬、歌颂”。而对历史上的农民革命，他认为“不写失败，才没有教育意义”。可见，吴晗同志所说的“普及历史知识”，就是要向社会主义时代的人民群众宣扬帝王将相和其他地主阶级代表人物的“历史贡献”，替他们争地位，续家谱。

所谓学习和吸收古人的“优良品德”，又是学习谁的“优良品德”呢？如果吴晗同志要求历史剧帮助群众吸收和继承我国劳动人民的优良品德和革命传统，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吴晗同志说的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他认为，在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中，只有统治阶级的道德，劳动人民是没有自己的道德的。那就不存在向历史上的劳动人民学习“优良品德”的可能了。在他的关于道德问题的论文中，吴晗同志公然主张无产阶级必须吸取地主阶级资产阶级道德；而在他的历史剧论文中，吴晗同志空谈中华民族勤劳、勇敢、智慧的美德，实际指的还是帝王将相和许多“清官”的“好品质”，如什么“坚强不屈，雄心大志，勤俭奋斗，创造发明，忠实勤恳，保家卫国，自力更生，调查研究，明辨是非，同甘共苦”等等“美德”。他要求通过历史剧的宣传，使封建统治阶级的这些“美好品德”“深入人心，成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的组成部分”。谁都知道，道德都是阶级的道德，封建地主阶级的道德决不可能成为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道德的“组成部分”。如果封建道德“深入人心”了，无产阶级道德又往哪里放呢？

实际上，吴晗同志所说的历史剧的两个任务，只是一个任务，那就是为封建统治阶级及其代表人物歌功颂德。在吴晗同志的许多文章中，本来就是把“歌功”和“颂德”连在一起说的。《海瑞罢官》就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的标本。在吴晗同志看来，海瑞一生为老百姓做了许多“好事”，所以值得我们歌颂，而歌颂海瑞，又是因为海瑞有着“反对坏人坏事”、“反对贪污、反对奢侈浪费，反对乡愿”以及“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等等“好品质”，值得我们“学习和提倡”。（当然，这只是就吴晗同志的历史剧主张来说的，《海瑞罢官》还有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目的。）

吴晗同志主张历史剧为封建统治阶级及其代表人物歌功颂德，还可以从他对旧历史剧的态度得到证明。吴晗同志说：“对旧历史剧我一点反对的意见也没有”，“这些旧历史剧已经上演几十年、几百年了，已经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所以也不应该反对它，不必去改动它。”在我们看来，所谓旧历史剧，绝大部分都是歌颂帝王将相、忠臣节妇，宣扬忠孝节义封建道德的，其中少量带有民主性精华的剧作，也夹杂着不少封建性糟粕。这些戏今天必须批判，必须改造。吴晗同志为什么说“不应该反对它”，“不应该改动它”

呢？原因就是这些戏所宣扬的，正是吳晗同志主张今天的历史剧也应该宣扬的东西。志同道合，他当然“一点反对的意思也没有”了。他所反对的，只是那些试图用无产阶级观点来写的新历史剧。吳晗同志的立场的确是“站稳了”的。

党一向认为，不懂得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就不懂得革命，必须在广大群众特别是年青的一代中进行阶级教育，揭露地主、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人民的罪恶；而吳晗同志却唯恐年青人只知道地主、资产阶级分子做过的坏事，不知道他们还做过“好事”，要求今天的历史剧去“肯定、表扬、歌颂”他们。党一向认为，为了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必须坚持思想领域内兴无灭资的斗争，在人民群众中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破除封建的、资产阶级的以及小生产者习惯势力的思想影响；而吳晗同志却担心无产阶级“凭空创造”不了共产主义道德，要求历史剧向社会主义时代的人民宣传地主阶级代表人物的“优良品德”和“好品质”。吳晗同志居然宣称他这一套历史剧主张是“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的“古为今用”！天下竟然会有这样的怪事吗？

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这也没有什么奇怪。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经指出，提倡旧礼教、旧思想的半封建文化和帝国主义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今天，随着历史条件和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我们看到，资产阶级文化和封建文化又结成了反对社会主义文化的新的反动同盟。这个反动同盟的特点，就是由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或代言人，抬出封建文化的破烂武器，向社会主义进攻，企图复辟资本主义。大家知道，随着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封建势力在文化上的代表人物，声名狼籍，臭得很，出不得台面。但是，几千年来的封建文化，无产阶级还来不及对它作彻底的批判，至今还有不小的影响。而中国的资产阶级呢，他们当中有些人参加过民主革命，有一块“二十多年来在党的领导下”的进步招牌可以迷惑群众，还有一批未经改造或者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专家、学者“权威”的身份在各个部门工作，无产阶级还需要利用他们的知识和技能。但在文化上，中国资产阶级能够用来反对无产阶级的本钱实在太少了。他们除了从外国资产阶级那里偷运一些私货以外，只好到封建文化仓库里找寻合用的陈旧武器。从资产阶级的立场来看，这样做对他们比较有利。因为，他们自以为是封建文化的“内行”，有发言权；并且，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根据他们的经验教训，“古为今用”比之赤膊上阵，更能掩人耳目，便于“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于是，资产阶级文化和封建文化这一对“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就手拉手、肩并肩地勾搭起来向社会主义文化发动进攻了。

明乎此，我们就可以看出，一九六一年前后在我国文化界、学术界出现的一股复古主义思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吳晗同志就是走在这股反动逆流前面的一个急先锋。他在历史、文艺、哲学各个领域，打起了复古的黑旗，吹动了进攻的号角。“为社会主义”只是他扛的幌子，为资产阶级服务才是他的实质。

吳晗同志主張把歷史劇和無產階級的立場、觀點，時代精神和革命的批判精神 隔離開來，企圖使歷史劇成為反黨反社會主義活動的工具

吳晗同志不僅規定了歷史劇以封建主義之古，為資產階級服務的任务，而且，在歷史劇創作問題上，吳晗同志也提出了一套主張，設置了重重防線，以抗拒無產階級思想指導，確保歷史劇為資產階級所用，而不為無產階級所用。

第一道防線是歷史劇要受“歷史真實性的約束”，“反對主觀的想像、創造，反對基本上不符合歷史實際情況的所謂‘歷史劇’”。而吳晗同志所說“歷史真實性”的標準，就是主要人物、主要事件是否符合封建史家留下的記錄材料。要是以為吳晗同志由於缺乏文藝創作的普通常識才發表這樣的怪論，那就太天真了。他的“歷史真實”是大有妙用的。比如：你想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寫一個揭露包公、海瑞階級本質的戲嗎？不行。這是“違反了歷史真實”的，史書上記載當時當地的人都說包公、海瑞是“好人”呀！你想寫一個歌頌農民革命英雄的戲嗎？也不行！“千史無征”，當心“美化”人民群眾的罪名。封建史書中只有盜呀賊呀造反作亂、殺人放火的記載，那里去找農民英雄的傳記呢？“歷史真實”的妙用還不止于此。你批判《海瑞罷官》是反黨反社會主義毒草嗎？這真是冤枉，我寫的都是“歷史真實”啊！不信，《海瑞罷官》的《本事》全部是史料摘編，我吳晗可沒有加一個字。（其實，在封建史書上的材料不能滿足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需要時，吳晗同志就不受“歷史真實”約束，對他奉若神聖的史料進行歪曲捏造，只有迷信“明史專家”的權威的人，才會真的相信他“無一字無出處，無一字無來歷”。）如果人們遵守吳晗同志的“歷史真實”，在“歷史真實”這道防線面前，無產階級的立場觀點，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對於歷史劇都起不了作用，只好留下歷史劇這個障地，任由吳晗同志和他的老兄老弟們進行反黨反社會主義活動了。

吳晗同志設下的第二道防線是：歷史劇要表現“它所表現的那個時代的時代精神，而不是今天的時代精神”。這裡需要注意，吳晗同志和我們是沒有共同的語言的。我們所說的時代精神，是指一個時代代表着歷史前進方向的革命階級的革命精神。而吳晗同志解釋“那個時代的時代精神”所舉的例子，却是岳飛的“精忠報國”，包公的“調查研究精神”，他所說的“那個時代的時代精神”，就是封建統治階級精神。吳晗同志不准社會主義時代無產階級革命精神進入歷史劇，卻要求歷史劇所表現的“那個時代的時代精神”，即封建統治階級的精神，成為今天時代精神的一個部分。人們記得，周谷城曾經提出過所謂“時代精神匯合”論，企圖在文藝中為資產階級思想爭一席之地，成為“統一整體”的一個部分。吳晗同志的胃口卻大得多，也走得更遠，他要把無產階級的革命精神完全趕出歷史劇領域，讓封建統治階級的精神獨踞舞台，來適應今天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進攻的需要。

吳晗同志設下的第三道防線，是歷史劇對於“好人”“不需要又歌頌又批判”，也就是說只應該歌頌，不許批判。“要不然，就會在觀眾中造成混亂，分不出這是好人，是壞

人，还是半个好人、半个坏人，教育意义也就不完全了”。吳晗同志所說的“好人”，当然又是指唐太宗、武則天、海瑞、况钟这一类的古人。吳晗同志觉得正面提倡歌頌他們还不够，还要从反面补充不許批判他們。其实，又要符合“历史真实”，又不能表現今天的时代精神，即使吳晗同志不說，历史剧作者已不可能对“好人”作什么真正的批判。經過吳晗同志設立这第三道防綫，无产阶级对于旧事物的批判精神，更不可能有丝毫风雨吹入历史剧的大門了。

不难想象，和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革命精神和批判态度隔离开了的历史剧，是一种什么历史剧！在意识形态領域里，无产阶级不去占領陣地，必然被资产阶级占領。吳晗同志层层設防，把无产阶级思想关在历史剧大門之外，居心何在，岂不是很明显的嗎？

把吳晗同志的历史剧創作主张和他对历史剧古为今用的看法，对照一下《海瑞罢官》，我們就可以发现，吳晗同志的理論主张和創作实践是完全相一致的。第一，《海瑞罢官》中的海瑞，是地主阶级中的“好人”，是封建道德的化身；第二，《海瑞罢官》符合吳晗同志所強調的“历史真实”，而全部排除了无产阶级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第三，《海瑞罢官》表現的是资产阶级化了的海瑞“反对坏人坏事”“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而不是今天的时代精神；第四，《海瑞罢官》对海瑞只有歌頌，沒有批判；第五，《海瑞罢官》“不是僵尸的复活”，而是为“活人”，即右傾机会主义分子和其他反党反社会主义势力服务的。原来，吳晗同志所需要的是《海瑞罢官》式的历史剧。吳晗同志关于历史剧古为今用的主张，是企图使历史剧成为宣扬封建毒素、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的工具。

彻底批判吳晗同志的謬論，坚持历史剧为工农兵服务、 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正确方向

在对《海瑞罢官》的批判过程中，有一些人問：以后还可不可以写历史剧？

如果說，以后不应该再去写宣扬封建毒素、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历史剧，那是对的。我們的确不需要这种历史剧。可是，阶级斗争是不以人們的意志为轉移的，誰也不能保証，今后在一定的气候条件下，再也不会出現《海瑞罢官》式的毒草。是毒草，当然不能任由它毒害人民，而必須彻底批判，坚决鋤掉。

如果因此认为无产阶级不要历史剧，那我們就要肯定地回答：不对。无产阶级是要历史剧的，只是不要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历史剧，要的是为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历史剧。

社会主义的戏剧，当然要以革命现代戏为主，以表現社会主义时代工农兵英雄形象为主要任务。这是不能动摇的。同时我們也需要一定数量的正确反映历史真实的历史剧，以帮助人民群众認識自己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掌握阶级斗争的規律，看清历史发展的方向，发扬革命传统，吸取历史上革命人民的斗争經驗和教訓；激发人民的革命热情，推动人民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設和兴无灭資的斗争。

资产阶级这样看重历史剧，企图使历史剧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也說明了历

史剧是当前的阶级斗争中无产阶级必须占领的阵地。

为了使历史剧遵循着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正确方向发展，我们必须彻底批判吴晗同志关于历史剧的谬论，并反其道而行之。

吴晗同志主张历史剧为帝王将相歌功颂德。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历史剧，就应当以歌颂历史上劳动人民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中的革命精神和英雄气概作为主要任务。毛主席早就说过：“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统治着舞台”，他要求我们的文学艺术应当把“这种历史的颠倒”“再颠倒过来”。（转引自《人民戏剧》创刊号）历史剧要不要描写历史上劳动人民的斗争和生活，要不要表现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伟大作用，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写什么的问题，而是历史剧的方向问题，也是一个剧作者的立场问题、阶级感情问题。对毛主席的这一指示，在过去的历史剧创作上，做得很不够，认识得很不够。现在应当是重新学习、重新补课的时候了。

吴晗同志在历史研究和历史剧创作中坚持历史唯心主义，反对历史唯物主义。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历史剧，必须和他针锋相对，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反对历史唯心主义。这就要求历史剧的作者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进行科学分析，真正做到毛主席所指示的那样，认真研究“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而不能象毛主席批评过的一些作者“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毛泽东论文艺》第八十九页）例如说，对剥削者、对帝王将相，从无产阶级立场出发，就不能歌颂他们，而必须如实地把他们当作旧事物来反对。特别是当资产阶级作家竭力美化他们，为他们唱赞歌的时候，在当前的兴无灭资斗争中，我们更有必要揭露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的罪恶和反动本质，揭露剥削阶级的各种意识形态对人民群众的欺骗和毒害，以帮助今天的劳动人民同一切旧的、腐朽的思想、观念、习惯、传统决裂，进一步清除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思想影响。

吴晗同志主张历史剧不要表现今天的时代精神。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历史剧，应该通过题材的选择，艺术形象的描绘，主题思想的表现，体现我们今天的时代精神，即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历史剧作者不能纯客观地、冷漠地去处理他的题材和人物，而必须在作品里，贯注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表现出自己的鲜明爱憎，强烈的战斗热情，使人感受到，作品所描写的虽然是历史生活，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但却跳动着我们时代的脉搏，与客观的革命斗争息息相关，与今天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愿望血肉相连。

社会主义的历史剧，是社会主义文艺的一个组成部分。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就是要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为反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斗争服务，为兴无灭资的阶级斗争服务。这也是历史剧的根本任务。历史剧的古为今用问

題，說到底，也就是要不要為工农兵服務，為无產階級的政治服務的問題。只要方向明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設中，在兴无灭資的伟大斗争中，历史剧作为文艺战线上的一个兵种，是能發揮它应有的战斗作用的。

社会主义时代的人民是需要历史剧為他們服務的。社会主义时代人民也一定能寫出真實地反映人民历史的历史剧。毛泽东思想的指導，无產階級的堅定立場和強烈的革命感情，是写好历史剧的保證。吳晗同志企图使历史剧成为資產階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只是一种妄想。《海瑞罢官》是一棵大毒草，他为《海瑞罢官》服务的历史剧主張，也是毒草，也必須在革命的批判之下連根挖掉。

批判“清官”論的几种錯誤观点

史 向 新

—

“清官”論是吳晗同志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和学术观点的一个重要內容。吳晗同志写了許多美化封建統治階級“清官”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替“清官”列出了一大堆“功劳”：“爱民如子”、“为民作主”、“为民除害”、“平冤獄”、“抑豪强”、“惩办贪污”、“兴修水利”，等等。他說，“广大人民”对“清官”是“拥护”的，“对于这样的好官，人民作了鉴定，叫作青天”。他还說，“清官”办的“这些好事是和封建統治階級的长远利益一致的，也是和被压迫被剝削的广大人民当前利益一致的，对当时的生产发展，对历史的进展有好处的”。因此，他认为，在建設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对封建社会的“清官”，“应该肯定，应该歌頌”。

現在已經看得很清楚，吳晗同志这套“清官”論，从历史上來說，就是美化帝王将相，为帝王将相爭历史地位，續帝王将相的家譜；从现实政治生活來說，吳晗同志笔下的“清官”，就是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牛鬼蛇神、右傾机会主义者的化身。吳晗同志美化“清官”，就是为右傾机会主义分子唱贊歌。所以，吳晗同志的“清官”論，不仅是一个反馬克思主义的学术观点問題，更主要的是一个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問題。全国学术界对吳晗同志的“清官”論正在进行深入的彻底的批判，这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

但是，在“清官”問題上，有些人还和吳晗同志持同样的观点，认为“清官”是为人民的，給人民做了不少好事；有些人还在为吳晗同志的錯誤观点进行辯护，认为“清官”虽是站在統治階級立场上，但确給人民做了不少好事。并认为“清官”的存在是一个客观历史事实，不是封建統治階級的虛构。另外，也还有些人对“清官”的認識还很模糊，跟在“清官”論者的后面跑，說应该划分“清官”和貪官的界綫，对“清官”应该有所肯定，等等。

这样，认真批判“清官”論的各种錯誤观点，揭穿“清官”論的实质，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二

“清官”論认为：中国历史上的所謂“清官”，不是出自統治階級的虛构，而是一个客观历史事实。为此，他們从故紙堆中搬出許多有关“清官”的記載，以資証明。

不錯，在封建地主階級的历史記載里，的確有不少關於“循吏”、“良吏”或“清官”的傳記；每個封建王朝，都有他們的“良吏”、“好官”。且朝代越近，“好官”、“清官”的人數越多。

問題是這些傳記是誰記載的，是為了什麼而記載的，我們應該站在什麼立場上，用什麼樣的觀點和方法去考察它。

毛主席告訴我們，反動統治階級總是“把革命群眾寫成暴徒，把他們自己寫成神聖，所謂光明和黑暗是顛倒的”^①。馬克思主義產生以前，一切舊史家，都是站在剝削階級的立場上，用唯心主義的觀點，對社會歷史，隨意解釋，橫加歪曲，充滿着統治階級的偏見和謊言。創造歷史的勞動人民，被誣蔑為“匪徒”、“群盜”，騎在人民頭上的帝王將相、官吏老爺，則被頌揚為“英雄”、“豪傑”。史學和文化教育，都被統治者所獨攬，用作愚詐、欺壓群眾的武器。而史書上記載的所謂“循吏”、“良吏”、“清官”、“好官”，都不過是秉承皇帝的意旨，宣揚那些在政治上忠於皇帝，思想上堅決維護封建禮法，經濟上保證王朝的剝削收入源源不斷，最陰險、最狡猾、最善於玩弄權術的中央和地方的當權派，把這些人作為執行統治階級採取的“寬以濟猛，猛以濟寬”的兩手政策的政治標本。

封建王朝對“清官”之所以如此寵愛和大肆渲染，目的就在於使封建國家的全體官吏都效法“清官”，堅決忠於封建統治，堅決維護封建統治，特別是借以美化封建政治，宣揚封建道德，腐蝕人民鬥志，幻想保其萬世“升平”的帝業。這一企圖，統治者從來都是直言不諱的。康熙皇帝說：“朕保全清官之意，使為正人者無所疑懼，則海宇長（常享）升平之福矣！”（《清史列傳》卷十二）

這樣一種“清官”，究竟是那一個階級的“清官”，難道還不十分清楚嗎？就拿吳晗同志大肆吹捧美化的海瑞來說，吳晗同志在《論海瑞》一文中列舉說海瑞的好話的，無一不是封建社會的官僚地主，何曾是什麼“人民的鑑定”？有些人翻遍故紙堆，找到一兩條所謂農民說過“清官”“好話”的史料，就作為人民“擁護”“清官”的證據。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這能說明什麼問題呢？這只能說明封建史家用捏造事實來標榜“清官”的騙術的成就，借以使封建統治階級的官吏效法所謂“清官”；只能說明封建統治階級宣揚“清官”對個別農民的欺騙和毒害；並不能真正代表“人民的鑑定”。而歷史上受壓迫、受剝削的農民群眾，從來都是反對封建統治階級、打倒“清官”偶像的革命者。長期的階級鬥爭實踐，“教會他們憎恨老爺和官吏”^②。民諺云：“天下烏鴉一般黑”，“無官不貪，無紳不劣”。這就是農民群眾對“清官”的鑑定，這就是他們從實際生活中所得出的經驗總結。

由此可見，“清官”並不是什麼“客觀的歷史事實”，而是封建統治階級根據自己的政治標準，適應統治人民的需要而精心炮制出來的假象；“清官”並不是什麼“古代人民的要求”，而是封建王朝進行欺騙的工具；“清官”既是封建統治階級的寵兒，就必為被統治階級的蠹賊，決不可能“被對立階級所共同贊揚”。

① 《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73頁。

② 《列寧全集》第15卷，第181頁。

三

“清官”論认为，“清官”主要表现在“清正”、“清明”、“清廉”上，并对此大加颂扬。其实这种說法并不是什么新鮮的东西，而是从故紙堆中检来的破烂。这是封建統治階級，按照自己的政治标准和道德标准提出的政治观念。

我們认为，封建統治階級的所謂“正”，就是頑固地站在地主階級的立场上，忠于皇帝，忠于統治階級，死心塌地为地主階級服务，充当封建統治階級的死硬派。

所謂“明”，就是明于臣职，坚决按照封建制度、封建法律和封建伦理道德办事，做封建主义的卫道士。

所謂“廉”，就是能“克己奉公”，坚决维护地主階級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保証封建地主剝削收入的源源不断，充当封建統治階級的守財奴。

所謂“清官”的“清正、清明、清廉”，不过如此而已。

难道这样的“清正”、“清明”、“清廉”也值得歌頌嗎？如果值得歌頌的話，那岂不是在歌頌頑固地站在地主階級的立场、坚决维护封建制度、积极捍卫封建統治階級的整体利益、坚决与人民为敌的“英雄”、“豪杰”嗎？

由此可見，“清官”論所頌扬的何止是“清官”，而是在透过“清官”狂热地歌頌封建制度，歌頌封建王法，歌頌封建道德，歌頌一切反动的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試問，你們这样卖力地宣扬那些腐朽的反动的封建垃圾，难道不正是在狂热地宣扬一种复古主义嗎？

复古主义者总有那么一套“化腐朽为神奇”的本事，把历史上一切丑的、恶的东西，捧为美的、善的东西。不是么？“清官”論把坚决地站在封建地主階級的立场上，积极地謀求地主階級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清官”，說成是“爱民如子”，說成是为人民做了一些“好事”。在他們看来，对立階級之間的矛盾是可以調和的，对立階級的不同利益是可以一致的；所以，他們之中有人认为，“清官”是站在人民立场上，为人民謀利益的。有人认为，“清官”既站在地主階級立场上，又同情人民。“清官”的所作所为，既同封建統治階級的长远利益一致，又同广大人民的当前利益一致，甚至也不违背农民階級的长远利益。

这是一个弥天大謊。

我們认为，在封建社会里，对立階級之間的矛盾是不可能調和的，对立階級的階級利益是根本不能一致的；凡是符合統治階級的利益，就必然违反被統治階級的利益。因为地主階級的利益，無論从长远或目前來說，都是剝削再剝削；农民階級的利益，無論从长远或目前來說，都是斗争再斗争。对剝削階級是好事，对被剝削階級必然是坏事，两者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两者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清官”是官，是地主階級专政的工具，它永远站在人民的敌对方面，它怎么能为人民办“好事”，又怎么能使剝削階級与被剝削階級的利益統一起来呢？

毛主席說：“在封建國家中，皇帝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在各地方分設官職以掌兵、刑、錢、谷等事，並依靠地主紳士作為全部封建統治的基礎。”^①

這就告訴我們，所謂“清官”，也同樣是那批掌握軍事、政治、刑法和經濟的官吏。而他們為封建王朝辦事，更善於玩弄政治手段，辦得比貪官更為幹練，博得皇帝的歡心，受到封建統治階級的贊賞，成為封建王朝的寵兒。

封建國家依靠地主紳士作為全部封建統治的基礎，這就說明了，“清官”所做的一切，只能是鞏固這個基礎，而不能是破壞這個基礎；只能從地主階級的利益出發，不能從農民的利益出發；只能為地主階級辦好事，不能為農民辦好事。

本來，這個道理並不深奧，只要有一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常識的人都可以懂得；但是“清官”論硬說“清官”是事實上對人民做了不少“好事”。那麼，我們現在就進一步來剖析一下那些所謂“好事”的實質吧。

先就“執法公平”而言。封建法律是地主階級意志的體現，是為保護地主階級利益而對農民實行專政的。法律的階級性，就決定了它是偏私的、不公平的。毛主席指出：“軍隊、警察、法庭等項國家機器，是階級壓迫階級的工具。對於敵對的階級，它是壓迫的工具，它是暴力，並不是什麼‘仁慈’的東西。”^②更何況執行法律的人又是官官相護，“平”從何來呢？民謠說：“清官，清官，為民伸冤，伸來伸去，官包庇官”。海瑞對這點也是毫不含糊的，他說：“事在爭言貌，與其屈鄉官，寧屈小民”。（《興革條例》）農民與地主打官司，他總是站在地主一邊，百般為地主開脫，並以毒打、枷鎖、流放等手段對付農民。“清官”為誰執法，不就明若觀火了嗎？

再就“壓制豪強”來說。“清官”論首先抽去了“壓制豪強”的階級內容，然後再片面地夸大和渲染“壓制豪強”的歷史事實，把維護封建統治階級的長遠利益和整體利益而出現的統治階級的內部鬥爭，封建統治階級內部為分贓而進行的狗咬狗的鬥爭，說成是為了農民利益的鬥爭。可惜得很，“清官”論者極力美化“清官”“壓制豪強”是為人民辦好事，而“清官”自己卻給“清官”論者打了一記很響的耳光。被吳晗同志所吹捧的“海青天”，明白地說明了他為什麼要“壓制豪強”。海瑞表白自己說：“區區竭盡心力，正欲為江南千百年基業，酬上恩報知己也。”（《海瑞集》第四二四頁）所謂“千百年基業”，難道不是地主階級的長遠統治嗎？“酬上恩”不就是為封建王朝效勞嗎？“報知己”不就是保護地主官僚、狐群狗黨嗎？他迫於階級鬥爭形勢而對徐階的故作姿態，也僅僅是“為此公（徐階）百年後得安靜”，（同上，第四三一頁）讓地主階級的統治千秋萬世。這怎麼能說海瑞站在農民一邊去打擊豪強呢？

所謂“清官”“愛民如子”，從來就是封建統治階級騙人的鬼話，所有的封建官吏沒有一個不把自己說成是“為民父母”的。就連封建地主階級的头子——皇帝在他的詔書里也

① 《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18頁。

② 《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81頁。

是这样标榜的。例如明万历帝宣称自己是“无一念不在爱民”。难道我们可以相信这些鬼话吗？当然不能。馬克思指出，統治階級总是要“把自己的利益說成是社会全体成員的公共利益，抽象地讲，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①。其目的无非是迷惑人民，教人民馴服于他們的統治和奴役。

毛主席說：“世上决沒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沒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謂‘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階級以后，就沒有过这种統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統治階級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許多所謂圣人賢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無論誰都沒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階級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②“清官”的“爱民如子”，只不过是對地主階級的爱，对封建王朝的爱罢了。明朝大地主何良俊說：“海剛峰之意无非为民。为民，为朝廷也。”（《海瑞集》第六三二页）鼓吹“清官”“爱民如子”的同志，請听一听大地主何良俊是怎么說的吧！

有所爱必有所憎。“清官”对人民是深恶痛絕的。当农民起来进行反抗斗争时，“清官”那“爱民如子”的薄薄面紗便立即撕下来，露出他們原来的猙獰面目。例如宋代的包拯，在京都、河北和淮南等地的农民紛紛起义时，他就咒罵农民为“盜賊”，要求立即“捕捉淨尽”，“即时誅灭”。（《包拯集》第五八页）面对着农民一个个在“清官”的屠刀下倒下去的事实，不知美化“清官”的同志对此有何感想？任从你們如何涂脂抹粉，也不能掩盖“清官”手上的斑斑血迹。

那么，“輕徭薄賦”总該算是一件好事了吧。不，封建統治階級具有貪得无厌的本性，从来也不会放弃任何榨取人民的机会，对人民实行“輕徭薄賦”的。海瑞任淳安知县时，就如狼似虎，“日日催征，小民卖子鬻产，未有完事之日。”（《兴革条例》）

在一定的历史时期，統治階級为了調整內部矛盾，发展地主經濟，封建王朝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实行“輕徭薄賦”，但这只是对地主階級而言的，不是对劳动人民而言的。汉初曾实行“輕徭薄賦”“与民休息”的政策，目的在于扶植地主經濟。荀悅在《汉紀論》就說过：“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而免除租稅，适足以資豪强也。”这种政策实行的結果，一方面是富者愈富，“京师之钱累百巨万”，“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另一方面是貧者愈貧，以致“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汉书·食貨志》）难道使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过牛馬不如的生活，这也算是“好事”嗎？

既然“清官”的上述各种政治活动和經濟活动，都不可能給人民带来什么好处，那么“兴修水利”总該是一件好事了吧。我們要問，水利是誰修的？是人民修；誰出钱？人民出钱；誰出力？人民出力；誰得利？地主階級得利。人民的劳动果实被地主階級侵吞去了，水利成为地主階級剝削农民的新手段，成为通向农民身上的吸血管。恩格斯指出，階級社会中，“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階級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4頁。

② 《毛澤东选集》第3卷，第872頁。

步”^①。人民不仅在修水利时要忍受“持畚耒，筑河堤，饿死老父冻死妻”的惨境，修成水利之后，更要受繁重的租税的盘剥。

既然如此，“清官”論者为何不歌颂劳动人民兴修水利的辛勤劳动和对社会生产发展作出的贡献，而偏偏要去歌颂“清官”呢？这无非是在宣扬统治阶级所提倡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人者食人，治于人者食于人，此天下之通义也”的剥削阶级思想。这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剥削者为了剥削者的利益，对被剥削者挥舞着皮鞭和做了些指手划脚的事情，就是对社会历史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就是对被剥削者的“恩德”，而广大劳动人民出钱出力，流血流汗创造了物质财富，养活了剥削者，那都是理所当然的。

由此可见，只要“清官”論承认“清官”为人民办了好事，就不管如何闪烁其词，加了什么“清官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啦，什么“出发点是为统治阶级的利益”啦，“客观效果上”、“一定程度上”为人民啦，等等，都是掩耳盗铃之说，都不能为自己的过错开脱。

四

有些人说，“清官”与“贪官”在统治人民的方法上是有区别的，“清官”是“养鸡下蛋”，“贪官”是“杀鸡取蛋”，并进而认为“‘养鸡下蛋’总比‘杀鸡取蛋’要好些。”这种说法对不对呢？

我们认为，把统治阶级剥削人民的两面手法，即所谓“杀鸡取蛋”与“养鸡下蛋”绝对分开，本身就是形而上学的。地主阶级对于农民既没有绝对的“养鸡下蛋”，也没有绝对的“杀鸡取蛋”，而是两者交织在一起，互相依存，互相补充，相辅相成的。“养鸡下蛋”，不是为了少剥削，而是为了更多的剥削，更长期的剥削。如果在现实生活中，养鸡还得拿点饲料给鸡吃，鸡才能下蛋的话，那么统治阶级又何曾从自己身上拔一根毫毛给农民，何来“养鸡”？

毛主席说，在封建社会中，“不但地主、贵族和皇室依靠剥削农民的地租过活，而且地主阶级的国家又强迫农民缴纳贡税，并强迫农民从事无偿的劳役，去养活一大群的国家官吏和主要地是为了镇压农民之用的军队”^②。试问“养鸡下蛋”論者，究竟是农民养活地主，还是地主养活农民？按照你们的说法，就是地主养活了农民。不然的话，“养鸡下蛋”又何从说起呢？

不仅如此，“养鸡下蛋”说，还掩盖了“清官”伪善与残暴这两副嘴脸的真相。我们知道，“清官”在平时经常装出一副“悲天悯人”的脸孔，当騙子手；到了阶级矛盾激化和农民起来反抗时，就露出其凶恶狰狞的原形，当刽子手。海瑞就是这样的。当他任淳安知县时，积极推行保甲法，以统制农民，特别是对付那些“为衣食计”而起来斗争的“矿徒穷民”，极力主张“逮捕法办”，强令“拒捕者，随即杀之。”（《海瑞集》第一八二页）其残忍的本性，已暴露无遗。“养鸡下蛋”说否认“清官”残暴性这一面，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0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8页。

統治階級殘酷的階級本性。

“养鸡下蛋”說认为“养鸡下蛋”总比“杀鸡取蛋”好，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人生哲学呢？

毛主席說：“中国人民是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的統治的，他們每次都用革命的手段达到推翻和改造这种統治的目的。”①历史上千百次規模浩大的农民革命，就是对封建反动統治的答复。所以，从人民來說，他們所追求的，并不是什么“养鸡”比“杀鸡”好，而是要从根本上推翻一切黑暗統治。所以只有革命，才是农民的盛大节日，才是他們扬眉吐气的日子，才是他們的真正出路。

革命的人民一定要同反动統治階級展开針鋒相对的斗争，不害怕一切恐吓，不听信任何“好話”。宣扬“养鸡”比“杀鸡”好，不論其主观意图如何，在客观上无非是在麻痹人民的斗志，宣扬跪着生比站着死好的“活命哲学”，要人民永远当馴服的奴隶，任从反动統治階級的奴役和宰割。这是資產階級反动历史观的反映。

所以，要在反革命两手政策中选择“好”与“坏”的任何企图，都是錯誤的，硬要玩弄这种伎俩，无异把自己置身于反动統治階級的謀士的地位。

当“清官”論者感到越来越站不住脚的时候，他們就抛出其最后一张王牌来进行詭辯，硬說“清官比貪官好”。认为不这样分，就是“颠倒黑白”，就是等于說“官越貪越好”，就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如此等等。

有些同志也上了他們的当，虽然承认“清官”論者的謬誤是必須批判的，但在具体評价“清官”上又觉得必須一分为二看待“清官”和“貪官”，必須承认“清官”确比貪官“好”。为什么这些同志不能彻底認識“清官”的反动本质呢？毛主席說：“有些人讀了一些馬克思主义的书，自以为有學問了，但是並沒有讀进去，並沒有在头脑里生根，不会应用，階級感情还是旧的。”②由于思想感情还是旧的，要与“清官”在思想上决裂，他們总是过意不去。

我們认为，“清官”比貪官好，这种提法，本身就是錯誤的。“貪官”是官，“清官”也是官，階級本质一样，都是地主階級統治人民的工具，都是統治階級反革命两手政策的体现者，怎么能在他們之間分“好”、“坏”呢？如果一定要分的話，也只不过是“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③而已，决不是什么好与坏之分。天下烏鴉一般黑。“清官”論者宣扬“清官”比貪官“好”，就是宣扬統治階級中也有什么“明智派”，宣扬統治階級的反动本性可以改变，为統治階級涂脂抹粉，在人民群众中散播对階級敌人的幻想，起瓦解人民的革命斗志、掩护敌人的反动作用。

“清官”論的种种謬誤，必須批判！

我們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紅旗，把学术革命进行到底。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7頁。

② 《毛泽东著作选讀》（甲种本），下册，第501頁。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82頁。

筆談“清官”問題和 “讓步政策”問題

編者按：“清官”問題和“讓步政策”問題，是全國學術界正在討論的若干重大問題中的兩個問題。本刊這一期發表的《筆談“清官”問題和“讓步政策”問題》一組文章，對這些問題提出了各自的看法。劉節先生的《清官是人民的要求，不是統治者的美化》一文，提出了一些很值得注意的觀點。這就需要繼續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進一步展開研究和討論。我們熱烈歡迎讀者來稿，參加這場討論。

徹底揭穿“清官”的假象

王 起

“清官”和貪官，都是封建統治階級統治人民的工具。就統治人民這一點來說，“清官”比貪官更為有效，更加符合地主階級的長遠利益。因此，地主階級的历史學家、文學家竭力美化、歌頌“清官”，使得“清官”的假象越來越高大。在他們的筆下，“清官”清到吃人民一口水，也要丟下一文錢。但在勞動人民眼中，“清官”的形象卻又是一種樣子。過去流行在勞動人民中的話是：“無水無魚，無官無私”，“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以及帶有迷信色彩的“一代清官九代牛”等等。元人雜劇中

有些官吏上場時往往夸耀自己是“清如水，白如面，明如鏡”的好官，而別人嘲弄他們是在把清水和白面攪在一起的面糊盆里磨鏡子，越磨越糊塗。封建文人和勞動人民對於“清官”的截然不同的評價，生動地說明了“清官”的階級本質。

有的人說：“清官”是封建社會的精華，貪官是封建社會的糟粕，這種說法是荒唐的。“清官”和貪官都是地主階級封建國家機器的組成部分。對於封建社會中的文化，我們要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而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對封建社會的國家機

器，是没有什么民主性的精华可以吸收的，因此只有彻底粉碎它。

在认清“清官”的阶级本质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具体分析“清官”在不同历史条件下所起的作用。简单地說貪官和“清官”都是封建官僚，没有任何区别，所有的“清官”也都是是一样的，这不能說服人。

“清官”的假象是怎样越来越迷人的呢？这里有两种情况值得注意：一种是在封建王朝开国之初，这时新的地主阶级政权尚不稳固，需要团结地主阶级内部，养精蓄锐，逐步巩固他们的封建统治。适应封建统治者的这种需要而出现的“清官”，往往倡导所谓“施仁政”、“与民休息”，采取若干把农民重新束缚在封建制度之下从事劳动生产的措施，从而有利于进一步对他们的剥削与压迫。这些措施客观上可能对社会生产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他们对劳动人民的欺骗作用是更大的。历来的封建历史著作对这些“清官”大力歌颂，开始在封建文人里树立了他们的假象，但他们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还是不大的。

另一种情况，是在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农民起义日益增多但尚未发展到全国规模的时候，封建统治阶级需要树立“清官”的假象，创造“清官”的幻想，以麻痹劳动人民反抗的斗志。这时出现的“清官”并不多，但是通过小说、戏剧宣扬“清官”形象的作品却大大增加了，它们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要比《史记》、《汉书》以来的《循吏列传》大得多。我最近重新翻了一下元代杂剧中的“清官”戏，这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大量出现的宣扬“清官”的作品。元代的吏治特别黑暗，可以为当时统治阶

级提供“清官”戏的样板是不多的。但这些戏都力图说明“清官”是能够为百姓除害、为天子分忧的。总之一句话，皇帝是好的，百姓也是善良的，欺压人民的只是个别坏蛋或贪官。因此老百姓在受到他们欺压时就只要坐待皇帝派“清官”来解救他们。这些戏大量在农民大起义前夕的元代出现，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官府的黑暗、社会的混乱，它的主要倾向是在美化“清官”，宣扬仁政，麻痹人民的斗志。由于元代作者还只能根据封建社会的生活描写“清官”，我们掀开这件披在“清官”身上的儒家仁政的伪装，他们的凶恶面貌同那些恶霸贪官并没有什么区别。元代的“清官”戏以写包公的为最多，而包公的形象就十分可怕，作家经常用“閻王生死殿，东狱摄魂台”形容他的开封府大堂。

“清官”和贪官有没有区别呢？区别显然是有的。但是，我们区别“清官”和贪官，不是为了歌颂“清官”，不是要向“清官”学习，而是为了认识反动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不同手段。这种认识对于我们如何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是有帮助的。至于一定要问“清官”和贪官谁好一些，谁坏一些，对于我们来说是没有意义的。这正如问修正主义和帝国主义，美国的鹰派和鸽派谁好一些谁坏一些一样的没有什么意义。但由于长期以来封建历史学家和封建文人创造出来的“清官”的假象直到今天也还有它迷惑人民的作用，有些人还企图要我们的革命干部去学习封建社会的“清官”的什么好品德。彻底揭穿“清官”的假象，指明它的阶级本质，就有其一定的现实意义。

漫談历史上的所謂“清官”

吳 三 立

“清官”一詞，出現較晚。《史記》有《循吏列傳》，據作者自序說：“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行。作《循吏列傳》”。後世史書，或稱為“良吏”。是“循吏”、“良吏”和“清官”不無類似之點。而在《史記·滑稽列傳》中，稱孫叔敖為“廉吏”，《後漢書·楊震列傳》中，稱楊震為“清白吏”，却和“清官”涵義相當。至於正式稱為“清官”，大概始於元雜劇，如元李行道《灰蘭記》說：“……還有那個清官，清如我老爹的？”就是。

“清官”的清，從字面上講，是指：清廉、清正、清介、清明等。而清正、清介，亦包括所謂“正直不阿”、“不避權貴”等意思。

歷史上有沒有“清官”？我說是有的。歷史的記載，不能完全出於虛構。問題就在於我們今天怎樣去看待歷史上的“清官”。又所謂“清官”，是否都是名符其實呢？這就難說，要從具體人作具體分析。

“清官”是封建社會的產物。我國封建社會時期特別長，歷史上每個王朝都有關於“清官”或類似“清官”（即“循吏”或“良吏”）的記載。不過數量很少，每個朝代只有個把人而已。這些“清官”，大都出現在每一個王朝的中葉或中葉以後，而在開國

之初，所謂王朝上升時代，大抵政治比較“清明”，無所謂“清官”。有些同志說：“清官是封建制度在矛盾尖銳化過程中的一種調節的工具。”這種說法我不同意。我以為所謂“清官”，指的是地方官，而不是中央官。地方的“清官”，縱使有影響，只是局部的，暫時的。對整個封建王朝和封建制度，絕不能起調節作用（下文還會講到）。

影響較大較久的“清官”，要算包拯和海瑞。包拯當時“權知開封府”，雖不算中央官，但是掌握首都地方行政權。他把首都地區的治安秩序維持得比較好，又能對貴戚、宦官、豪強大膽地加以裁抑、壓制，一時聲名大振。不久，他“遷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這就有職無權，不讓他再掌握首都地方行政權，當時最高統治者的用意，可想而知。海瑞平生只做過幾任縣官和一些小京官，後來做應天巡撫，只做了七個月，就被罷免。在家乡閑居了十六年，才又被明廷任為南京右都御史，那時海瑞已經七十二歲，衰老不能有所作為，屢請休官，過三年便死了。總之，包拯和海瑞在他們生時，都不得志。既不為最高統治者所喜，也不被一般人所重視，很難說他有什么大影響。直到他們死后，才得大名。最高統治者都加以褒揚。一個賜諡

“孝肅”，一个賜諡“忠介”，而一般人也把他們捧为“青天”，封建文人更替他們写小說、戏剧，竭尽贊揚、歌頌之能事，都是扩大影响的做法。这是什么緣故呢？很明显，不过是最高統治者利用这些“清官”的典型，作为一种“政治幻想”以麻醉人民而已。

有些同志說，“清官”和貪官都是“一丘之貉”，甚至說，“清官”比貪官更坏。我不能完全同意，特別是后一种說法，难以說服人。

当然，从他們的階級本質說，“清官”，貪官都是官，官和民是对立的。他們都是剝削階級，都是維護封建統治的，都是对人民專政的工具，說他們是“一丘之貉”，也未嘗不可，但對他們還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

我們对历史上的“清官”，既要看到他同貪官相同的一面，也要看到他同貪官不尽相同的一面。所謂“清官”，就要从这个“清”字上去看，他們虽是剝削階級，但对人民的压迫、剝削总比貪官輕得多。他們还能做些有益的事（如兴修水利、革除弊政、裁抑强豪、平反冤獄等），他們的目的虽然不是为着人民，而是为着維護封建統治，为封建階級的整体利益而效劳，但在客观上也对人民有好处。不过这只能說：他們所做的事，在客观上符合人民的利益，絕不能說是代表人民的利益。

說到貪官，那就相反了。貪者貪得无厌，勒索賄賂，作恶多端。为了过着荒淫无耻的享乐生活，不顧人民死活，残酷地剝削和压迫人民。唐代詩人白居易的《杜陵叟》（小題：“伤农夫之困也。”）所說：“剝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民即豺狼，何

必鉤爪鋸牙食人肉。”詩人把貪官比作吃人肉的豺狼，强烈地反映出人民的呼声。古代类似这样的詩很不少。这样，貪官之所作所为，怎么可以同“清官”划一个等号呢？

我們且把与海瑞同时的严嵩跟海瑞来作一比較：

严嵩为相二十年，同他的儿子严世蕃朋比为奸（同列奸臣传），抄家时“黄金可三万余两，白金二百万余两。其他珍宝、服玩所值又数百万”。（《明史·列传》）

海瑞死在南京任上时，仅存白金十余两。丧事由同僚王用汲代为捐錢办理。（依据《明史·列传》和《海忠介公行状》）

从他两人的传记来看，“貪”和“清”不是大有区别嗎？縱使原来資料或經封建的史官、文人有所夸大和縮小，但总不致于太离谱罢。

有些同志說“清官”比貪官更坏的理由，是：因为“清官”緩和了階級矛盾，致延长了封建王朝的寿命，貪官加剧了階級矛盾，可以促使封建王朝的灭亡。这种論点，是很不正确的。如果是这样，貪官岂不成了历史发展的动力嗎？毛主席說：“地主階級这样残酷的剝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农民的极端的穷苦和落后，就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經濟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一九頁）而历史上的貪官，便是“地主階級这样残酷的剝削和压迫”的突出的代表人物。怎么說貪官比“清官”好呢？这是沒有任何根据的。

近来有一位同志說：“如果說貪官比清官好，照这样邏輯推下去，秦檜就会比岳飞好。岳飞是緩和了階級矛盾后，延緩了宋王朝的崩潰；秦檜反岳飞之道而行，加剧

了阶级矛盾，可以加速宋王朝的崩溃，似乎秦檜倒比岳飞好了”。这话我很有同感。第一，说岳飞缓和阶级矛盾，秦檜加剧了阶级矛盾，因而后果不一样，在历史上怎样也看不出来。第二，用这种逻辑推下去，恰成了是非颠倒。

我认为阶级矛盾，是阶级社会经济制度发展所引起的必然的结果，不是几个清官所能缓和得了的。同样，也不是几个贪官就能使之加剧的。这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是反社会主

义的。现在似已成为定论。有些同志，是不是鉴于吴晗同志在这些问题上犯了错误，就要矫枉过正，走到另一个极端，不分皂白地把历史上的“清官”一笔抹煞呢？如果真以一笔抹煞来代替具体分析，就过于简单化，显然和毛主席“一分为二”的辩证法不相合。

最后，我觉得在历史条件下，通过具体分析，如有值得肯定的“清官”，还是实事求是地肯定下来。但是绝对不能去歌颂，因为它在今天早失了现实意义，连借鉴的作用也没有了。

从阶级本性看清官

——专就明代来谈

李 日 华

清官问题相当复杂，不能局限在况钟、海瑞等少数人身上来立论。如果把所有明代清官以及清官类型人物分析排列起来，就会发现他们在（明代）阶级斗争史上所处的一定的科学的地位，看出他们在这段历史上的作用。

清官的阶级基础及其特征

官是国家机器之一，在封建社会中就是封建地主阶级用以统治并压迫农民、人民的工具。清官不能例外。但亦不能在“不能例外”一语下，把清官和贪官之间的界线也给它抹掉。

作为国家机器的官，是清，是贪，是对国家命运有着相对的关系的。朱元璋一做了皇帝，就“重绳贪吏，置之严典。”府州县吏来朝的时候，就面谕：“天下新定，百姓财力俱困，如鸟初飞，木初植，勿拔其羽，勿撼其根。然惟廉者能约己而爱人，贪者必腴人以肥己。尔等戒之！”时方克勤为济宁知府，开荒有治绩，洪武八年入朝，太祖嘉其绩，“赐宴遣还郡”，后为人所诬，就“謫役江浦”，又以“空印事连，逮死”。后来，成祖、仁宗、宣宗、英宗都一样，对清官是动辄叫他入朝，赐宴、嘉赏，遣还原任；但坐小过，辄逮系不贷。

此外，洪武时又还設“彰善榜”、“圣政記”，把清官的姓名写上以示范于天下。同时对貪官又有剝皮刑的规定。这样，明代最高統治者如何努力于清官的培植，貪官的抑制，也算无所不至了。

不待說，封建时期的国家机器的阶级基础，就是地主阶级。周忱是有名的清官，史称他“其治以爱民为著”的了，但当他放粮給百姓用时，就說：“努力种朝廷田，秋間又納朝廷稅”。这就是說，田是朝廷的田，納稅給朝廷也是很合理的。这还不是十足的地主阶级立场？

清官貪官的界綫还是划清为好，对于問題的解决有帮助。

明史卷二八一循吏传，和卷一六一未标循吏传的循吏传，清官的特征是：

一、忠于君，孝于亲。

二、廉洁、俭朴。

三、敢抗大官、朝官和宦官。

四、抑豪强，平冤獄。

五、兴修水利，增辟土田。

六、豁免逋負、額外賦稅、額外徭役，或没江海田。

七、救灾，恤貧。

这七条都是为巩固封建制度，为巩固封建統治阶级政权而服务的。这是大前提。貪官也是在这一大前提下服务的，但是七条中大部分，尤其是第二、第三、第四这三条就是貪官绝对做不到的。所以七条中除二、三、四这三条外都不是划分清官貪官的界綫。直接与农民关系最为迫切的，还是第四条。因此，农民眼中，清官貪官界綫最分明的，就是看能不能抑豪强，能不能平冤獄。当然，最好能兼七条而有之（可能第一条有没有，无关紧要），

农民是会給予好感的。

为什么抑豪强和平冤獄，农民眼中最突出？“天下衙門一样开，无錢无勢莫进来”，进得去，出不来。农民身受的痛苦，就在于平日在地主、豪强的剝削、压迫下做牛做馬地活着；一旦給他們造成了冤獄，那就莫再想活！村子里沒道理可讲了，才到衙門里来打官司，明知官司打不得，但是迫于所受欺侮太大，透不过气来，才冒险走进衙門里来的。甚或不因打官司而白白地被捕进来的也有。偏偏衙門，差不多祖祖輩輩都是貪官汚吏的天下。衙門即地獄，不死也一定要屁股吃板吃棍。原来在乡下，走投无路时，就会叫“天开眼！”的。天是沒有眼的，明明是幻想。清官就是适应这个幻想而受到含冤农民的感激的。由天开眼，一轉而为“青天”，从悲憤中叫出，是可以理解的，是从来貪官多得很，清官少得很的反映。

农民头上，老是黑越越的天的。給他們叫喊出“青天”的机会是不多的。况鍾在苏州，被人民称为“青天”，就是因为苏州是好地方，从来都是貪官多，而清官是絕无而仅有的。有了就要以“青天”称之了。我們相信，人民称清官为青天，当是事实。因为农民、人民，并不是不到一定的阶段都会拿起武器鬧革命的。如果拿起了武器，觉悟提高了，当然再也不会叫人青天了。

如果农民不呼清官为“青天”，不給他以感动，或感激，那么，清官虽出现也未必会为皇帝所嘉賞，也未必会为封建历史家、封建文人所渲染，竟神秘化到閻罗王都得对包公訖座。

清官的确为历来的封建地主阶级所歌

頌。但是，这歌頌是要掩盖阶级剥削阶级压迫而加以美化的。农民的感情，就不同，是处在被剥削压迫中的叫喊。掩盖也罢，叫喊也罢，共同的一点就是反映出阶级斗争的激烈。

清官在历史上的地位及其作用

清官出现在历史上，是阶级斗争经验为统治阶级所吸收的结果，跟被剥削压迫者的反抗、斗争、革命分不开的。

清官的出现，不是末朝现象，而是盛朝现象。明史上，象况钟、海瑞这一型类的清官，集中记载在卷一六一、卷二八一中，就中类型最鲜明的，如周新、方克勤、况钟、陈本深、刘实、杨瓚、陈选、张昺、吴履、史诚祖、王源、翟溥福、李信圭、张宗璉、赵豫、丁积、唐侃、湯紹恩、徐九思、龙嵩、张淳、陈幼学等，大半数以上都是明中叶以前的人；中叶以后寥寥无几。这一点，很值得注意。

朱元璋从农民出身，做了皇帝，对于天下衙门的黑暗，看来还记忆犹新，所以明史作者，一则说他“惩元季吏治纵弛”，二则说他“重绳贪吏，置之严典”，再则说“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以当上指，吏治焕然丕变矣”。

作者又说，洪武而后，“吏治澄清者百余年”，澄清到怎样？大概指永乐、宣德之间清官多了一些，就算数了吧。其实，天下乌鸦并没有变白。成祖在北京尝对左右说：“六部属从臣，不贪者惟逵（师逵）而已。”可见正在“焕然丕变”时期，属从皇帝的近臣，其不贪者尚且仅仅一人，属从以外的官怎样，可想而知。师逵是清官吗？跟清官的典型对照起来就有问题。他在建

北京宫殿时，往湖湘采木，以十万人入山，搞得人民不堪其扰，许多人忍不住就暴动了。师逵，当然不是人民眼中的清官。（注：因为清官，不单要不贪，而且要能爱人，能有惠政。师逵没有这些，师逵就当不上清官）六部属从近臣，何止百人？而真正值得称为清官的，就一人都没有。六部以外，地方上如何？成祖又曾道叹：“往往下询民间，皆言苦吏苛急，能副朕心者实鲜。”又宣德五年（一四三〇年），与况钟同批，从各部院挑选出来的“廉能者”，派出去做地方上亲民之官的共有九人，而见于明史记载的就只有罗以礼、莫愚、陈本深和况钟四人而已。这么严格挑选，要能真正变成清官，不上半数；没经挑选，要他自发地成为清官，当然就更成为不可能。

明代天下有府一五九，州二三四，县一一七一；每府、州、县设长吏一人，胥吏若干人，估计全国当近万人。各府州县还有许许多多的司、所、局或卫等，又有大大小小的官吏，又近二万余人。两共约三万人。这当中，清官占多少？贪官占多少？贪官的数没有记载；清官的数，包括类型不太鲜明的在内，集中记载在上述两卷之中，略计一七〇人左右。加上散见其他各卷的，估计至多亦不能上二五〇人。有明一代，二七五年，平均每年不到一人。三万人中仅一人，真是少数！

清官少数，当然就是贪官多数，滔滔者天下皆是！

明初的统治者很注意培植清官，按道理，清官应该象雨后春笋自然辈出。但为什么总是贪官多而清官少，为三万与一之比？剥削阶级，无论如何，在重绳之下，

严典之前，还是要剥削时就剥削，要贪污时就贪污，要在法时就枉法，这完全是剥削阶级本身阶级本性注定的，自然而然的。何况大家一样，官官相护，更有恃而无恐。所以贪官是阶级社会必然的产物。清官呢？就相反，仅仅是剥削阶级接受被剥削阶级的反抗斗争等打击教训，有意培植出来的产物，是偶然的产物。必然所以多，偶然所以少，归根到底，都是取决于其阶级本性的必然性的。

其次，为什么清官的出现，明初期多，而明末期少呢？明初土地关系，阶级关系都还比较和缓些，因而农民的反抗还停留在个人到衙门里去打官司，这个停留，会给清官出现以比较多的机会。因为清官正要在抑豪强，平冤狱等打官司上取得农民的感动，叫他“青天”。等到土地关系和阶级关系都越来越坏，越来越紧张的阶段，农民反抗的力量，就会由个人的变成大伙儿的，变为整个农民阶级的力量，到此，农民便再也不是打官司，而是吹号角闹革命了；号角一吹，闹起革命，清官便会惊慌失措，羊皮一剥，虎相毕露，厉兵秣马以镇压革命了。阶级本性决定了他，再也无所谓“爱民”，再也做不成“清官”，回到了无所掩饰的剥削阶级的原原本本的地位。

清官的地位，只存在于农民反抗还是打官司的阶段而不存在于农民已吹号角的阶段。清官是否始终都是清官？会不会变？不取决于他个人的意志，而取决于历史的矛盾，取决于农民反抗力量的发展，力量小时清官就存在，力量大时清官就不存在。但是清官存在与否的问题，也得从统治阶级的腐化及其腐化的进程联系起来

考察。明初最高统治阶层生活还没有腐化，还晓得运用种种方法以培植清官，清官自然多些。到了后来，最高统治阶层腐化了，满朝官员也腐化了，于是天下的官再贪也没人管了，到此，配合着上述阶级矛盾的进展，社会就进一步更黑暗，更动荡了；因而农民就更有力量以进行斗争，敢于触动清官所属阶级的阶级利益了，那里还有清官，而清官自身也就失去其存在的依据了。

总之，清官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是出现在阶级斗争还没有十分尖锐或者十分紧张的时候，农民除了通过打官司以外还没有其他途径可以解决痛苦、解决矛盾的时候，或者连官司都没得打，白白被捕，白白坐牢等死的时候。过此，阶级斗争十分紧张了，所有或者绝大部分的被剥削压迫者反抗力量已经成大联合，有组织，有领导，可以摧毁所有的旧的衙门，而建立自己的新的衙门了；清官那里还有可能存在的余地？这是规律。从来的统治阶级对此恰恰就是无知，所以他们老是满脑袋幻想，以为通过召见、赐宴、赏赉、超擢、登彰善榜，以及立碑、立祠等方式，通过小说，通过戏曲，描成天上人物，可以使人神魂颠倒了起来，这样清官就必然会雨后春笋般出现，老百姓永远都会伏伏贴贴地睡觉，老子江山是铁打的，那还有什么问题。有那么样的阶级，就有那么样的愚蠢。

谁也不能否认，清官可以有他自己主动的作用，可以大大地刚正慈直一番，勇于任事，不怕大官，不怕豪强，也能平冤狱、兴修水利，以及其他兴利除弊的“惠政”，表面上会获得“青天”的称号，一时

的会和緩一些“矛盾”。

不能說，清官不起作用。但問題不能这样簡單解答。因为清官在整个封建統治階級中毕竟占极少数，远不及貪官象汪洋大海般存在。在此汪洋大海之中，清官不过一滴，怎么淡也冲不淡海水的咸。就在这么一种关系上，清官的作用，相对地就給貪官对銷了。至多可以这样说，对某一个別农民，或某一地方的农民，搞了“惠政”，起了作用。国家之大，人民之多，貪官到处有的是，清官怎能跟他們抵銷？

有人說，清官能起調和矛盾作用，所以清官比貪官更坏，因此又有人說，那么严嵩比海瑞更好，这一爭論，反复了很久，要不外乎是过分強調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是不正确的。我們要盯住整个社会階級矛盾的发展，整个社会階級斗爭的发展；把个人，把問題，放在整个階級斗爭发展中来衡量。

其实問題还不在此。有明一代，推动社会前进的階級斗爭力量，无疑的是农民和矿工，而农民和矿工又往往联合在一起，所以斗爭就越来越高漲，創造着从明到清的历史。这里，清官是没有份的，没有作用的；清官和貪官一样，只有被淘汰、被抛弃的位置。

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农民的反抗，碰到了清官，当可以說，是会削弱的。但是，基本的階級压迫还没有消灭，被压迫者的階級斗爭会由低潮到高潮的，会由告状到起义的，就是說会由量变到质变的。当还处于量变的阶段，就是停留在告状的阶段，尽管清官会摆出公正的样子，但是一到质变的阶段，就是到了起义的阶段，清官就再不是清官，完全和貪官一样，羊皮撕了，虎相毕露，也是一个格杀勿論者！階級社会中，不可能有一心为人民服务的官，一定要到階級剝削制度消灭以后，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那就一心为人民服务的官，多得得很了。

封建社会越走下坡路(如宋、明以后)，封建統治階級就越要依靠清官，歌頌清官，以此来麻醉广大人民。可是，历史发展的规律，从来都没有让統治階級打好这一如意算盘，要給人民推翻的还是給推翻了，歌頌实等于放屁。

然而今天吴晗同志就看不到清官的階級本性，反而自己也做海上逐臭之夫，那就未免要使人怀疑：是否愿开倒車，远离社会主义，去做博物館里封建皇帝治下阴魂似的忠臣孝子？

清官是人民的要求，不是統治者的美化

刘 节

封建时代是不是有清官，这确是一个問題。什么叫“清官”呢？若照我們现在人

的眼光去衡量，古代所謂“清官”，都是不清的，与統治階級“沆瀣一气”，到底清在

那里？并且在当时，真正合乎标准的“清官”，也真是“凤毛麟角”，少得可怜！在封建时代的人民看来，宋代也不过一个包拯，明代也只有海瑞而已。不过看你用什么作标准吧，事实上比包拯、海瑞更清一点的应该是还有的。中国封建时代所谓“清官”，不只是在法令范围内进行剥削这一界限，还有封建道德范围内的行为作标准，人民舆论是以封建道德作标准来分别“清官”和贪官的。我们现在人知道封建道德是反动的，当时人大多数不是这样看。我们是在讨论古代的“清官”，不是在讨论现在的清官，自然只好先用当时人的标准来说。古代没有清官，正如古代没有真正的民主一样。因此，古代所谓“清官”，应该有两种看法：一种是用现在人的眼光去衡量古代人，另一种是用古代人自己的标准去看。我们是在讨论历史人物，首先应该用古代人的标准来讨论。至于古为今用，那是不成问题的，只要看你写文章的手法和读文章时的主观倾向。说古代没有清官是可以的，说古代的“清官”还不如古代的贪官好，那就要出许多矛盾了，连说这句话人自己也无法解决的。不是有人说吗：难道秦檜要好过岳飞？如果说：岳飞固然好，秦檜也还不错。这也能算是以现在人的眼光去衡量古代人物的办法吗？

其次就要讨论到历史上产生“清官”的条件，“清官”的阶级属性是什么了。既然说古代没有真正的民主，也就是古代没有产生清官的客观条件，这自然可以说古代没有清官。那末为什么又说“清官”和贪官之间又可以划出一条界线来呢？我以为这种产生清官的条件就是当时的“清议”了。“清议”的形成当然出乎那时候的舆论，舆

论的基础就是封建道德观念，就因为封建道德本身不是真正的民主，因此所借以产生的“清官”也不是真正的清官。但是不能否认，这确乎是产生古代所谓“清官”的条件。既然是出于以封建道德作基础的舆论和“清议”，所以其基础是不健全而且不巩固的，是不是能接受这种“清议”，就要看那个人的主观努力，接受这种“清议”的人也决不会很多，但在当时舆论的压力下，“清议”是存在的。缘故就在于随声附和的人多，会造成一种压力，却也能够造就出当时人所说的“清官”来。虽然真正能接受的人不多，也不是一个也没有，越到后来，这少数的人，越加成为“清官”的偶像，又加重了“清议”的压力，使人闻风兴起。黄继光、董存瑞之后出现了不少这一类革命烈士，性质虽然迥乎不同，这种社会发展规律却是一样的。这一类不算少数的革命烈士，正因为他们自己的主观努力够，才能完成在行动上把主观和客观统一起来。象包拯、海瑞一类封建时代的“清官”，也都是在“清议”的督促下，又能坚持主观努力，才能多少完成了一部分的民主精神。若问他们的阶级属性，那不用说，是统治阶级的道德范畴，其中也或多或少地表现了人民性和民主性。例如屈原、杜甫不都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文人吗？其作品中不是也含有不少人民性和民主性吗？舆论确乎是变精神力量为物质力量的桥梁。

道德感是人类的社会本性，就因为人是社会产物，这种特性必然地会反映在人类的意识形态中。其表现形式就在于个人的言论和行动中，若就其本性说，则是社会的，这就是道德感所以能够形成为舆论，出现了所谓“清议”的缘故。只要造成

輿論，变为“清議”，掌握了群众，便成为物质力量，反过来推动当时的社会，一直到这种社会根源消失以后很久很久，还会起很大作用。所以封建道德中的四条繩索——神权、族权、父权、夫权，一直到现在，在中国农村中还未能鏟除淨尽。道德感在人类社会中有深厚基础的，它不同于其它社会制度，例如法律，只要社会制度变动，就要废止而消除，道德形式，面貌可能有种种不同的过渡形式，但是不会死灭；恰恰相反，这种最基本的东西反而越到共产主义时代，才能真正充实起来，达到最完滿的地步，那时候才有主观和客观相统一的积极行动，名副其实的道德。在封建社会里只能够有一线曙光而已，只要有心人作了主观努力，很好地接受輿論中的合理成分，也会起了很大作用，也能够为当时人民服务到某种程度，那怕是最微小的程度吧。

现在就要說到海瑞是不是清官，是不是有人民性、民主性？据我看，应该說：各有不同程度的存在成分。首先問：海瑞是不是为人民呢？我的答复是肯定的，自然有一定限度，不能同现在的好人好事相比。但是有很多现在人远不能比上海瑞，也还是有的。否則，我們就不必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了。在当时說来，海瑞是为人民的。象张居正这样的人，都說海瑞虽然作事偏激，“而其心則出于为民”。海瑞自己的奏疏上也說：第一是实行“均田”，第二也要“限田”；第三才是行“一条鞭”法。海瑞不是开宗明义就是为人民出发嗎？不得已，行不通，才一直降到采用“一条鞭”法，而基本上还以便民为主。当然，也照顾一下当时的統治者，基本精神是为人民

的。又如开通吳淞江事，很明白摆在那里是为人民的。我們只能說：我們现在兴修雷州青年运河比海瑞疏通吳淞江有意义得多，也困难得多，伟大得多，但不能否認两者同是为人民。平冤獄自然是平人民的冤。就算退田是給官府，最后也是于人民有益，总比算在一姓人的帐上好吧？无疑，海瑞是当时統治階級的官吏，是为当时統治階級服务的。但在一群庸庸碌碌，那至貪污腐化透頂了的官吏群中出了象海瑞一样的“清官”，不只是在当时社会中是难能可貴的啊！吳晗同志写《海瑞罢官》时，也許有“激浊扬清”之意，想引起“发思古之幽情”，“創当今之奇迹”。其实远不如表扬当今的好人好事来得直截了当。

所謂“幽情”二字倒要加以解释补充，我指的是历史上的优良传统所透露出来的一线曙光。在我們现在，說民主，实行民主都是比較容易。在二千多年前的孟子，就能說“民为貴，君为輕，社稷次之。得乎丘民，而为天子。……諸侯危社稷，則变置”。就很利害了！这还不算是真正民主时代在二千多年以前的一线曙光嗎？朱元璋是封建时代的专制君主，就因为孟子說了这几句話，他就說：这个老头儿若到现在还活着的話，我要重办了。結果是把孟子的牌位从孔庙里攆出去。虽然以大皇帝之权力，还是拘不过群众的輿論，终于把孟子的牌位又請回孔庙里来。所以只要政治压力輕，正气得到伸张，輿論就会越来越健全，真正的清議也就会起了推动作用了。如果政治压力大，輿論也就不能很好地伸张，也就不容易使人在行动上做到主观和客观的合理統一，个人努力就起不了作用了。我們现在好人好事多，古代“清

官”这样少，正是一个绝好的对比。

明代有三个人可以作三种类型的“清官”代表。王船山(夫之)他比较晚，明清之际人，做过一小段时间小朝廷的小官，后来就脱离政治关系，隐居在湖南一小县不出来了；他算是最清了，几乎不与统治者发生关系。“不事王侯，高尚其志”，清则清矣！无奈在当时没有为人民作什么事。这样的人在中国古代是不少的，“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不与统治阶级“沆瀣一气”，是好的。第二个是杨椒山(继盛)，他比海瑞稍稍早一些，因为弹劾严嵩，受到残酷的迫害，结局很惨。虽然一直至今还留刚正之名，但于人民未有做很多实际事情。海刚峰(瑞)就不同了，言行一致，刚直不阿，也真是替人民作了不少好事。做了大官，而一辈子“含辛茹苦，垂白之年，终不使廉有余粟，囊有赢金”。真算是“庸中之矯矯，鉄中之錚錚者矣！”就不能不说他是清官了，并且不只清在自己，也可以说得上能在行动上做到主观和客观的合理统一。虽然与现在有所作为的人民勤务员相比还有差距，在古代统治阶级的重重压迫下作了那么多事，不真是有才又有德的人是做不到的，我们不能把这种人看得太轻易了啊！

有人说：“清官”是古代统治者对其统治工具的美化，因以笼络人民的。我以为这句话只有一部分理由。例如海瑞死后，广东的统治阶级就为他立牌坊，题上“盛世直臣”，“粤东正气”两句话，这实在是统治阶级对他们所谓“忠臣”的美化。相反的有些记载，倒是说明古代有些“清官”，确实经过古代农民起义领袖们的承认的。他们确实是尊崇这些人。这类例子并不算

小。例如《后汉书》卷六十五，郑玄传：

建安元年，(玄)自徐州还高密，道遇黄巾贼数万人，见玄皆拜，相约不敢入县境。

这不是黄巾军承认郑玄是清官，不只是不杀郑玄，而且救了一县人吗？再如《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八，说李自成的事：

钟祥(今湖北境)知县萧汉有贤声。贼戒其部曰：杀贤令者死无赦。乃幽之寺中，戒诸僧曰：令若死，当屠尔寺。僧谨视之。

就这两件事看来，分明古代农民起义军领袖是有过承认当时所谓“清官”的事。到了现在我们却不承认了。我们以现在的眼光不承认古代有“清官”是可以的，硬说古代农民起义军领袖不承认有“清官”是不够的，因为他们早已承认了呢？据我的看法，古代农民起义军确实是要求有清官，在某一适当时候，也确实保护了“清官”，但这些都与“清官”不一定就清这一概念相矛盾。以上所论，都还只是指实际上有的历史人物而言，至于戏曲上的“清官”，又当别论了。

我所说的：清官是古代人民的要求，不是统治者的有意美化一句话，倒不光是从古代农民起义军保护过“清官”一事中推论出来的。主要还是从元代以来的清官戏中推论出来的。历史剧中关于海瑞的，并不算多，而且内容也比较简单，距离事实还不算太远，夸大的成分也不算多。一说到包公戏，就大不相同了。从元代以来，直到现代，真是层出不穷，越编越玄了。归结起来说，戏曲中的包公形象是人民的要求，不是统治者的美化。听我说说吧。《鲁斋郎》里杀了花花太岁，《陈州果米》里

杀了贪官污吏，算了什么。《打龙袍》等于打了皇帝，《铡美案》杀了驸马爷，《赤桑镇》把一个贪赃犯法的侄儿都杀了，而且包公是嫂嫂把他养大的，嫂嫂只有一个儿子，这种人是多么“公尔忘私”啊！最出奇的就是《探阴山》了！连阎罗王都不公正，出了差错，包庇了侄儿，还要包公出来纠正一番。这些事，实际上从来也没有的，也不可能有这样事。就是因为是人民群众的要求，没有清官便罢，若是真正出现清官的话，非同我们所需要的包老爷一样清正不可！世界上不平的事多着呢！那能只向贪官和恶霸出气就算够了呢？所以说古代还没有真正的民主，但是人民早已有这种要求：快快的，彻底地出现真正民主吧！这个世界上从有其人的“鲁斋郎”，到无其人的“阎罗王”，全部都是不公正的啊！你说这不是古代人民的呼声是什么？难道统治者真的出来美化一个工具有资格来打皇帝吗？这种蒙昧中的一段“幽情”，还能说不是黑暗世界中的一线曙光吗？

因此就编写历史剧说，也有一个深化问题存在的。戏曲里的清官不一定一模一样和历史上的“清官”丝毫不能走样的。《探阴山》里把阎罗王都说成不公正，还不如包公，在旧时代的戏曲里确是一种深化的方法。旧社会很黑暗，把鬼来影射恶人，是不得已的事。我们现在当然不必采取这种办法，但照样还有另外的方法可以深化的。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一剧对于深化一层确实没有做到，这戏内容并没有象包公戏一样，把海瑞的形象提高了多少。例如现代戏《红灯记》，如果照一般简

单办法，把李奶奶、李玉和、李铁梅三代都是一家，对于戏剧的结构也不会有什么破坏吧？可是说家史一场却更深一层地表出原是陈、张、李三姓的偶然结合，恰恰加深了对于反动派的深仇大恨，不是更有意义？这还不过是在对话中表达出来的。又如《山乡风云》中借书一场，把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就更加“跌宕生姿”，造成紧张气氛，更加深一层说明“人多力量大”一句话的真实性；也可以作为：“好的人多呢，还是坏的人多？穷的人多呢，还是富的人多？”几句话的事实证明。我们不要轻看了这种深化，这正是反映了人民心目中的，出不出来的深刻要求呢！《海瑞罢官》一剧深化不够，还不如一般旧剧，吴晗同志本已承认了这一点，就是所谓：“没有戏”。我们也不能对他多有所苛求了。

历史剧是可以写的，也可以演的，问题只在怎样写法。就是怎样写法才能古为今用。古代的“清官”要叫他变成经过马列主义衡量过的新人物，出现在今天的舞台上，的确比较困难，要比写现代戏困难得多！所以演历史剧的效果远不如演现代戏那么大。同时也可以想到，表扬古代的“清官”，也远不如表扬欧阳海、雷锋、王杰、焦裕禄、麦贤得诸位现在的革命干部所起的影响大。就因为现在人容易被现在人所了解，也容易被现在人所接受，就更加在戏剧里突出了政治。历史剧既比较难于被一般观众所理解，而且争论也比较多得了。

1966年4月4日

評所謂“让步政策”

謝 仰 虞

在我国史学界里，长期流行着一种所謂“让步政策”的观点，說什么在中国历史上，每次农民大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新建立的封建王朝統治者，就会施行減輕对农民的剝削和压迫的“让步政策”，从而推动了社会經济的发展，出现历史上的“太平盛世”。汉、唐、明、清的初期，就是其中的显例。这个观点，不但出现在不少历史专家的論文和专著之中，而且还为一些历史教科书所采用。我們中学历史教师，看到这既为专家們所論述，又为教科书所采用，于是深信不疑地依照这样的观点去对青年学生讲授，結果，使它流播很广，影响至深。最近，史学界展开了对这个問題的討論，引起了我們的重視，得到了很多教益，觉得这是个重要的問題，有必要予以严肃的对待。我們考虑了有关的意見，觉得过去一些同志对所謂“让步政策”予以肯定和頌扬是錯誤的，因为它背离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論，也背离了历史的真实。

首先，我們贊同同志們如下的意見：封建統治者是不可能放弃或放松对农民的剝削和压迫，实行真正的“让步”或“让步政策”的，“让步”和“让步政策”是不存在的。我們不能幻想反动統治阶级会对人民

作出什么“让步”。

誠然，汉、唐、明、清初期的統治者，根据封建史家的記載，都曾招撫流亡，授田减租、輕徭薄賦……表示与民休养生息。假如說，这就是新王朝統治者对农民的“让步”，那么，这样的“让步”现象是存在的。不过，問題不在于是否存在过这些现象，而在于我們应如何去通过这些现象，抓住它的实质。我們以为：这些所謂“让步”措施，不仅沒有对农民作出了真正的让步，而且，它的实质，也不过是封建統治者为了維持其新建立起来的統治秩序而阴险地玩弄的一种欺騙。

在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是两个根本对立的阶级。两者之間，存在着绝对不可調和的矛盾。对农民要剝削，要压迫，乃是地主阶级的本性。实在难以設想：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封建統治者，特别是新王朝統治者，在残酷地镇压了农民大起义之后，两手刚刚沾滿了农民的鮮血，而会忽然大发善心，对农民实行真正的让步。毛主席曾教导我們：“我們說‘帝国主义是很凶恶的’，就是說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帝国主义分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他們也决不能成佛，直至他們的灭亡。”（《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帝国主义

分子是如此，历史上的一切反动派也是如此，难道封建社会里农民阶级的敌人，竟会例外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揆诸汉、唐初期的历史事实，也是可以作出否定的回答的。

《汉书·食货志》上曾记载有汉武帝时董仲舒的一段话。他说秦用商鞅之法，除井田，开阡陌，又颍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十五；以致贫民常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挣扎在死亡线上。“汉兴，循而未改”。而且，“急政暴虐，赋歛不时，朝令而暮改”（汉文帝时晁错语），也和秦代没有两样。甚或“豪强之暴，酷于亡秦”。——那汉初统治者对农民的让步在哪里？

唐初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颁行，有些人曾指出这是“让步政策”的典型事例。其实，所谓均田，只不过是统治者把业经游离于土地的农民，重新束缚于土地上以供其剥削的措施。均田制也并非唐初统治者对农民“让步”而创始的。复考武则天、唐玄宗时敦煌户籍残卷，授田即在宽乡，也远远不会足额。如常誓才户，应受田一顷三十一亩，实受只有永业田十八亩；又如曹恩礼户，应受田三顷六十四亩，实受田只有口分田一亩；其余都是永业田。按永业田父子相传，为本户所原有，无口分田，实际就是官府并不按丁授田。据考唐代授田数比隋代少了约三分之一，而租、庸、调的剥削，却比隋代并没有什么减轻，此消彼长，实际上是加重了。而且，即在贞观时，“供官徭役，道路相继，兄去弟还，首尾不绝，……春秋

夏冬，略无休时。”所以，《旧唐书·食货志》上所谓贞观时“征歛赋役，务在宽简”，实不过是封建史家颂扬粉饰的陈词滥调，应是不足凭信的。——那唐初统治者对农民的让步又在哪里？

封建统治者，无论是那个王朝，也无论什么时候，都不会改变过它的阶级本性，忽然“仁慈”起来，对农民作过真正的让步。正如有些同志所指出的：农民在革命中所没有得到的东西，同样在失败后，在新王朝统治者手中也没有得到。新王朝统治者纵或懷于旧王朝的崩溃覆没，觉得有暂时转换一下对付农民阶级斗争手段的必要，于是施行一些轻徭薄赋，招辑流亡……等所谓“惠政”，不仅是徒托空言，口惠而实不至，而其实惠，反常常是落到了地主阶级的身上。荀悦对汉文帝的“务除租税”，就指出这不过是“适足以资豪强”。唐代施行了均田制，到“开元之季，天宝以来”，“兼并之弊”，即已“有逾于汉成哀之间”。再退一步来说：这些“惠政”，就算有一点儿落到了农民的身上，归根究底，仍不过是旨在维持农民必要的生存条件，以供其日后加紧剥削的一种欲取先与的伪善欺骗手段而已，这对于农民是没有什么真正的“让步”或“恩惠”可言的。

所以说，封建统治者对农民的真正让步，是不存在的。所谓“让步政策”，揆其实质，不过是对农民阶级的政治欺骗。

其次，说到封建统治者的所谓“让步政策”，能推动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从而出现了历史上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太平盛世”，也并不符合于历史的实际。

我们先要指出所谓“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只不过是封建史家对封建统治稳

定局面的渲染，这些所謂“太平盛世”，实际上并不“太平”。农民在大起义失败后，重新陷入新王朝統治階級的殘酷剝削和壓迫下，階級鬥爭始終不斷地進行着。漢初“相聚保山澤”者固大有人在，唐初貞觀時也“劍外騷然”；高宗時“群蠻聚為寇”；武則天時，更是“山東雄猛，由來要氣”，“重以官典侵漁，因事而起”。明、清王朝初期，有關農民起義鬥爭的事實，也是史不絕書的。

不錯，漢、唐初年，在統治者的殘酷剝削下，曾使漢武帝時的“太倉之粟，陳陳相因”，也曾使唐開元時，“公私倉廩俱充實”。但是，這只是封建國家富足了，地主階級富足了，而廣大農民，在漢初，則仍然要“賣妻鬻子”，流為“餓殍”；在唐初，也仍然是“四海之內，日益困窮”，破產流亡，過着悲苦無告，艱難竭蹶的生活。試問：這樣的“太平盛世”，究竟是那個階級的“太平盛世”？可見，封建統治者施行的所謂“訖步政策”，並沒有帶給農民真正的“太平盛世”。在有剝削階級的社会里，農民是不可能擁有真正的“太平盛世”的。要有，只有在社會主義的今天。所以，我們不能跟封建史家如出一轍地去頌揚渲染地主階級的“太平盛世”。今天的史學工作者，與封建史家應該是沒有什麼共同的語言的。

至於社會經濟的發展，毛主席曾指示我們：“在中國封建社會里，只有這種農民的階級鬥爭、農民的起義和農民的戰爭，才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若認為歷史的發展，社會經濟的發展，是由封建統治者的“訖步政策”所推動的，或者說：“對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也有一定的促進作用”，都無異於認為地主

階級也是中國封建社會歷史發展的动力之一。這是與毛主席的上述指示根本違背的。地主階級所代表的是反動的生產關係，他們對農民的剝削壓迫，無論輕、重、強、弱，雖因程度不同，影響有別，而其為社會生產力的阻礙則一，反動階級對社會生產力是絕對不會起什麼促進作用的。明乎此，那所謂“訖步政策”之不可能也不會對社會經濟的發展起什麼推動或促進作用，就不言而喻了。

漢、唐初期，社會經濟之所以能有多少發展，那是由於秦末、隋末農民掀起了急風驟雨的大起義。在起義過程中，打擊了當時的封建統治，摧毀了舊王朝，建立了農民自己的政權，把豪強地主的體面威風，打个落花流水，使農民沖破了地主階級給他們的人身束縛，爭得了一時的人身自由和政治權利，而且從地主階級手中奪回了一部分土地和財物，改善了生活，也為再生產獲得了一些物質條件，鼓舞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於是農民憑着自己直接爭得的革命成果，在新王朝建立初期短暫的相對的安定社會環境下，以他們的辛勤勞動，開辟土地，興修水利，改進生產技術，發展了生產，從而也推動了社會經濟的發展。毛主席說：“因為每一次較大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的結果，都打擊了當時的封建統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同上書）由此，可見漢、唐、明、清初期社會經濟的發展，都是農民的階級鬥爭和生產鬥爭的結果，功勞是絕對不能扯到封建統治者的“訖步政策”身上的。

從以上的論述，可見所謂“訖步政策”的觀點是錯誤的，也是有害的，我們對這個觀點必須加以批判。

列宁著作中有关統治階級

“讓步”的言論應該怎樣理解？

唐 陶 华

关于中国历史上每次大规模农民战争后建立起来的封建新王朝，曾否有过“让步政策”的问题，历史学界正在热烈讨论中。

有一种意见，认为：列宁著作中曾经不止一次地提到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让步”的问题。因而认为，中国封建新王朝曾经有过“让步政策”的说法，是符合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的。这样，列宁著作中有关统治阶级“让步”问题的论述，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就成为解决中国封建新王朝“让步政策”问题的关键之一。

本文试图对于这一问题进行一番初步的探索。

一

第一，统治阶级的“让步”出现在人民起义前，还是出现在人民起义失败后的问题。

有人认为：在中国历史上，每次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失败后，封建新王朝的统治者畏惧农民群众的威力，吸取前代灭亡的教训，对农民实行“让步政策”。所以统治阶级的“让步”，出现在人民起义失败以后。

这种说法与列宁的论点相反。列宁认为：统治阶级只在人民起义快要爆发时，才有可能对人民做出一些让步。因为统治

阶级对人民残暴统治的结果，必然引起人民的反抗。当人民起来反抗，组织武装暴动，以致统治阶级的政权有被推翻的可能时，统治阶级为了维持它自己的统治权，防止革命的爆发，就有可能做出一些让步，进行改良或改革。

例如，一九〇一年时，列宁指出，当时俄国的情况，“最细心而冷静的政治家是应该承认革命的爆发完全可能，农民起义是当时非常严重的危险。”因此，沙皇政府“除了把一些反对暴政和剥削制度的有觉悟的坚强不屈的敌人（即‘革命政党’的‘首领’）残酷杀害”外，“并用微小的让步来收买他们”。（《列宁全集》第五卷，第二三至二四页）可见沙皇政府对农民的“让步”是在农民起义已成为非常严重的危险、但尚未爆发时做出的。

一九〇三年时，俄国的工人阶级日益觉悟起来，在社会民主工党的领导下，进行各种社会斗争。列宁指出：“这时，愈来愈多的群众被吸引到斗争中来，危机只是刚刚开始逼近，每一次搏斗虽然都会使成百人离开战场，但是又会出现成千的更激愤、更勇敢、更有训练的新战士。”这是“革命的预兆和先声”，使沙皇政府“不得不做些让步”。（《列宁全集》第六卷，第四六

四頁)可見沙皇政府對工人階級的“訛步”，是在工人階級已經有了革命的預兆和先聲，但革命尚未爆發的情況下做出的。

至於沙皇政府在十九世紀末年二十世紀初年，對俄國資產階級在地方自治改革方面所作的“訛步”，列寧同樣明確地指出：“地方自治改革是專制政府受社會激憤情緒和革命襲擊浪潮的沖擊而被迫作出的訛步之一。”（《列寧全集》第五卷，第二七頁）可見沙皇政府對資產階級的訛步，也是在革命浪潮快將襲擊，但尚未爆發的情況下做出的。總之，在列寧著作中，我們看到的有關沙皇政府對人民做出的“訛步”，都出現在人民起義爆發之前，而不是在人民起義失敗之後。

人民起義失敗後，反動的統治階級會不會畏懼人民的威力，吸取起義的教訓，對人民做出一些“訛步”呢？列寧認為，這是不可能的，相反地，他們還會轉入進攻，加強鎮壓的手段。

第一個例子是一八四八年德國革命的失敗。

列寧指出：“在1849年，革命被鎮壓下去了，一系列的起義都遭到了失敗，人民爭取到的自由實際上又被奪走了，反動派兇惡地對付‘革命者’。”（《列寧全集》第十卷，第一一四頁）這是德國反動的封建統治階級於資產階級革命失敗後，向人民轉入進攻的歷史事例。

第二個例子是一九〇五年十二月莫斯科無產階級武裝起義的失敗。

列寧指出：“十二月起義結果遭到失敗，於是沙皇專制政府就隨着工人階級進攻的減弱、群眾鬥爭的減弱，而把工人階級所獲得的成果相繼奪了回去。”（《列寧全

集》第十六卷，第二九五頁）這是俄國反動的封建統治階級於無產階級武裝起義失敗後，向人民轉入進攻的歷史事例。

列寧還就沙皇政府對於“訛步”問題的態度，找出了一條規律說：“沙皇政權如不消滅，沙皇的訛步總是不可靠的。沙皇在革命進攻加強時就作些訛步，進攻減弱時就把這些訛步統統收回了。”（《列寧全集》第十六卷，第二九六頁）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列寧告訴我們：當人民起義爆發以前，反動統治階級為了防止起義的發生，有可能做出一些“訛步”。當人民起義已經失敗以後，反動統治階級就步步轉入進攻，倒行逆施，他們是不可能吸取教訓，對人民做出任何“訛步”的，甚至可以將起義前做出的微小“訛步”一筆勾銷。

二

第二，統治階級的“訛步”是否反革命的兩手策略問題。

有人認為，統治階級的“訛步”問題，既然見於列寧著作之中；則“訛步政策”符合於馬克思主義的原理，不能認為是反動統治階級所玩弄的反革命的兩手策略。”（參閱楊國宜、張海鵬：《究竟怎樣認識“訛步政策”》，《文匯報》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九日）

列寧於論述世界各國資產階級對付工人運動的方法時，指出它們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和捍衛自己的統治，採用了兩種方法：“第一種方法就是暴力的方法，拒絕對工人運動作任何訛步的方法，維護一切陳腐腐敗制度的方法，根本反對改良的方法。……第二種方法就是‘自由主義的’方

法，就是趋向于扩大政治权利，实行改良、让步等等的方法”。（《列宁全集》第十六卷，第三四九页）在这里，列宁明确指出，所谓“让步”是反动的资产阶级所玩弄的反革命的两手策略之一。这是列宁论述“让步”问题的基本观点。

不仅资产阶级如此，封建地主阶级也是这样。

列宁论述俄国农奴制的废除时，指出这是沙皇“政府终于因为害怕全体农民的总起义，而让步了”。但同时也指出，在农奴制废除前，沙皇政府对农民进行过“野蛮迫害”、“体刑和枪杀”。（《列宁全集》第六卷，第三八三页）在农奴制废除后，沙皇政府对农民仍然“常常”要用血腥镇压，来“强迫他们接受洗劫他们的‘法令’……”。（《列宁全集》第五卷，第二三页）“而同时它又力图把那条能够保留农奴制地主的政权和收入的道路保持下来”。（《列宁全集》第十五卷，第二九四页）可见当列宁说到俄国封建统治阶级废除农奴制时，曾经指出，封建统治阶级在玩弄反革命的两手策略。

在二十世纪初年，俄国的工人阶级日益觉悟起来，对沙皇专制政府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列宁提到，沙皇政府对于“这样的敌人使它不得不慎重对待，不得不做些让步”，但同时又指出，沙皇政府所以做些让步，是由于“要同先进的社会阶级这样一个敌人作斗争，光靠暴力，甚至是最残酷、最有组织和使用在一切方面的暴力，也还不够”。（《列宁全集》第六卷，第四六四页）可见列宁谈到俄国封建统治阶级对工人阶级做些让步时，曾经指出，封建统治阶级在玩弄反革命的两手策略。

当列宁论及沙皇政府对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让步”时，说：“为了讨好地方自治局，政府向他们作了些微的让步”，同时又指出：“但它实际上并没有向人民做任何让步，它还完全可以重新采取反动手段（确切些说：继续采取反动手段）”。（《列宁全集》第七卷，第四九五页）可见列宁谈到俄国封建统治阶级对资产阶级自由派作了些微的让步时，曾经指出，封建统治阶级在玩弄反革命的两手策略。

一切反动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它们自己的利益，保持它们自己的统治，都在玩弄反革命的两手策略，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自然也不能例外。因此，所谓“让步政策”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所玩弄的反革命的两手策略之一，诱使农民重新做他们的牛马。

三

第三，统治阶级的“让步”对于历史发展是否有积极作用的问题。

有人认为：统治阶级的“让步”对历史发展有积极作用，至少在客观效果上如此。有人甚至认为：统治阶级的“让步”是“革命农民的胜利和地主阶级的失败，意味着失败者在农民革命胜利的面前订立一个‘城下之盟’”。（漆侠：《农民战争与让步政策》，《文汇报》一九六六年三月十日）至少也是农民阶级的“部分胜利。”（张博泉等：《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应怎样看待“让步政策”》，《光明日报》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一日）他们是把统治阶级的“让步”，当作农民争取得到的胜利，来看待“让步”的历史作用的。

列宁的看法和上述的看法，完全不同。

列宁认为：统治阶级的“让步”是它用

以分化和瓦解革命階級的手段。他說：“改良是統治階級的訛步，其目的是阻止、削弱或撲滅革命鬥爭，分散革命階級的精神，模糊他們的認識，等等。”（《列寧全集》第十二卷，第二二二頁）

例如一九〇五——一九〇七年的俄國革命之前，沙皇決定召集新的所謂“立法”的杜馬，作為一種“訛步”，來引誘農民離開革命，並以此來消滅革命。當時有很大一部分農民相信經過杜馬可以獲得土地，而立憲民主黨人、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又欺騙農民，仿佛不必經過革命，農民就可以得到他們所需要的土地。如果不是布爾什維克竭力反對這種欺騙人民的手段，揭穿沙皇“訛步”的陰謀，俄國的許多農民有可能受欺騙而離開革命，而統治階級的“訛步”也可能已經對歷史發展起了消極作用的。

在西歐資產階級國家中，資產階級政府往往利用表面上的“訛步”來欺騙工人群眾，而且能在一定時期內達到它們的目的。列寧說：“一部分工人，一部分工人代表，往往被表面上的訛步所欺騙。於是修正主義者就宣布階級鬥爭學說已經‘過時’，或者開始實行事實上已拋棄階級鬥爭的政策。資產階級策略上的轉折，使修正主義在工人運動中間猖狂起來，往往把工人運動內部的分歧弄成公開的分裂”。所以資產階級的“訛步”，對工人運動是“更加狡猾”和“更加有害的”。（《列寧全集》第十六卷，第三五〇頁）當然它對歷史發展不可能有什麼積極作用。

列寧又認為：統治階級的“訛步”是為了保存主要陣地，而放棄無關緊要的陣地。

例如，當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俄

國資產階級要求憲制時，沙皇政府允許資產階級掌握地方自治局，作為“訛步”。列寧說：“地方自治局是憲制的一小部分。就算是這樣吧。但是這個一小部分，却是用來引誘俄國‘社會’放棄真正的憲制的手段。這是一塊完全無關緊要的陣地，專制制度把它訛給勃興的民主主義，是為了保存自己的主要陣地，為了分化和離開要求政治改革的人。”（《列寧全集》第五卷，第五六至五七頁）

又如，代表俄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十月黨，在一九〇七年的議會綱領中，公開拒絕強迫出訛地主的土地，卻準備許諾任何自由主義的改革，如擴大杜馬預算權和擴大杜馬對政權行動合法性的監督權等。這同樣是統治階級為了保存主要陣地，而放棄無關緊要的陣地的一種策略。（參閱《列寧全集》第十三卷，第一三〇至一三一頁）

中國每次大規模農民戰爭失敗後，封建新王朝的統治者的主要任務，在於如何鞏固新政權，支持各地的地主奪回在農民戰爭中失去的土地和特權。這是封建地主階級所要奪取的主要陣地。在奪取和鞏固主要陣地的過程中，暫時放鬆無關緊要的陣地是可能的或必要的。所以封建新王朝關於輕徭薄賦、減免租稅、招撫逃亡、獎勵墾荒等措施，只是鞏固封建統治、維護主要陣地的一種手段。那里是什麼“訛步政策”呢？

毛主席說：“軍事鎮壓和政治欺騙，是蔣介石維持自己反動統治的兩個主要工具”。（《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一二二五頁）這一論斷對於中國歷代的反動封建統治者同樣適用。封建新王朝的統治者一面用軍

事鎮壓的手段鎮壓農民起義軍，一面又用政治欺騙的手段，以輕徭薄賦和招撫逃亡等辦法，來削弱群眾的鬥志，腐蝕和模糊群眾的鬥爭意識。我們對於封建統治階級的政治欺騙手段，只能加以揭露和批判，怎能粉飾為“訛步政策”，甚至歌頌為農民的“勝利”呢？

有人引用列寧著作中不“完全否定局部的改良”的詞句，企圖證明下面一個論點：“馬克思主義並不完全否定統治階級的訛步對於歷史發展所起的相對的、暫時的、不穩定的某些積極作用；”還“應把這些訛步看作是階級鬥爭的副產品和階級鬥爭的局部勝利。”（張博泉等：《根據馬克思主義觀點應該怎樣看待“訛步政策”》）

對於資本主義社會的改良，列寧的確曾經這樣說過：“改良——這是革命的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的副產品”。（《列寧全集》第十二卷，第二二四頁）他同時又指出：“社會民主黨應當把改良當作無產階級的革命階級鬥爭的副產品來加以利用。”（同上，第二二二頁）只要社會民主黨能夠堅持自己完整的、不折不扣的口號，始終不渝地進行無產階級的革命的階級鬥爭，那就有可能“利用改良來發展革命的階級鬥爭”，“有可能把這些訛步變成革命的武器”（同上，第二二二頁、二二四頁），有可能“把專制制度可能做的訛步從進行欺騙和麻痹的武器變成進一步發展革命的武器”。（《列寧全集》第十二卷，第二〇四頁）

因此，我們可以說：統治階級“訛步”的本身，對歷史發展並沒有積極作用。但是堅持無產階級革命的政黨，如能利用這些“訛步”作為前進中的一定的步驟，來發展革命鬥爭，則可以把本來是欺騙和麻痹

人民的工具，變成進一步發展革命的武器，對歷史發展可以起積極的作用。

對中國封建社會來說，當時的歷史條件不可能有堅持無產階級革命的政黨，再則封建新王朝輕徭薄賦和招撫逃亡等措施，發生在大規模農民戰爭已經失敗以後，那時不可能在短時期內再來一次大規模的革命鬥爭，不具備把封建新王朝欺騙和麻痹人民的工具，變為進一步發展農民革命武器的條件。因此，列寧關於把“訛步從進行欺騙和麻痹的武器變成進一步發展革命的武器，”從而使“訛步”對歷史發展起積極作用的論點，對中國封建社會不能適用。因而某些歷史科學工作者企圖引用列寧著作中的某些詞句，來證明中國封建統治階級的“訛步”，對中國歷史發展起過相對的、暫時的、不穩定的某些積極作用的說法，也就不能成立。

那些極力推崇“訛步政策”對歷史發展有積極作用，至少在客觀上有積極作用的历史科學工作者，所以持有這種論點，是與他們對於農民戰爭的看法有關的。他們受了封建史家誣蔑農民戰爭的記載的影響，認為：在農民戰爭進行過程中，社會秩序是“糟得很”，而不是“好得很”，歷史進程是倒退的，而不是向前發展的。直到封建新王朝建立以後，恢復了統一，經過一段所謂休養生息的時期，歷史才重新向前發展。這樣，他們自然要推崇“訛步政策”，認為它對歷史發展有積極作用了。

列寧的看法卻完全不是這樣，他說：“馬克思根據自己的全部歷史觀點對人類發展的革命時期作了很高的評價，因為正是在這種時期，解決了所謂和平發展時期慢慢積累起來的許多矛盾。正是在這種時

期，最有力地表现出了各个不同的阶级在确定社会生活形式方面的直接作用，建立了后来长期固定在更新了的的生产关系基础上的政治‘上层建筑’的根基。同时，马克思和自由资产阶级的理论家不同，他认为这种时期不是脱离了‘正常’的道路，不是‘社会病态’的表现，不是过激和谬误的可悲的结果，而是人类社会历史中最有生气、最重要、最本质、最具有决定性的关头。”（《列宁全集》第十三卷，第二〇页）

在农民战争时期，农民用革命手段推翻了封建王朝，剥夺了地主的土地，取消了地租的剥削，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这

就为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这正符合于列宁所说的“最有生气、最重要、最本质、最有决定性的关头”。这正是中国历史发展大踏步前进的时期。等到封建王朝的统治者进行反攻复辟，重新建立起束缚农民的枷锁，夺走了农民所占有的土地。这时，历史的发展与农民战争时期相比，正步步走向倒退，封建新王朝的全部政策都是促使历史倒退的具体指针，没有什么积极意义可言。所谓轻徭薄赋和招抚逃亡等措施是封建新王朝全部政策中的一小部分内容，自然也谈不上什么积极作用了。

有关“让步政策”的两个问题

許 宏 然

近来史学工作同志们就去年九月孙达人同志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怎样估价让步政策》文里提出的问题展开讨论，我觉得“让步政策”问题就是站在什么立场用什么观点方法研究历史的问题，是值得重视和讨论的。

在我国通史、断代史和专史的教学和学术论文里，不少同志曾应用了“让步政策”的理论。封建社会发展的历史上，经过大规模的农民战争以后，新王朝为了适应当前需要，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如“去奢省费”，“轻徭薄赋”，实行“均田”，承认“农垦农有”，等等。从而社会生产力

逐渐恢复，出现经济繁荣、文化发展的景象，如汉、唐、明、清的初期，都很明显的呈现这种景象。因此得出了结论：这是封建统治阶级吸取了农民起义的教训，对农民“让步”的结果。“让步政策”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这里便产生了两个问题：其一是，对农民战争后，封建统治阶级进行的一些改革，应看作是阶级斗争在新的形式下的继续，还是看作对农民“让步”？其次是，“让步政策”是否历史发展的动力？现在就这两个问题，谈谈我的看法。

我认为，必须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分

析“計步政策”是从那一階級利益出发？結果对誰有利？才能下結論。

首先我們以唐代为例来分析这一問題。唐初高祖和太宗时代，經過隋末大规模的农民战争以后，对农民“計步”的主要措施之一就是实行“均田制”。“均田制”的实行能否說是从农民利益出发？不能，实质上是从小封建地主階級利益出发的。因为“均田制”的目的是要把农民束縛在土地上，成为封建国家的劳动人手。由于隋末农民起义杀掉了无虑万千的封建地主、官僚豪强。而农民則因受沉重的剝削，連年飢荒、到处流徙，形成了“官观鞠为茂草，乡亭絕其烟火”（《隋书·食货志》）的情况。到了初唐，河南、山东一带还存在着“灌莽巨泽，蒼茫千里，人烟断絕”（《旧唐书·魏征传》）的景象。封建統治階級想以恢复农业生产为手段，把劳动人口束縛起来，防止他們再鬧革命，所以实行“均田”。唐太宗說：“若禾黍不登，則兆庶非国家所有”（《貞观政要·务农》），这岂不充分說明“均田”是为了农业生产增加了，政权得以巩固，防止农民革命发生嗎？！

所謂“計步政策”的另一措施是“輕徭薄賦”，或“蠲免徭賦”，主要是为了什么？是否从农民利益出发？也不是，正象魏征对唐太宗說的“竭泽而漁，非不得魚，但明年泽中无魚。焚林猎兽，非不得兽，但明年林中无兽。”（《貞观政要·求諫篇》）很明显，这主要是对徭賦来源作长远打算的做法。封建統治者又說：“人君賦歛不已，百姓既弊，其君亦亡。”（《貞观政要·辯兴亡》）减免賦稅主要是为了巩固政权，維持君主的地位，确实无可置疑了。

“均田制”結果对誰最有利？是封建地

主、貴族官僚。因为他們得到更多的土地。实质上許多农民沒有得到应得的土地，依然很貧苦。請看下一記載：“天下編戶，貧弱者众。亦有佃力客作以济糶粮；亦有卖舍貼田以供王役。”（《全唐文》卷二四七）“貧弱者众”岂还不足以說明这一事实！

以“減賦”或“免賦”來說，主要也是封建地主得到的利益最多，因为他們拥有大量田地，有田才有賦。农民除少数自耕农沾一点光外，大多是毫无所获的。

其次，看看明初的情况，由于元末农民起义，消灭了許多地主、貴族官僚，加以农民因飢荒不断流徙，結果“田地荒蕪，居民鮮少。”（《續文献通考》卷二）在这种情况下，洪武元年朱元璋下令“农民归耕”，承認已被农民耕垦或即将开垦的土地归农民所有，并分別“免除三年徭役或賦稅”。（《明太祖实录》卷五三）这样做，目的是为了什么呢？統治者自己已經解答了这一問題：“农为国本，百需皆其所出。”（《明实录》卷四一）朱元璋又說：“步急則躓，弦急則絕，民急則乱。居上之道，正当用宽”。（《明实录》卷三六）可知承認农民已垦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是为了生产增加了供貴族地主多多剝削，同时也是为了緩和階級矛盾，巩固統治，害怕过分压榨人民引起激烈的反抗。

关于“輕徭薄賦”或“蠲免徭賦”，当然也是为了統治階級的最大利益着想，朱元璋把农民看作鳥和木，“天下初定，百姓財力俱困，譬犹初飞之鳥，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搖其根，要在安养生息”。（《明实录》卷二五）把人民比作“鳥”和“木”，目前拔不了羽，砍不了根，将来总

是要拔羽砍根的，这样怎能看作对人民有利？

上列史实告诉我们：在农民革命之后，封建王朝实行一系列的改革，主要是从封建地主利益出发，结果对封建统治阶级最有利。想重新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保证封建国家劳动人手，缓和阶级矛盾，防止农民革命发生，以巩固政权。目前少取一点，培养长远税源，实质上是阶级斗争一种手段。用硬办法，怕引起反抗。转过来用软的办法，达到刀剑所不能达到的目的。所以在农民战争后，封建统治阶级进行一系列的改革，不能看作是对农民“让步”，应该看作阶级斗争在新的形式下的继续。

农民战争后，新王朝实行各种改革，经过一定时期，社会经济逐渐恢复，出现了繁荣景象。如果不透过现象从本质上分析问题，认为是“让步政策”导致的结果，从而得到“让步政策”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结论，那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的结论。

毛主席指示我们：“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一九页）毛主席已说得很清楚了，历史发展真正的动力是农民战争，不是农民战争后封建统治阶级的“让步政策”。

由于大规模的农民战争，杀掉了无数的封建地主、官僚豪强，摧毁了腐化残暴的统治制度，使吃人的统治者和残暴的制

度不能继续维持下去，这就是一种推动作用。

无数封建地主被杀后，出现了大量无主荒田，许多农民夺得这些土地成为自耕农。同时大量荒地出现也成为唐代“均田制”实行的良好条件。在明初出现的“荒田”，有些是元朝统治者的“官田”，有些是蒙古贵族的“庄田”，有些是“废寺田”，朱元璋下令“农民归耕”。承认已被农民占垦的土地归农民所有，这说明经过农民战争后，上述荒地确实不少给农民夺得。生产的恢复，经济的繁荣，是在这基础上出现的。这又是推动作用。

农民战争在当时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和没有新的阶级力量的条件下，总是陷于失败，给地主贵族利用去作为换朝工具。他们对历史发展起推动作用，只局限于上述的程度而已。

我们已说过，封建统治阶级在农民战争之后，实行“轻徭薄赋”，“蠲免徭赋”，“安养生息”，“均田”，“赐田”，一系列的改革，主要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实行结果，地主阶级得益最多。但也不能否认，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生活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不过我们要认识清楚，这种改良主义，是跟着农民革命而来，对农民革命不是有益而是有害的。列宁说：“历史的真正动力是阶级之间的革命斗争，改良——是这种斗争的副产品，所以说它是副产品，是因为它反映了那种想削弱和缓和这种斗争的失败的尝试等等”。（《再论杜马内阁》）可知改良实质上是在农民革命后封建地主阶级想削弱和阻止革命的一种手段，对农民革命没有益处，显然它对历史发展不是起着推动作用。

总之，統治階級对农民革命是十分痛恨的，也是十分害怕的。尽管他是农民出身乘着农民革命兴起篡夺革命胜利果实蜕化变质的統治者，也不会例外。他們对階級斗争硬軟兼施，往往在农民革命后，打击报复，一方面大施屠杀；另一方面露出假仁慈的脸孔进行改革。無論是硬或軟都是要达到同一的目的。主要是从封建地主階級利益出发，巩固地主階級的統治。如

果认为改革是表明統治階級仁慈起来，从农民利益出发，主要对农民有利，那就不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看問題，而是离开階級分析方法的謬論。唐太宗对隋末农民起义“不觉惕焉震惧”，但“震惧”不等于就会仁慈起来，从农民利益出发。相反的，会更进一步从封建地主階級利益出发去防止革命发生。那么所謂“让步政策”的本质还不很清楚嗎？

广东省社联举行工农兵座谈会

批判吴晗同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

四月下旬，广东省社联邀请广州市工人、农民、解放军举行了几次座谈会，批判吴晗同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

吴晗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急先锋

到会的工人、农民、解放军同志对吴晗同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一致表示极大的愤慨。广东军区某部五好战士罗桂瑞说，读了报纸上发表的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和学术观点的材料之后，我越看越恨，越看越愤怒。广州市健康化工厂工人郑国伟、方元打火机厂工人黄媛卿说，看了吴晗同志的反党罪行的材料，我们工人感到无比愤怒。三元里公社雇农何沛锐说，吴晗同志吃的是人民的饭，穿的是人民的衣，但他干的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事，我们农民感到极大的愤怒，一定要清算他的罪行。

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一致指出，吴晗同志把封建僵尸海瑞抬出来，发射一枝又一枝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箭，决不是什么“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决不是什么学术问题，而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个主义的斗争，是关系到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大事情。吴晗同志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两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同志们指出，吴晗同志写《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在政治上的用心是极其恶毒的。联系到当时阶级斗争的形势来看，就可以把他的假面具剥下来。吴晗同志是全力支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急先锋。许多工人同志指出，吴晗同志是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个鼻孔出气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骂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三面红旗的时候，吴晗同志就写了《海瑞骂皇帝》，含沙射影来骂党、骂三面红旗。他鼓励牛鬼蛇神勇敢地去骂，还要别人也跟着牛鬼蛇神一起去骂。他鼓吹凡是敢骂的就是“伟大的英雄”。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企图卷土重来，东山再起，不甘心失败，闹翻案，这时，吴晗同志就写了《海瑞罢官》来鼓励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要有“失败了再干”的精神，坚决反党反社会主义到底。他生怕人们不理解他的用意，还把明代的一个兵部尚书于谦抬出来，特别注明“兵部尚书”是“国防部长”。

吴晗阴谋使牛鬼蛇神重新骑在人民头上

参加座谈的同志一致指出，吴晗同志站在反动的政治立场上，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海瑞罢官》中提出了一整套的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纲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唱什么，他就唱什么。同志们指出，吴晗在解放前反共反人民，现在又恶毒地给社会主义抹黑。前几年，由于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和现代修正主义的背信弃义的破坏，我们遭到了暂时的经济困难。党告诉我们，困难只是暂时的。但是吴晗同志却在《海瑞罢官》中大唱特唱“江南困苦凄凉相”。广东军区某部董伦同志指出，这是吴晗同志对社会主义的极大的污蔑。他说，他家乡前几年碰到了特大洪水，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群众战胜了洪水，生活也安排得很好。有什么“困苦”，有什么“凄凉”呢？广州轻工模具厂工人区沛强说，吴晗同志借古讽今，说我们“家家皆净”，都是穷光蛋。这是对我们劳动人民的侮辱。我们在前几年，虽然碰到了暂时的困难，但还建设了很多社会主义的大家当，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参加座谈会的同志指出，吴晗同志极力为“翻案风”推波助澜。广州轻工模具厂工人陈伯鸿说，吴晗同志在《海瑞罢官》中大叫“平冤狱”，这是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叫冤，替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

一切反动阶级分子叫冤。同志们说，在党的领导下，我们翻身做了主人，掌握了刀把子、印把子，不准反动派乱说乱动。坚持反动立场的吴晗同志，就为这些反动派叫冤了。他是要让牛鬼蛇神重新骑在我们头上。

大家指出，吴晗同志同地主富农一样攻击人民公社。农民同志说，吴晗同志说要“退田”才“民安”，不“退田”，“日子不久长”，这不单是睁眼说瞎话，而是要我们走回头路，走单干的老路，好让地主、资本家重新剥削、压迫我们农民。沙河公社登峰大队贫农陈贤说，单干的苦头，我们贫下中农已经尝尽了。就我来说，虽然分了土地，但是由于个体经济单薄，经不起风吹雨打，就算是起早摸黑，还是欠满身债，直到合作化后才还清。可见，吴晗同志提出“退田”，完全是为地主、资本家服务的。

同志们指出，吴晗同志顽固地用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思想来毒害人们。广州市冠程针织厂工人潘礼基指出，党号召我们积极参加三大革命实践，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但吴晗同志却和党唱对台戏，他摆出“专家”的面孔来“教训”青年人，要学习他“成名成家”的“经验”，钻到故纸堆中去。广州织金彩瓷厂工人谢官耀等说，吴晗贩卖地主资产阶级道德，是同党争夺青年一代，是叫人不要学习毛主席著作。参加座谈会的工人同志一致表示：我们坚决听党的话，做一个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任吴晗说上一千句，一万句，我们一句也不听。

坚决和吴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斗争到底

工人郑国伟、黄媛卿、南洋针织厂工人冼庄仪、纺织职工业余学校杜晓虹等同志指出，吴晗同志猖狂地反党反社会主义，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根子”的。他过去是美帝国主义走狗胡适的门徒，解放前站在亲蒋、崇美、反共的立场。他虽然混进了革命的队伍，但他仍然坚持他的反动的政治立场，所以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的时候，他为了保护反动阶级的利益，就“破门而出”，全心全力来支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广州市纺织建筑工程队工人李焯芳说，吴晗同志反党反社会主义，是由他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本性所决定的，他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所以必然要同党同社会主义同毛泽东思想唱对台戏。

广东军区某部董伦等同志说，吴晗同志恶毒地攻击我们党，证明我们党做得十分对、十分正确。毛主席教导我们，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吴晗同志疯狂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只能使我们更加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

同志们纷纷表示，一定要积极参加文化革命，打退吴晗同志向党向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

广东军区某部赵恒志同志说，在这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面前，我们绝对不能沉默。工人潘礼基说，我们工人阶级一定要挺身而出，粉碎吴晗同志的猖狂进攻。工人郑国伟说，我们有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知道什么阶级说什么话，在阶级社会里，任何一种思想都有阶级烙印。吴晗同志是我们的一个反面教员，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毛主席的千万不能忘记阶级斗争的教导，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沙河公社龙洞大队贫农陈春沅说，吴晗同志和地、富、反、坏、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个鼻孔出气，我们不能放过他，一定要和他斗到底。

广东军区某部钟远林、罗桂瑶同志说，我们是党和毛主席培养、教育出来的人民战士，我们的神圣职责，就是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保卫人民的江山。我们不但要紧握手枪，同拿枪的敌人作坚决的斗争，随时准备消灭来犯的敌人，而且要不断提高阶级觉悟，提高革命嗅觉，同不拿枪的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广东军区某部杨禾生同志说，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反动的东西，不打不倒，不斗不垮。我们一定要同吴晗同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同一切反动思想，坚决斗争到底，不全胜，不收兵。

同志们纷纷揭穿吴晗同志抗拒批评，妄图混过去的阴谋。广州市天台塑料厂工人陈炳棠、多宝服装合作工厂工人严丽贞、保滋堂药厂工人唐群青等同志说，吴晗同志受到姚文元同志批评后，急急忙忙抛出一个所谓“自我批评”，企图抵赖他的罪行，还进行新的挑战，进一步散播反动思想，以为这样就可以混过去。我们要正告吴晗，你想抵赖是不行的，想这样脱身是不可能的。我们工人有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眼睛是雪亮的，一定要同牛鬼蛇神斗争到底。

广东学术界批判翦伯赞同志的 反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点

四月下旬，广东历史学会、广东哲学学会联合举行会议，批判翦伯赞同志的反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点。参加会议的有：中山大学哲学系主任杨荣国、副主任刘焯、暨南大学历史系主任朱杰勤、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毛雍如、华南师院政治系副主任黄家驹等十多人。

一些同志在发言中指出：在近年来我国史学领域的阶级斗争中，吴晗同志和翦伯赞同志都是反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将。翦伯赞同志以“老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自居，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大肆贩卖资产阶级历史唯心主义的私货。他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史学革命，反对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历史研究，反对厚今薄古，反对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极力美化帝王将相，丑化劳动人民，充当帝王将相的辩护士，充当封建王朝史学体系的卫道士。因此，我们同翦伯赞同志的史学观点的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斗争，是毛泽东思想同反毛泽东思想的斗争，是历史唯物主义同历史唯心主义的斗争。

一些同志指出：翦伯赞同志是用资产阶级的历史主义和折中主义这两个破烂武器，来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

长期以来，资产阶级史学家都是用历史主义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的。中国资产阶级史学家诬蔑我们运用阶级观点去研究历史是不要史实、讲空话，破坏了历史学的科学性；而翦伯赞同志继承了这套装钵，依样画葫芦地诬蔑我们的历史研究是“信口开河”、“随便说话”，并进而认为，“除了阶级观点以外，还要有历史主义”，“仅仅站稳无产阶级的立场，而忘记历史主义，不算马克思主义”。这种荒谬绝伦的主张，是从根本上反对毛泽东思想的。

毛主席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毛主席清楚地说明了，历史就是阶级斗争史，研究历史必须运用阶级分析方法；而翦伯赞同志却认为用阶级观点去研究历史，就会把历史变成“黑漆一团”。翦伯赞同志用历史主义反对阶级分析方法的丑恶面貌，不是彻底暴露无遗了吗？

有的同志指出，翦伯赞同志比起那些赤膊上阵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史学家更富于欺骗性和迷惑性。他用资产阶级的折中主义冒充历史辩证法。他玩弄折中主义的主要手法是：（1）抽象肯定，具体否定；（2）模棱两可，似是而非；（3）以“全面”、“公正”的面目出现，把各种矛盾平列起来，把革命与反革命平列起来，既是这一方面，又是那一方面，既要写革命，又要写反革命，既要写农民起义领袖，又要写帝王将相，不分青红皂白，不分主次。他就是用这种折中主义手法，企图以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来取代阶级社会的主要矛盾，以续帝王将相的家谱来取代人民群众的历史。

一些同志指出：历史教学和历史研究，必须突出政治。突出政治，就是在学术领域里，坚持毛泽东思想挂帅；而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挂帅，就必须彻底粉碎翦伯赞同志的反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点。

政治統帥學術研究

黃 先

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反映在學術研究工作中，就是用什么樣的世界觀，朝着什麼樣的方向，用什么樣的學術觀點進行研究的問題，所以，在為誰研究、研究什麼和怎樣研究等問題上，就存在着兩種世界觀、兩種研究方向、兩種學術觀點的鬥爭。這些鬥爭的實質，在我們社會主義社會里，就是學術研究工作應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還是為資產階級政治服務的問題。根據毛主席的教導，我們認為學術研究工作是絕不會也絕不能離開政治的，不是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就是為資產階級政治服務。業務（包括學術研究）是永遠不能掛帥的，因為它永遠是為政治服務的。離開政治的學術研究，世界上是不存在的。所謂業務（包括學術研究）掛帥，實質上就是資產階級政治掛帥。我們反對業務掛帥，反對為學術而學術，就是反對資產階級政治掛帥，堅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政治是統帥，是靈魂，政治統帥一切，統帥學術研究。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不突出無產階級政治，就必然突出資產階級政治。

在學術研究工作中，突出政治，就是突出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大興無產階級思想，大滅資產階級思想。現在，對吳晗同志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政治思想和學術觀點的大辯論、大批判，正在全國範圍內深入展開。這場大辯論、大批判，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同資產階級思想在意識形態領域內的一場大鬥爭，這場大辯論、大批判，是興無滅資的鬥爭即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鬥爭的組成部分，是極廣泛深刻的社會主義革命。我們必須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堅定不移地把這場革命鬥爭進行到底，清除資產階級思想，鞏固和擴大無產階級的思想陣地。

突出政治就是突出毛澤東思想，用毛澤東思想統帥一切，用毛澤東思想統帥學術研究，把毛主席的書當作學術研究的最高指示。要用毛澤東思想統帥學術研究，就要把毛澤東思想當作學術研究工作者改造世界觀的最高指示，當作解決學術研究方向、方法和學術觀點的最高指示。

拋棄資產階級世界觀，樹立無產階級世界觀

學術工作者，怎樣才能自覺地遵循政治統帥學術研究這一客觀規律辦事？也就是說，怎樣才能自覺地使自己的學術研究真正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最根本的問題是改造世界觀，即拋棄資產階級世界觀，樹立無產階級世界觀。資產階級要按照他們的世界觀

改造客观世界，无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来改造客观世界。两种不同世界观在改造客观世界中，会有两种不同的结果。而一切改造客观世界的工作都是由人去进行的，那末，要改造客观世界必须首先改造主观世界。只有按照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才能更好地改造客观世界。但是，在改造主观世界中，没有破就不可能有立，因此，必须坚决地、彻底地破除资产阶级世界观，才能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只有树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才能实现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一切，改造一切，推动一切。

在学术研究工作中，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是尖锐的。在这个斗争中，学术工作者能不能突出政治，能不能以无产阶级世界观来指导学术研究工作，就决定于他们敢不敢同资产阶级世界观决裂，敢不敢挖掉个人主义这个万恶之源。这是对学术工作者一个严重的考验。

为了胜利地经受这个考验，我们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彻底地清算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我们学术工作者队伍中，有的人为追求个人名利、地位而研究，有的人患得患失，畏首畏尾，不敢坚持真理，不敢实事求是，不敢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有的人害怕批评，死爱面子，得过且过，怕在学术研究上“冒风险”。凡此种种表现，都是“我”字当头，以“我”为中心，一切从“我”出发。他们的世界观既然是资产阶级的，那末，他们在考虑进行学术研究时，就必然从个人得失出发，而不可能从无产阶级政治的需要出发。所以，世界观不进行改造，他们的学术研究工作就一定不能适应无产阶级政治的要求。毛主席说：“为了充分适应新社会的需要，为了同工人农民团结一致，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自己，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现在多数知识分子还不能说已经完成了这个转变。”^①很显然，没有这个世界观的根本的转变，就不能以无产阶级政治统帅学术研究，不能以毛泽东思想统帅学术研究。

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最锐利的武器。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我们就能树立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一心为人民，一切为革命的世界观。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是最勇敢和最聪明的。毛泽东思想能给人以极大的勇气和毅力去克服工作中的各种困难，为人民为革命而研究；毛泽东思想能够帮助人们按照“一分为二”的辩证法，去如实地揭露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同时，毛泽东思想能够帮助人们把理论同实践结合起来，使学术研究工作立足于革命实践，从实践中抽出理论，反过来又将理论去指导实践。这样，理论就以无比的生命力蓬勃地发展起来。也就是说，毛泽东思想能够帮助我们解决为谁研究、怎样研究、研究是为了什么等重大方向性问题。只要方向对了，具体业务问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因此，那些认为在毛主席著作中找不到对于具体的业务问题的具体答案，而否定毛泽东思想对学术研究的统帅作用的人，是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76页。

幼稚可笑的。客观事实是这样的，誰不以毛泽东思想統帅学术研究，誰就一定迷失方向，具体业务問題也就无法得到正确的解决。看来，能不能心悅誠服地以毛泽东思想統帅学术研究，是学术研究能否适应社会主义的需要而繁荣发展的关键問題，是学术工作者能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关键問題。

批判资产阶级学术研究方向，树立无产阶级学术研究方向

学术研究既然不能与政治无关，而是由政治統帅的，那末，学术研究的方向也不能与政治无关，而是由政治方向所决定的。客观上不存在脱离政治方向的所謂学术研究的方向，而只有为无产阶级政治方向所决定的、或者是为资产阶级政治方向所决定的学术研究方向。那种认为可以离开政治方向单纯地探討学术研究方向的想法，其結果，只能使学术研究的方向为资产阶级政治方向所支配，絕不可能寻求出一种完全不受政治方向所支配的所謂“純学术”的学术研究方向。

哲学社会科学是上层建筑，它是为一定的社会經济基础服务的，是为一定的阶级利益服务的。因此，哲学社会科学是有阶级性的。学术工作者在进行研究的时候，就不可避免地站在一定阶级的立场上，为一定的阶级利益服务。这就决定了学术研究工作必然有它一定的政治方向。在我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过程中，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斗争反映到学术領域里来，在学术領域里就存在两种不同的学术研究方向，这两种不同的学术研究方向，正是由两种不同的政治方向所决定的。

一种是社会主义方向，一种是资本主义方向。为社会主义政治方向所决定的学术研究方向，必然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用辯証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为反对帝国主义、为反对現代修正主义、为反对资产阶级思想而进行学术研究。反之，为资本主义政治方向所决定的学术研究方向，必然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用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观点、方法，为资本主义复辟、为宣扬修正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而进行学术研究。这是两种根本对立的方向。这两种方向的斗争，在社会主义的整个过渡时期都存在着，只因形势的发展，有时高一陣，有时低一陣，但不会完全消失，因为这种斗争是阶级斗争的一部分，只要阶级斗争还存在，学术研究中这两种方向的斗争也就存在。

为个人名利、地位而研究，是资产阶级学术研究方向的一个突出的表現。我們不能把它看作仅仅是个人的名利地位的問題，而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問題。因为这种表現会带来严重的恶果，这就是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为現代修正主义开辟市场，为资产阶级思想夺取陣地提供有利条件。我們要在学术研究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就必须坚决地彻底地克服这种为个人名利、地位而研究的资本主义方向。

为阶级斗争的需要、为闡明毛泽东思想怎样丰富和发展了馬克思列宁主义、为揭露和粉碎現代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反动的学术观点而研究，还是为个人兴趣、为販卖現代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观点而研究；是依靠个人奋斗，还是走群众路綫、实行三結合

进行研究；是理論联系实际，还是从文献到文献；等等，都是无产阶级的学术研究方向和资产阶级的学术研究方向之间的斗争的具体表现。要想消除资产阶级的学术研究方向，确立无产阶级的学术研究方向，必须突出政治，坚持毛泽东思想挂帅。

开展学术研究工作是为了能够更好地掌握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更正确地指导阶级斗争，使我们成为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所以，我们要把日常的学术研究工作同阶级斗争联系起来，同远大的目标联系起来，同党的事业联系起来。

在学术研究工作中，我们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方向，批判资产阶级方向，只有这样，我们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才能攻破一个又一个科学堡垒，打破资产阶级思想家或代言人对学术的垄断，不断巩固和扩大无产阶级在学术研究领域内的阵地。

克服资产阶级学术观点，树立无产阶级学术观点

什么样的学术观点，是由什么样的世界观决定的。毛主席说：“我们提倡百家争鸣，在各个学术部门可以有許多派、許多家，可是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或者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或者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①这就是说，学术观点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但归根结底，它们不是属于无产阶级一家，就是属于资产阶级一家。这是客观存在，不管你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都是这样的。可是，在我们学术工作者的队伍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承认这种客观存在。有的人用“超阶级”的观点，肯定自己不属于任何一家；有的人明明知道自己是属于资产阶级一家的，却偏偏伪装成属于无产阶级一家。摆在我们学术工作者面前的问题是，我们应该怎样运用“两家分析法”（即阶级分析法），进一步划清这“两家”学术观点的界线，从而使我们能够更深入地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的学术观点，能够更正确地阐明和发挥无产阶级学术观点。这是我们学术工作者突出政治，以政治统帅学术研究的重大问题之一。

学术工作者的世界观和学术研究方向，常常是通过学术观点体现出来的。因此，世界观的改造，学术研究方向的明确，最终要落实到学术观点上来。如果学术观点不从资产阶级一家转到无产阶级一家来，那末，什么世界观的改造，学术研究方向的改变，也就成为空话了。

在学术观点的问题上，“两家”的斗争是针锋相对的，我们绝对不能有丝毫的忽视。以下几个观点的斗争，在学术领域里的各个部门都存在着，需要我们运用毛泽东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以保证无产阶级政治统帅学术观点。

一种是主张以“超阶级”、“纯客观”的态度去进行学术研究。他们把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看作是脱离了阶级斗争的自然发展过程，他们用阶级调和的观点掩盖社会历史中激烈的阶级斗争，以模糊人们阶级斗争的观念，放弃阶级斗争，或者把它们看作仅仅是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508页。

观念的发展过程，从而使哲学社会科学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

但是，我们认为这种主张的本身，就是一种具有强烈的资产阶级阶级性的客观主义理论。在阶级社会里，哲学社会科学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因此，在进行学术研究时，不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就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这是我们同资产阶级的所谓“超阶级”的自欺欺人的观点相对立的阶级观点。同时，无产阶级是按照社会历史发展的本来面貌去解释社会历史，从社会历史本身的阶级斗争过程中去观察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这就是我们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相对立的无产阶级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我们在学术研究中，必须始终坚持阶级斗争观点，也就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一种是认为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进行学术研究，就会影响科学性，用所谓“科学性”来否定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学术研究的必要性和正确性。

但是，科学性是什么？我们认为，科学性就是哲学社会科学要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真实情况。谁能够这样作？只有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是代表人民群众利益和社会历史发展利益的，他们能够无所畏惧地、实事求是地去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实在过程。这样，就只有无产阶级的学术观点才是最科学的。而资产阶级呢，他们由于阶级地位的限制，不可能科学地、客观地去观察社会历史发展的真实情况，所以，他们的学术观点是最不科学的、反科学的。我们必须运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于学术研究工作之中，才能保证我们获得真正科学的成果。

一种是把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作了颠倒黑白的解释。例如，一切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都否认劳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把农民战争看成为叛乱、大逆不道；把帝王将相看成为所谓社会的“主宰”，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此，他们极力咒骂农民战争，歌颂帝王将相。

但是，这是与历史事实完全不相符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①“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②历史上的帝王将相是剥削者压迫者，是镇压人民战争的刽子手，有什么值得歌颂的呢？！

当然，也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观点，不过，其中的很多观点，都是从以上这些观点派生出来的，或者说这些观点是其他很多观点的根子。因此，在批判其他观点时，必须同时批判以上那些资产阶级观点，才能看到问题的实质。

至于吴晗等同志在歪曲和捏造历史的前提下，大肆借古讽今，以学术研究为名，行其反党反社会主义之实，这已经不是什么学术观点的问题，而是政治立场的问题了。他们不是在学术上进行探讨，而是在政治上向党、向人民发动疯狂的进攻。我们在学术研究中，是要划清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线的，但是，我们绝不能把政治问题“化”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1页。

为学术問題，而要透过他們的伪装，看清他們本来的面目。对于他們，必須进行彻底的揭露和批判。

不彻底消除資產階級学术观点，就不能树立无产階級学术观点。然而，用什么武器去消除資產階級学术观点？这个武器不是別的，就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不仅能够解决世界观問題、学术研究方向問題，同时，也能解决学术观点問題。因此，我們必須认真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运用毛泽东思想去解决世界观問題、学术研究方向問題、学术观点問題。在这三个問題中，最根本的是世界观的改造。只要无产階級世界观树立起来了，学术研究方向和学术观点等問題就能比較容易地获得正确的解决。这样，我們就能够真正做到政治統帅学术研究，也就是毛泽东思想統帅学术研究，我們的学术研究工作就能够在正确的道路上繁荣地发展起来，我們的学术工作者就能够真正成为无产階級的坚强战士，把学术領域中的階級斗争进行到底。

一九六六年四月一日

突出政治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要求

曹 泽 华

突出政治，不是以人們意志为轉移的主观随意性，不是什么权宜之計、临时措施，而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客观必然性，是无产阶级的百年大計，千年大計，万年大計。林彪同志說：“突出政治不是一项任意的政策，不是可以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这是根据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所提出的根本措施。不突出政治，就是违反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这就是說，突出政治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所要求的。突出不突出政治，是关系到我們的社会前进还是倒退的大問題。我們的任务就是認識突出政治的客观必然性，把必然变成自由，以便能够自觉地駕馭它、运用它，去推动我們社会的前进。

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要求突出政治

毛主席教导我們：政治是統帥，是灵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綫”。所謂政治，不論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无阶级的政治，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突出政治就是突出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的发展规律，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是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社会，因此阶级斗争仍然是社会发展的规律，仍然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量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又集中表现为阶级矛盾，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象一根紅綫一样，貫串于过渡时期的始終。究竟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战胜无产阶级，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战胜社会主义，这样一个“誰战胜誰”的問題，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两种可能性都存在。历史的前进还是后退，仍然决定于阶级斗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乃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我們所以強調突出政治，自觉地抓阶级斗争，就是适应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发展规律的要求提出来的。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反动阶级，总是千方百计地企图复辟。在政治方面，他們作为对抗无产阶级的力量长期存在着，时时刻刻企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他們用打进来、拉出去的办法，篡夺基层单位的领导权，进行各种阴谋破坏活动。在经济方面，他們同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贪污盗窃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等等勾

結起来，用各种方式破坏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发展资本主义势力。在思想和文化教育方面，他們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对抗无产阶级世界观，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反动阶级，感到用武力来实现复辟是很困难的，所以主要用打进来、拉出去的方法、用“和平演变”的形式、以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为武器，来对无产阶级进行尖锐而激烈的阶级斗争。这是新形势下阶级斗争的新特点。正因为这样，更要求我们强调突出政治，自觉地抓阶级斗争，从错综复杂的现象中抓到事物的本质，才能击破资产阶级“和平演变”的任何伎俩，保证在兴无灭资的阶级斗争中取得胜利。

社会主义社会的巩固和发展，以及在将来逐步地向共产主义过渡，不可能是自发地实现的，而是通过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劳动人民去自觉地作创造历史的活动来实现的。这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的一切活动都是在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自觉地依据认识了的历史发展规律而制订的政策、方针、措施的指导下进行的。党和政府，依据社会发展规律，作出政策、方针、措施，动员广大劳动人民去解决业已成熟的历史任务，在阶级斗争的海洋中，把社会主义的航船引向前进。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以及在将来逐步地过渡到共产主义，这就是无产阶级的最大的政治，“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社会主义事业每前进一步，都必然遭到垂死阶级的反对和抵抗。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以及在将来逐步地向共产主义过渡，仍然取决于阶级斗争，取决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这就是问题的实质所在，也就是必须突出政治的实质所在。

有的人虽然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阶级和阶级斗争，但不承认阶级斗争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因而就认识不到突出政治的客观必然性。他们以为，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剥削阶级被打倒了，尽管有几个跳梁小丑也成不了什么大事。他们以为，现在的矛盾主要是生产和需要之间的矛盾，当务之急是要努力发展生产、满足生活需要，好象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无疑，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和夺取政权以后不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利用无产阶级专政来发展生产。但是，如果政治不挂帅，生产必然走到邪路上去。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还是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是用强制的办法，物质刺激的办法来发展生产，还是用政治挂帅来发展生产？如果不首先解决这个根本性的政治方向问题，那末，就有可能生产即使一时搞上去了，但社会主义事业却是倒退了。在实际工作中，如果对于生产的数字、进度兴趣很大，对于阶级斗争的形势，对于人们的思想问题（人们头脑中的阶级斗争）漠不关心，只就生产谈生产，不把生产和我们的伟大的革命任务联系起来，不以政治去统帅生产，缺乏革命的理想，缺乏全局观念，就会变成鼠目寸光的庸人，势必被资产阶级俘虏过去。

建国以来，我们正是通过突出政治，狠抓阶级斗争，来促进我国的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等项事业迅速发展的。我们进行了土地改革、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运动，实行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农村人民公社化，并在政治思想战线上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现在全国城乡又正在进行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这些都是搞突出政治，搞阶级斗争，通过突出政治、突出阶级斗争，才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伟大的成绩。这些事实说明，突出政治，用政治统帅业务，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必须如此。

如果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突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就势必突出资产阶级政治，突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那末，一切反动势力就会猖獗起来，牛鬼蛇神就会纷纷出笼，资产阶级思想和一切腐朽反动思想就会到处泛滥。要是这样，就会象毛主席所指出的：“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我们必须永远记住毛主席的这个告诫，时时事事处处都突出政治，一万年都突出政治。

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要求突出政治

毛主席教导我们：“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而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政治、上层建筑，“归根到底，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但是，“只有经过政治，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现出来”。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政治与经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的基本观点。

所谓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的总和，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指的是它决定社会的性质，也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上层建筑（包括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是建筑在经济基础上面的，它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或迟或早地发生变化。但是，我们决不能低估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历史上的一切反动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它的人剥削人的经济制度，总是运用国家机器来镇压被剥削阶级的反抗，旧的上层建筑对旧的经济基础的维护，起着主要的决定作用。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上层建筑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形成和巩固，也起着主要的决定的作用。特别是在革命时期，这种作用尤为明显。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建立、巩固和发展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社会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经济基础被消灭之后，被打倒但未被消灭的资产阶级企图复辟，也主要地依靠旧的上层建筑的作用。目前，资产阶级在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内搞“和平演变”的阴谋活动正是利用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先行在思想上把人“和平演变”过去，然后实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复辟，这种情况，是不容忽视的，必须提高警惕。

所以，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在改变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时期，必须突出政治，突出上层建筑的作用。在我国，如果没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没有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没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群众进行的武装斗争，就不可能打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相结合的国民党反动派国家机器，无产阶级就不可能夺取政权；同样，如

果沒有毛澤東思想的指導，沒有共產黨的領導，沒有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的領導，也不可能改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生產關係，改變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所有制，改變個人的私人所有制，建立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

但是，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之後，有人覺得上層建築的作用不是那麼重要了，重要的是要發揮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作用，以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了。好像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要求不是突出政治而是突出經濟了。不是的，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仍然要求突出政治。這是因為：一方面，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還建立不久，它是和生產力的發展相適應的，但是，它還很不完善，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產力的發展又是相矛盾的。所以需要繼續調整和完善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以適應和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但是生產關係不可能自動地完善起來，這就需要發揮上層建築對於經濟基礎的促進作用，這樣就必須要求突出政治，發揮政治對經濟的統帥和靈魂的作用。另一方面，舊的生產關係雖然被改變了，但是舊的上層建築還沒有退出歷史舞臺，特別是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和小資產階級的習慣勢力，還頑固地殘留在人們的身上。資產階級還借此以破壞新的生產關係和進行他們的復辟陰謀。毛主席說：“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在這一方面，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因此，舊的上層建築必然和新的經濟基礎發生激烈的矛盾。比如，資產階級的自私自利的思想意識不僅是和社會主義公有制矛盾的，而且還要對社會主義公有制起破壞作用。又如，資產階級的輕視群眾的觀點和官僚主義的陋習，以及特權思想等等對社會主義人與人之間的互助合作關係的形成，也起着阻礙和破壞作用。再如，資產階級的好逸惡勞觀點和損人利己思想，一定會損害“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分配制度。總之，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的鞏固和發展，一定要求突出無產階級的政治，進行興無滅資的鬥爭，克服資產階級的思想意識的影響。

社會主義經濟，既不可能自發地產生，也不可能自發地鞏固和發展。它和資本主義私有經濟的自由競爭和無政府狀態不同，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經濟，是集中統一的計劃經濟。這種計劃經濟要反映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它一定要按照正確的路線，採用正確的方針、政策，每採取一項經濟技術措施，都要從政治上去考慮問題。因此，社會主義經濟一定要依靠無產階級先鋒隊——共產黨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的堅強領導，一定要突出政治，才能夠保證我們的經濟建設沿着社會主義道路不斷前進。

社會主義社會是從階級社會向無階級社會過渡的重要歷史時期。經過社會主義社會，人類將進入共產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不可能是固定不變的，隨着生產力的發展，生產關係也要跟着發生變化。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只有相對的穩定性，在條件具備時，它要逐步過渡到共產主義的生產關係。譬如，從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從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過渡到共產主義全民所有制，從按勞分配過渡到按需分配，從承認三大差別到消滅三大差別，等等。這就是說，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和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有根本的不同，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一旦建立起來之後，資產階級就要把它固定

化。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立起来以后，无产阶级则要根据共产主义的要求，努力创造条件，使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因此，整个过渡时期，是一个不断革命的时期。要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逐步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生产关系，就必须突出政治，开展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否则，就不能使社会主义社会沿着共产主义方向前进，而势必向资本主义倒退。在这里，关键问题是突出毛泽东思想，用共产主义的世界观武装广大人民，实行不断革命。

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突出政治

毛主席教导我们：“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人民群众蕴藏着极大的力量，但是，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人才是最大的生产力。

在生产力诸因素中，人是决定的因素。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和物的关系却颠倒过来了。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垄断了生产资料，而无产阶级却一无所有，资本家利用生产资料来剥削劳动者，强迫劳动者成为生产资料的奴隶。是物统治人，而不是人统治物，人和物处在一种对抗性的矛盾中。劳动者根本谈不上有什么主动性和积极性。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把这种人与物的关系改变过来。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不再是分离的，劳动者掌握了生产资料，劳动者不是生产资料的奴隶，而是生产资料的主人。

人是生产力中决定性的因素，因为人是有思想的，人的思想觉悟越高，在认识社会、认识自然、改造社会、改造自然方面发生的作用就越大。所以，在具备必要的物质条件下，提高人的思想觉悟，就能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社会生产力。

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群众的关系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他们之间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资产阶级十分害怕劳动人民思想的觉醒和提高，因为劳动人民的思想觉醒了、提高了，他们的反动统治就会完蛋了。所以，资产阶级根本不把劳动人民当人看待，而把他们看成是会说话的机器，他们总是采取饥饿和皮鞭的政策，进行极其残酷的压迫和剥削，驱使劳动人民为了他们的利润去卖命劳动，或者是采取精神欺骗和物质刺激的办法，把劳动者的思想引到错误的方向去，以利于维护他们的剥削制度和榨取更大的利润。

无产阶级的革命，不仅推翻了几千年来的剥削制度，而且打碎了钳制劳动人民思想的锁链。劳动人民的思想一旦解放出来，其智慧和力量就如“天上来”的“黄河之水”一样汹涌澎湃势不可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切身事业，劳动人民的思想觉悟越高，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积极性越高，我们的事业就越兴旺，发展就越迅速。社会主义社会绝不能象资本主义社会那样依靠强制的办法和物质刺激的办法去发展生产力，恰恰相反，要依靠突出无产阶级的政治，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才能把蕴藏在广大劳动人民中的无穷无尽的力量发掘出来，这是被千百遍证明了的物质变精神的原理。所谓无产阶级革命解放了生产力，就是解放了人，解放了人的思想，人

的覺悟提高了，精神面貌改變了，就要在生產鬥爭當中發揮巨大的作用。所謂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最根本的一條，也是人的覺悟，具有高度覺悟的人是社會主義社會最大的生產力。有的人至今還不認識人的因素第一的意義，把人和物的關係擺得不正。他們依靠的是物的因素第一，靠物不靠人，靠“洋”不靠“土”，搞唯機器論，靠“馬力主義”，結果是東西越多，人就越不革命，越懶。這不是發展社會主義的生產力，而是破壞社會主義的生產力。這是資產階級思想在生產建設中的反映。

要真正實現人的因素第一，真正依靠人的覺悟去發展社會主義的生產力，就要突出政治，突出毛澤東思想，做人的思想工作，以毛澤東思想去教育人、改造人。因為在社會主義社會，人的思想覺悟的提高也不是自發的。而且舊社會的思想意識和習慣勢力，仍然束縛住人們的腦筋，要打破它並不是輕而易舉的。人的思想障地，社會主義不去占領，資本主義就去占領。人人都需要學習，人人都需要改造。克服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樹立無產階級的思想，克服非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樹立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這就要把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擺在一切工作的首位，用毛澤東思想把人武裝起來。理論一旦掌握群眾，就會變成巨大的物質力量；而群眾一旦掌握了理論，就更加成為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巨大力量。

在社會主義社會，作為最大的生產力的人，要具備兩個條件：一個是解決為誰生產的問題，一個是解決怎樣生產的問題，這兩個問題解決了，人才成為最大的生產力。而要解決這兩個問題，就必須突出政治，堅持毛澤東思想掛帥。

社會主義的生產力是社會化的，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是公有制的，這是解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社會化和個人占有的矛盾。但是，必須要求人要有集體主義思想去與之相適應，才能夠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如果人們為誰服務、為誰勞動的問題不解決，如果人們是為個人不是為集體，那麼社會主義的生產是不可能順利地發展下去的。因此，一定要用毛澤東思想來改造人們的世界觀、人生觀，破私立公，為革命而種田，為革命而做工。這樣才能大大提高人們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自覺性。

人民群眾是創造世界歷史的決定力量。但是在舊社會，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理論知識是不給勞動人民的，勞動人民一直被關在理論知識的大門之外。這是一個很大的矛盾。無產階級革命把剝削制度推倒了，把理論知識的大門打開了。社會主義生產的發展需要人民更加聰明，需要人民直接掌握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理論。一旦勞動人民掌握了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理論，也就是掌握了毛澤東思想，掌握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那就會產生無窮的力量。懂得了客觀事物的发展規律，使主觀和客觀相一致，從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人們就會創造許多奇蹟出來。在我國，千千萬萬勞動人民自己直接掌握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理論的時代已經開始了。廣大勞動人民一旦掌握了毛澤東思想，其聰明才智定如洶湧的流泉，任何人間奇蹟都可以創造出來。可以預期，在一個不太長的历史時期內，我國一定能够建成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這是一種历史的必然趨勢，任何反动勢力都是阻擋不了的。

学习毛主席关于人民战争 战略战术思想的体会

左 群

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頂峰，是最高最活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不仅是无产階級伟大的政治家，而且也是无产階級天才的軍事家。他的人民战争思想，指导中国人民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和印度反动民族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进攻；指导中国人民消灭了蒋介石八百万匪軍，取得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今天，人民战争的思想，已經超出了一国的范围，成为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宝贵财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許多地区的革命人民，正依据人民战争的思想，开展着星火燎原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武装斗争。毛泽东同志制定的一系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是无往而不胜的，它不但适用于中国，而且是对世界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革命斗争的伟大贡献。毛泽东同志把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用四句話加以高度概括，叫做：“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在这里，想談談学习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战略战术思想的一些体会。

不同的階級有不同的世界观，无产階級有无产階級的世界观，資产階級有資产階級的世界观。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由于他們的階級地位，决定了他們的世界观，是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的。这种世界观反映在战争問題上，就形成了“唯武器論”。毛主席說：“‘唯武器論’，是战争問題中的机械論，是主观地和片面地看問題的意見”^①。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由于他們脱离人民群众，敌視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对立，他們进行的是反人民的不义战争，他們所拥有的是一支被雇佣或被强迫来为他們卖命的軍隊。因此，他們在战争中不敢也不可能依靠士兵和人民，而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武器上面。他們总是見物不見人，而不可能正确地理解人和武器的关系。在他們的头脑里，只有飞机、大炮、坦克、鋼鉄，他們眼睛里看到的只是几顆原子彈，看不到在战争中起决定作用的人的因素。在他們看来，只要有了威力巨大的武器，有了熟练的駕馭新式武器的軍事技术，就可以决定战争的胜负，就可以主宰世界，就可以永远維持他們的統治，奴役本国和別国的人民。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軍事学說中，有所謂“海軍制勝論”、“坦克制勝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59頁。

論”、“空軍制勝論”等。十九世紀末，德皇威廉二世曾經宣稱，德意志帝國的艦隊將使他稱霸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英國人富勒曾不遺余力地鼓吹坦克的作用，他說：“武器之優劣，亦即戰爭之勝負，勝利之秘密百分之九十九在於武器”。意大利人杜黑則認為“制空權的取得，就可算是勝利，在空中被擊敗，就等於整個敗北”。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希特勒依靠他的機械化部隊，曾經在大半個歐洲橫行一時，於是他便把“閃電戰”吹得神乎其神，但是沒有多久，“閃電戰”的理論就在英勇的蘇聯紅軍面前被徹底粉碎了。今天，當原子彈和核武器出現以後，美帝國主義就實行核訛詐政策，用以吓唬世界革命人民。然而，歷史无情地嘲弄了各式各樣的“唯武器論”者，任何武器都挽救不了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必然滅亡的命運。在覺醒了的人民面前，什麼飛機、軍艦、坦克、原子彈，都不過是一戳即破的“紙老虎”罷了。

無產階級和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他們的世界觀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這種世界觀，認為人民群眾是社會一切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創造者，是歷史發展的決定力量。在歷史發展中，新生的力量總是要戰勝腐朽的力量。革命的人民，經過反復地同帝國主義和反動派進行鬥爭，終將取得最後勝利。所以他們總是相信群眾，依靠群眾。他們認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要革命的，把人民群眾動員起來，就組成了不可摧毀的銅牆鐵壁，就可以打敗帝國主義和反動派。毛主席說：“真正的銅牆鐵壁是什麼？是群眾，是千百萬真心實意地擁護革命的群眾。這是真正的銅牆鐵壁，什麼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們，我們却要打破反革命。”^①又說：“兵民是勝利之本”。^②將這種世界觀運用於戰爭，就能正確地認識戰爭中人和物的關係。我們一方面承認武器在戰爭中的作用，但是更了解精神對物質的反作用，更承認人在戰爭中的巨大作用，我們認為決定戰爭勝負的是人而不是武器。武器在戰爭中的作用，不能和人的作用等量齊觀。武器是人製造的，又是由人來使用的。沒有人製造武器就不會產生武器，武器沒有人去使用就等於是一堆廢鐵。武器是死的，人是活的，武器在戰爭中發揮何等程度的威力是由使用武器的人來決定的。具有高度覺悟的人民，即使只有最簡陋的武器，依靠人的勇敢，也能打敗擁有新式武器的帝國主義和反動派，因為人的覺悟和勇敢這些精神因素可以轉化為巨大的物質力量。而革命人民一旦有了現代化的武器，那就如虎添翼，就能在戰場上發揮它巨大的威力。反之，最新式的武器掌握在那些不願意替帝國主義和反動派賣命的僱傭軍手里，也不過是一堆破銅爛鐵而已。

毛主席指出，我們的意見和“唯武器論”相反，“不但看到武器，而且看到人力。武器是戰爭的重要因素，但不是決定的因素，決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③。林彪同志指出：“對我們軍隊來說，最好的武器不是飛機，不是大炮，不是坦克，不是原子彈，最好的

① 《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134頁。

② 《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498頁。

③ 《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459頁。

武器是毛泽东思想。最大的战斗力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是勇敢，不怕死。”

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实践，朝鲜人民、越南人民以及世界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人民战争的实践，完全证明了毛主席和林彪同志论断的正确。依靠小米加步枪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抗日战争中击败了称霸东亚的日本帝国主义，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消灭了用美械装备的八百万蒋介石反动军队。在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的战争中，朝中两国军队的武器，比美国的武器差得多，但是，较量的结果，是美帝国主义失败了，朝中人民胜利了。

目前，在越南战场上，除了六十万伪军以外，美帝国主义还派遣了二十多万拥有最新式武器的侵略军，出动了几百艘军舰，几千架飞机，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所有新式武器，向南越人民发动了疯狂的进攻。南越人民一没有飞机，二没有军舰，三没有原子弹，他们甚至有的还使用竹矛、弯刀、弓箭这些最原始的武器同敌人作战。但是美国侵略者及其走狗、帮凶，却被南越人民打得落花流水，焦头烂额，走投无路，进退维谷。五年多来，南越人民就是使用这些简陋的武器，解放了四分之三以上的国土，一千万以上的人口，消灭了五十多万的敌军，其中包括美国侵略者三万余人，击落击毁敌机近千架，他们没有空军而能大量消灭敌人的空军，创造了直接袭击美国空军基地的新打法，把美国现代化的飞机砸得稀烂，把美国空军基地变成了美国飞机的坟场。仅一九六五年一年，南越人民武装就袭击美国空军基地十四次，击毁美机四百二十三架，使美国的空军力量遭到了严重的损失。南越人民写出了当代人民战争史上壮丽的诗篇。

只有弓箭、步枪、炸药、手榴弹的人民军队，战胜拥有现代化飞机、大炮、坦克、军舰的反革命军队；武器差的战胜武器强的，“土”的战胜“洋”的；这是一切革命战争的普遍规律。

相对弱小的人民革命军队，要打败相对强大的敌人，必须实行一整套以我之长攻敌之短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做到“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才能在战争中壮大自己，消耗和削弱敌人，逐步地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使自己变为强者，最后完全战胜敌人。“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四句话的实质是：相信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突出政治，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运用灵活的战略战术，以我之长，攻敌之短，趋利避害，力争主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打仗依靠的是“海空优势”，打的是武器；无产阶级革命者打仗依靠的是政治优势，打的是人的勇敢。“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发挥你的优势，我发挥我的优势。我们“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看准了才打，要打就一定要把你吃掉，彻底干净地把你消灭。当条件还不成熟，我吃不掉你时，就暂时等待一下，等到条件具备了再来吃你。在敌我力量悬殊，我处于不利条件时，我就走开，与你脱离接触，也决不让你吃掉我。打仗不外打与走两条，打与走是辩证的统一，而打是基础，一切的走都是为了打，走是为了选择有利的时机，有利的战

场，狠狠地打击敌人，彻底地消灭敌人。对“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四句话，我们要正确全面地加以理解。这四句话具有普遍的意义，大范围能用，小范围也能用。打得赢不打是机会主义，打不赢硬打是冒险主义。更不能把“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消极的理解为愿意打就打，不愿意打就走。打与走都是由战略、战役、战术范围内的最高指挥员根据整个战局发展决定的，而不是任何人可以随意决定的。

歼灭战是我军作战的基本指导思想。毛主席说：“击溃战，对于雄厚之敌不是基本上决定胜负的东西。歼灭战，则对任何敌人都立即起了重大的影响。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①古今中外的军事史上，有过不少迂回包围大量歼灭敌人的战例，但是把它上升为理论，形成一种系统的完整的军事学说，则是毛泽东同志的首创，这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巨大贡献。

要打开灭战，就要敢于诱敌深入，大踏步地前进，大踏步地后退。所谓大踏步地前进，就是敢于实行大规模地迂回包围，敢于插入敌人的后方、心脏，敢于孤军作战。所谓大踏步地后退，就是敢于成百里甚至成千里地撤退，敢于主动地、有计划地放弃一些城市和地方。这点必须向人民群众说清楚，不要因此而慌张，要舍得一些牺牲，有所失才能有所得，放长线才能钓大鱼。不相信人民群众，不信任自己的部队，没有最大的气魄和胆略，是不敢这样做的。

诱敌深入，把敌人放进来关起门来打，这对我们是十分有利的。

一、只有把敌人放进来，才能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实行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相结合，采取多种形式消灭敌人，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海洋，使他进得来，出不去。

二、只有把敌人放进来，才能逼着敌人分散兵力。我们有计划地放弃一些城市和地方，就逼着敌人背上一个个沉重的包袱，敌人背的包袱越重，兵力就越分散。我则由于主动地放弃了一些城市和地方，兵力就更集中了，机动性就更大。这样，我们就形成了拳头，而敌人却十个指头都伸开了，两只脚陷进泥坑中拔不出来，只好等着挨揍。我们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就可集中优势兵力，寻找敌人的薄弱环节，那里好打就到那里打，把敌人分割开来，一口一口地把它吃掉，敌人有生力量消灭之时，就是我放弃的城市和地方回到人民手里之日。那种害怕丢掉地方，怕打烂罐罐罐，而分兵把口，处处防御，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打法，既不能消灭敌人，也守不住城市和地方。

三、把敌人放进来，我们是在自己的家里打，地理地形熟悉，群众条件好，敌人则盲人骑瞎马，东碰西撞，企图同我们决战，却找不到我的主力。让他听我们指挥，牵着他的鼻子走，叫他“武装大游行”，“肥的拖瘦，瘦的拖死”。

四、只有把敌人放进来，让他们占领一些城市和地方，才能使他们兴高采烈，懵懵然，昏昏然，麻痹轻敌，才能导致他们犯错误。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31页。

革命人民要战胜相对强大的、武装到牙齿的敌人，除了在战争指导上要打开灭战，在战略上要敢于诱敌深入外，在战术上，首先必须善于集中兵力，“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这样，在全体上，我们是劣势（就数量来说），但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战役上，我们是绝对的优势，这就保证了战役的胜利。”^①这体现了“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思想，采取这种打法，没有不打胜仗的。反过来说，敌人之所以失败，就战术方面来说，正是由于他的兵力太分散了。

其次，在战术上我们还要充分发挥打近战、夜战、白刃战的特长。不管现代武器和技术装备如何发展，不管现代战争的打法怎样复杂，战争的最后胜负，归根到底，还是要决定于地面部队，决定于战场上的近距离的搏斗，决定于人的觉悟、勇敢和牺牲精神。就是说，最后解决问题还是靠人，靠步枪、手榴弹，靠拚刺刀，靠近战、夜战、白刃战，靠几十米内的硬功夫。在这方面，人民的革命军队，拥有绝对的优势，因为他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心为人民，一切为革命，具有高度的阶级觉悟。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军队，在这方面，则居于绝对的劣势。反动军队的官兵最贪生怕死，一见刺刀就发抖，不是逃跑就是投降，所以他们总是害怕打近战、夜战、白刃战的。一打起近战、夜战、白刃战来，他们的所谓“海空优势”、“武器优势”就消失了，什么新式武器在这种情况下，都无用武之地。

“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样一种打法，只有依靠人民群众，只有革命的人民军队才能做得到。美帝国主义、蒋介石和一切反动派，虽然熟知我们的战略战术，但却想不出对付它的办法，也不可能利用我们的战略战术。正如一位瑞典作家所说的：“毛泽东自己的敌人认为，他的论述详尽的军事著作既是绝对地必需的，又是绝对地用不上的”。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军队，都是镇压人民的工具，是与人民为敌的，因此，根本无法依靠人民，根本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尽管他们想利用实行一些“社会改革”的骗局，来建立一种反革命军队和被侵略、被压迫的人民之间的所谓“鱼水关系”，但这不过是一种痴心妄想。难道实行“三光政策”的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可以使人民忘记仇恨而支持他们吗？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军队的反人民的阶级本质反映在军队内部，就是官兵对立，士无斗志，他们最怕苦，最怕死，靠“鞭子”和“物质刺激”来维持统治的军队，是绝不可能实行这一套打法的。所以不管敌人在技术装备上有什么优势，不管敌人采取什么办法来对付我们，它只能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主动权就始终在我们手里。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47页。

突出政治，在革命化的道路上前进

华南农学院畜牧兽医系 叶 浩
内外产科教研组主任

我們教研组一共有十三位老师，其中有几位较长期在外参加其他工作，实际上担任教学的只有九人。上学期我們开了五門課，每周有十个班次的实习，此外还有研究生、函授生、外国进修生的教学任务，与甘肃兽医研究所合作的科学研究任务，以及經常性的支援农业生产的任务。如何把这些任务好好完成呢？我們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認識是很模糊的，也很少去考虑它，认为教研组仅仅是进行教学和科学研究的基层組織，只要搞好課堂讲授和实验，做出科学研究成果，写出科学研究論文，就算完成任务了。自从我院实行半农半讀，开展教育革命之后，我們才比較深刻地感到教研组不革命化，就很难适应半农半讀的教育革命新形势的要求。但是教研组如何革命化呢？这是摆在大家面前的一个问题。在党的教育下，我們帶着这个问题学习毛主席著作。

我們学习了《毛泽东同志論教育工作》和有关党的教育方針的文件。毛主席說：“我們的教育方針，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我們根据毛主席的教育思想检查了我們过去把教

教研组仅仅看做是教学和科学研究的基层組織，实质上是重业务輕政治、只专不紅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反映，明确了教研组必須突出政治，政治必須統帅业务，必須既教书又教人，既管教学又管生产，而要把政治和教学、生产、科学研究統一起来就得把教研组建成为培养革命接班人的基层組織。要这样做，就要求我們教师思想革命化，只有思想革命化了，才能做到工作革命化。而要思想革命化，必須大破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我們教师中的表现是各色各样的，但主要的是追求名利和貪安逸、怕艰苦。针对这些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表现，我們帶着問題学习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紀念白求恩》，进行兴无灭資的思想斗争。

有一位教师在科学研究工作上做出較大成績，但成名成家的思想严重，把科学研究陣地当成“独立王国”，当成自己垄断的地盘，別人不能插手，不能过問。对政治不聞不問，意志日益消沉，以至发展到产生资产阶级腐化的思想和行为。教研组抓住这个问题，召开了多次會議和进行个别談話，以毛主席的著作作为武器，系統地批判了只专不紅的危害性，从思想上加以提高，既挽救了犯錯誤的同志，又教育了

全組的教師。還有一位教師，由於個人患得患失思想作怪，對科學研究論文到底用個人署名還是用教研組署名的問題，考慮很多，甚至晚上睡不着覺，兩天之內就反復了三次。教研組及時向這位老師指出，這種反復過程正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在科學研究工作上的表現，並且耐心和他多次談話，幫助他克服這種錯誤思想。過去教研組的科學研究工作，是各搞各的，“河水不犯井水”，誰也不過問誰，有的甚至公開說集體搞科學研究是“吃大鍋飯”，沒有積極性，搞不好，要搞好科學研究，只有單干。經過學習毛主席著作，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問題解決了。現在全組老師環繞豬喘氣病和小豬白痢這兩個科學研究的項目，分工協作，再不談你的我的，名呀利呀了。

過去我們有些同志認為教師主要任務是教書，但由於我組生產任務特別多，不少生產單位經常上門要求解決畜病問題，便覺得這是一個額外負擔。也有的同志認為經常搞生產工作，花時間多，上圖書館看書的時間少，妨礙自己理論的提高，也影響科學研究的進行。更有的認為擔任臨時課程，工作不分晝夜，生活也不能安定，真是入錯了行。學習了《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之後，我們批判了貪安逸、怕艱苦的思想，大家的覺悟提高了，干劲大了，服務熱情也高了。有一位同志說：“獸醫工作是辛苦的，花時間多。但共產黨員就是干革命的，干革命就要不怕苦，不怕花時間”。因此他常常廢寢忘食，一心為工作。同志們深深地体会到，公社死了一頭牛，不知要農民兄弟流多少汗水才能換得回來，更嚴重的是影響了生產。因此不論

是嚴寒的冬夜還是酷暑的夏天，有了出診任務，都是背起藥箱就走，隨叫隨去。

去年春節前幾天，石井公社西郊奶牛場奶牛發生了急性出血性腸炎，不到一天的時間，就有兩頭死亡；還有六、七十頭也陸續出現病況，二十多頭危在旦夕，全場二百多頭奶牛的健康受到嚴重威脅，場里飼養員慌了手脚。在危急中，他們給我們獸醫院來了電話。我組的一位副教授立即帶了一批同學趕去，幫助牛場建立臨時獸醫院，協同郊區獸醫站的同志，把病牛集中起來，夜以繼日地醫療護理，吃飯也是輪班的。有一次，正當午飯時，突然有一頭牛發生過敏性反應症，同志們立刻放下飯碗投入搶救，直到下午三時左右病牛脫險，大家才吃飯。春節到了，大家都放假回去過年了，但是同志們想到的是奶牛的安危，想到的是人民的財產，一頭奶牛值兩、三千元，要一個農民在三十畝地上辛苦一年才能得到啊！同志們堅持留在牛場，繼續為病牛進行治療和護理，經過十多天的奮戰，幾十頭牛終於轉危為安，陸續恢復了健康。老師和學生們雖然辛苦了一段期間，但心情分外愉快。根據不完全統計，在一九六五年內，我們到公社、農場、部隊以及工交部門出診的有八十五個單位，共一百六十五次，參加出診的共六百四十八人次。

老師們的思想覺悟提高後，對學生的思想工作也抓得緊了。上學期我們為了提高教學質量，培養學生具有真刀真槍的過硬功夫，成為又紅又專的人，我們把獸醫五年級同學搬到系的獸醫院去住，同時把教研組與獸醫院結合起來，實行組院合一。老師到現場給同學們上診療課，和

同學們一起護理病畜，打掃畜舍，種牧草，分工包干醫理病畜。就這樣我們把獸醫院做為教學、生產勞動和科學研究的一個基地。教研組也把同學們的思想工作、業務學習以至生活問題都統一管起來。但是，這樣一種變化也不是沒有思想鬥爭的。有的同學最初不願意搬到獸醫院去住，認為獸醫院不但有病畜糞便的臭味，有些病畜還有腐蹄、爛瘡以及腐敗性子宮炎等發出的一種特殊臭味，有些同學還把獸醫院叫做“臭醫院”，有的說，“見到牛蠅蛆症瘡內的蠅蛆就肉酸”，更不用說去給它治理了；有的看到有些牛馬會咬人、踢人、撞人，便怕“一不留神給牛馬踢上一腳生命難保”，等等。教研組掌握了同學們的活思想，組織同學們學習毛主席著作，進行思想教育，批判了一些錯誤的思想，同時關心同學們的生活問題。例如同學們初搬去時，燈光、開水、廁所、沖涼房等問題都還沒有完全解決好，事務科一時又忙不過來，教師們就和同學們一齊動手選擇地點，找舊房子改建廁所，找架床，修建運動場，解決生活上的一系列實際問題；同學們很快就安定下來。

在同學們業務學習的過程中，老師們也能抓著大的或小的事故，注意及時進行思想教育。例如有一次一個同學因拿錯藥引起乳牛氯化鈣中毒的醫療事故，教研組立即組織師生連夜搶救把牛救活了，事後並組織了討論，吸取經驗教訓，提高認識，使同學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還有一個同學因保護乳牛時不小心拉斷了一小段牛尾巴，老師也找他個別談話進行思想教育。老師們對同學們的好人好事也注意及時表揚，如一些同學為了節約紗布綑帶，

在診療場設立一個瓦罐回收被廢棄的污染膿血的紗布，利用課餘時間清洗消毒後再用等等。有些同學到農村出診，接觸農民，思想感情有了變化，我們也及時組織漫談交流心得。例如有一個同學到廣州花地一個大隊出診，思想上就有了三次變化。最初他聽說到花地去，心想花地是遍地香花，於是抱著游山玩水的心情去了，在入村後聽到農民說華南農學院的獸醫來了，他心裡又頓時緊張起來。看到農民對自己的殷切期望，自己能否替他們解決問題呢？於是他又產生害怕的心情。到了牛房看到飼養員對待病牛，愛護備至，深受感動，自己也投入了醫理病牛的緊張工作。原先害怕的思想便消除了，這時他只感到自己能對醫治病牛出一分力量而高興。事後我們便組織這位同學在小組會上談了自己的體會，使其他同學也得到教育。

通過參加生產實踐，使教師和學生思想感情起了變化。有一學生說：“以前碰到牛馬拉屎，望而生畏；現在不同了。有一次，有一頭牛傷處化膿，給它開刀時，膿射到自己的身上，也不感到害怕了。”社員說：“看不出他們是教授、大學生，和大家一樣，不怕苦、不怕脏。”通過生產實踐，還大大促進了教學質量的提高。在課堂講授方面，教師們再不是書本來書本去了，內容是既有理論，又有實際，課講得生動深刻，解決問題。同學們無論是業務上或思想上都有很大提高。

現在我們組的教師有時談到這些思想面貌的變化時，感慨地說：“過去從業務出發抓業務，怎麼也無法把工作做好，現在突出政治，抓學習毛主席著作，一通百通。”

二

我們教研組的教学虽然經過解放后的多次改革，但基本上还是照抄外国的一套，还是跳不出旧框框、洋框框。強調所謂系統性、完整性，各科分科講授，分科實習，互不联系；強調沒有学基础課和专业基础課，就不能接触专业課的东西。講課和實習时常脫节，沒有講到的病例发生了不能治疗，而講到的病例当时却不一定发生。这样，講得多，練得少，技术不过硬。学了几十个病例，但学生自始至终沒有处理过一个病畜，結果学到的只是一套理論。学生反映：“以前考試虽然得了五分，但学的东西一下子就忘光了，碰到实际問題束手无策，惊慌失措。”如去年春天到竹料公社参加样板田工作的毕业班学生，有的不会給猪打針。給猪打針因猪会叫、会跑，要几个人抓住一头猪才能注射，有的吓得連注射器都打破了。这些都是过去教学脱离生产，理論脱离实际的坏处。过去兽医专业课程門数多，学时多，压得学生透不过气来，整天与讲义、筆記打交道，影响了学生的全面发展。

如何做到“少而精”，成为我組教学改革中的一个主要矛盾。要“少而精”就要改掉过去的“多而杂”。敢不敢改，能不能改？則是我組教师思想斗争的焦点。我們学习了毛主席的《实践論》、《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找到了理論脱离实际的根源，批判了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明确了教学改革的方向。我們大力削減了那些脱离实际和不必要的内容，縮減学时，騰出時間参加生产实践，到郊区公社巡迴医疗，培养学生过硬本領。

例如，我們把家畜內科学、診斷学和兽医X射綫学三門課合成一門兽医內科学；把家畜外科手术学、外科总論和外科各論三門課合成一門兽医外科学。这样，不仅使专业基础課和专业課有机地結合起来，而且大大精簡了繁瑣重复的章节，大大縮減了学时，加强了理論与实践的联系。我們还学习《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問題》一文，毛主席說：“讀書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們的主要方法。”又說：“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毛主席这些教导給我們很大启发，使我們認識到过去教学脱离实际的害处。学生在組織学、生物化学、生理学、診斷学中学过血常规和尿常规的检查，而且反复进行过多次的課堂講授和實習，但由于不是結合生产需要来做的，学完就忘了，同学们仍然不能掌握实践技术。現在我們把實驗室日夜开放，同学随时結合診療需要去做，所以一般都比较牢固和熟练地掌握了。此外，通过巡迴医疗工作的实践，不少学生也已經基本可以独立进行一般疾病的检查和治疗工作。我們深深感到通过这样的途径，年青师资队伍成长較快，例如組内一位青年教师，大学毕业才两年，由于能够坚持深入生产实践，理論結合实际，进步很快，現在已經能够单独解决一般的問題。

学习《实践論》也使我們更深刻地体会了毛主席所說的，通过实践証实真理、发展真理的道理。如在边虫病、焦虫病等血液原虫疾病的治疗，书本上只說因为原虫大量破坏紅血球，所以要輸血和注射葡萄

糖。但是，血液来源很成问题，既没有牛的血库也没有牛的血浆产品，输血要采健康牛血，最初只好宰掉小牛做了供血者，成本很高，又影响了牛的繁殖。由于生产上实际的需要，我们大胆的去屠场采牛血做试验。经过多次的实验证明，只要对屠牛先做一般临床检查，并采血样做质量的检验，屠宰场的牛血质量一般并不比健康牛差多少，是完全可以采用的。它比之葡萄糖液不但价钱低得多，而且效果好得多。为了给牛输血，我们对牛的血型也做过许多研究，证实牛的血型远不如人或马的血型重要，所以输血时一般可免去血型检验的手续。通过实践我们又发现黄牛的血液一般可以输给水牛，而水牛的血液输给黄牛则会引起严重的反应。所有这些认识，有些还有待于深化，有些离开最后结论还有一定距离，有些则是过去书本上所没有的。这些认识都有待于再用于生产的实践中去，这就是检验理论发展理论的过程，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继续。从这些实践中，我们深刻地体会到毛主席说的：“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如果不深入到实践中去，那末教学、科学研究，也将停滞不前，都有落空的危险。

我们在革命化的道路上，不是一帆风顺的，革命化的过程是两种思想、两条道路斗争的过程，是兴无灭资的过程。我们在这方面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只是尝到了一点突出政治的甜头，我们在改造思想方面，还需要长期不懈地狠下功夫，才能实现世界观的根本转变。在教学改革上，我们也只是做出了一些极其初步的成绩，需要我们继续努力。今后我们决心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不断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在革命化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我们在革命化的道路上，不是一帆风顺的，革命化的过程是两种思想、两条道路斗争的过程，是兴无灭资的过程。我们在这方面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只是尝到了一点突出政治的甜头，我们在改造思想方面，还需要长期不懈地狠下功夫，才能实现世界观的根本转变。在教学改革上，我们也只是做出了一些极其初步的成绩，需要我们继续努力。今后我们决心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不断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在革命化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学习毛主席著作 改造人生观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师 熊茂生

我体会到，学习毛主席著作，一定要在思想改造上狠下功夫，这就要紧紧抓住两个根本：改造的根本问题——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人生观；改造的根本途径——积极参加革命实践。

紧抓根本问题 不断开展思想斗争

思想改造的实质，就是用无产阶级的

共产主义世界观，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首先的和最主要的，就是要解决为谁服务、为何活着的根本问题。我们对待工作、学习，对待艰难困苦和生活享受，对待集体和同志，对待批评表扬，……等等问题的态度，都是以这个根本问题的如何解决为转移的。解决这个问题对理论工作者还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决定着我们能不能彻底了解与真正掌握毛泽东思

想，使之成为自己进行革命斗争的武器。所以，思想改造必须紧紧抓住为谁服务这个根本问题。

五年来，在这方面，我是经过许多思想斗争的。我首先碰到的是个人志趣同党的需要的矛盾。当组织上把我从数学专业调来哲学系时，思想波动很大，自认为对数学有了兴趣，改行搞哲学困难多，而理论工作不如数学工作有奔头。这样，学习与工作都受到了不少影响。在党的启发下，我学习了《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和《反对自由主义》。毛主席说，共产党员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要学习白求恩、张思德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联系自己来想，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怎么可以从个人名利出发来看待革命工作，把个人志趣摆在党的需要之上呢？！我想，要学习白求恩、张思德同志的共产主义精神，对待工作就不能“我”字当头，而要从党的利益和需要出发。为人民服务，要有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改行的困难就不该怕了。只要方向明，决心大，顽强坚持下去，改行的难关是可以闯过的。思想问题解决了，我就愉快地干工作了。虽然几年来的教学任务变动较大，先后搞过《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辩证法》、《自然科学概论》和《学术评论》等门课程，这些都是我需要学习的新课，但我很少考虑个人得失，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当我有时出现胆怯时，就会想起毛主席的话：“干就是学习”，它鼓舞了我边干边学，在干中学。经过几年努力，我学习了哲学基础理论，初步适应了工作要求，对理论工作有了较深厚的感情。

对我来说，解决红专矛盾主要也是解决为谁服务的问题。我曾有“多专少红”的思想，把专作为个人成名成家的资本，关门读书，放松思想改造，从而滋长了个人主义和教条主义。这种思想受到批判后，又产生过“多红少专”的思想，肯于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却放松了业务学习，实质上是害怕批评，贪求安逸。哲学系组织红专关系的讨论时，我学习了老三篇以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用毛主席的思想对照检查自己的思想。毛主席指出了又红又专是知识分子前进唯一正确的方向。他强调指出“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在《纪念白求恩》这篇文章里，毛主席在号召我们学习白求恩同志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共产主义精神的同时，也要求我们学习白求恩同志那样“对技术精益求精”，批评了那种“见异思迁”的人。经过学习，我认识到忽视政治，就会迷失社会主义的方向，根本谈不上为人民服务；而红不落实到专上，没有业务本领，为人民服务也会变成空谈。我有过的这两种思想，都是从个人得失看问题，而不是从党的需要看问题，不是把又红又专看作自己对党的应尽的职责，一心一意坚持这条道路。由于对红专问题认识比较明确了，所以在实践中能基本上做到：（一）经常注意端正工作、学习目的，克服个人主义杂念。（二）坚持刻苦学习业务，同时关心国内外大事、积极参加政治运动与革命实践，做好社会工作。当时间上有矛盾时，做到业务学习为政治让路。（三）业务上努力学习与应用毛泽东思想，力求按照党的教育方针来开展工作。这样就减少了红专

問題上的搖擺現象。

在其他方面表現出來的個人主義，只要發現苗頭，我也就抓住不放，用毛主席的思想加以對照分析，開展思想鬥爭來克服它。經過不斷反復鬥爭，為人民、為革命的思想就逐漸比較明確，並且經受了一些實踐的考驗。如當我兩次疾病發作比較嚴重，面臨敢不敢堅持工作的問題時，能夠以革命利益為重，消除患得患失思想，堅持了工作。又如當學習了毛主席的教導：“一切革命隊伍的人都要互相關心，互相關愛，互相幫助”，我就把關心周圍同志看做為人民服務的一項具體內容，盡力幫助同志解決思想、生活、學習中的一些問題。再如當着有人提出比較尖銳的意見與批評，自己思想有抵觸的時候，我就反復學習毛主席的話：“因為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所以，我們如果有缺點，就不怕別人批評指出”，以此促使自己比較冷靜、虛心地考慮同志的意見，並認真改正缺點。

通過學習毛主席著作和開展思想鬥爭，我深深感到：毛主席教導我們的為人民、為革命的思想，是我們工作、學習的根本原動力。資產階級思想的核心是個人主義，追求名利地位，追求生活享受，這是我們提高思想、改進工作的最大障礙。許許多多的問題，如果從個人的利害得失去考慮，就想不開、行不通，而只要從黨的利益、革命需要去考慮，就想得開、行得通。這就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和無產階級集體主義兩種根本對立的思想境界。我們人生觀的改造，正是為了逐步達到毫无私自利之心的共產主義的思想境界。為了實現這種改造，就要用老三篇等著作作為武器，正視問題，提高認識，落實行動。

老三篇集中體現了毛主席為人民服務的思想，要改造人生觀，就不可不學，而且不可不反復學。學了就用，學一次解決一些問題，那就越學越會用、越用越想學，每學一次都有新的體會，百學不厭。同時，要學好就一定要同自己的問題聯繫起來，要敢於正視自己的問題。切不可認為只是有點小問題，不大在乎；切不可愛面子，怕公開暴露缺點。否則就會為個人主義留下防空洞。因此，我体会到，要反對個人主義，就要對它深惡痛絕，決不留情，發現問題，敢於暴露，用毛主席思想來批判它，並把新的正確認識付諸行動。這才是學習毛主席著作改造思想的老實態度。

在人生觀的改造過程中，我還有過這樣的體會，就是自己往往易於出現自滿情緒，稍有進步便自以為差不多了。這反映出對思想改造的長期性、曲折性與艱巨性認識不足，對自我改造的要求不高。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是無止境的，世界觀的根本轉變是長期任務。實際上，一個問題的解決要經過反復鬥爭，舊問題解決了，新問題又會出現，又要開展新的鬥爭。我想，我們應當學習一輩子，改造一輩子。為了堅持改造，就要用完全、徹底為人民服務的高標準嚴格要求自己，一輩子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永葆革命的青春。

在革命實踐中自覺加強改造

學習《整頓黨的作風》、《青年運動的方向》、《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和《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文章後，我明確了一個重要思想，就是知識分子要做到理論聯繫實際，就應當“參加

到实际工作中去，变为实际工作者”；知識分子的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傾向，也“只有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才能克服”。在这里，最重要的是同工农群众相结合，为工农服务。怎样促进这种结合呢？毛主席說，“首先必須懂得工人农民，熟悉他們的生活、工作和思想。”从我四次下乡的感受来看，这首先就是要过好劳动和生活关。知識分子同工农結合所必經的这道关口，对长期过慣学校生活的人是有許多思想斗争的。記得一九六一年我們在农村时，白天劳动、夜晚工作，加以当时經濟生活有困难，有时确实感到很不容易頂住，思想斗争很激烈。但是想到农民一样艰苦，而我們坚持下去，才能“使广大群众認識我們是代表他們利益的，是和他們呼吸共共的”，不闖过这一关，同农民結合就不可能，于是也就鼓起干劲，經住了艰苦生活的考驗。有时还能从难鍛炼，如参加挑蔗，主动多担，从开始只能挑五六十斤，經過一个多月就可挑一百来斤。这样每冲破一个具体困难，也就是向农民接近了一步。通过艰苦的劳动和生活，激励了我和农民同甘共苦的決心，体会农民的伟大力量与参加农业劳动的意义，并使农民开始了解我們。但这还只是初步消除了我們同农民那种格格不入的隔閡，还没有做到真正熟悉农民，結合問題还没有根本解决。經過一段時間以后，通过对工作、思想、生活問題的檢查，我发现自己在立場、观点、感情上还是同农民不那么一致，农民对我还是比较“客气”，工作不能深入下去。問題在那里呢？我学习了《〈农村調查〉的序言和跋》后，認識到問題是在于“沒有满腔的热忱，沒有眼睛向下的決心，

沒有求知的渴望，沒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确实，我还是有知識分子的优越感，口头上說向农民学习，实际上以教育者自居；口头上相信和依靠群众，实际上恩賜观点，包办代替。抓住了問題，我就在同农民一起参加革命实践的过程中虛心地观察、体验他們生活、思想，取得對他們的正确認識，并且在各方面向他們認真求教。这就逐步使我看到广大貧下中农对党的深厚感情、坚定的階級立場、辛勤劳动的品质、是非分明的原則态度与踏踏实实的作风以及关心集体、待人誠懇的风格，都是自己所比不上的，值得自己認真学习的。这也教育自己虛心听取他們的意見，工作中注意走群众路綫。由于态度对头，所以后来同农民相处感情就比较融洽，共同語言也就比较多了。較多、較深地了解农民，也就較具体地認識到为什么要为农民服务，怎样为农民服务，對他們产生了热爱，把為他們服务看做巨大的幸福了。熟悉农民、学习农民的过程，也是改变自己旧的思想、感情与习惯的过程。如在学校中自己曾向往生活上的高标准，計較个人名利，拿它同农民的劳动、生活一对照，就会痛感个人主义的可耻，增加了对資產階級思想的抵抗力。

日常工作实践也是改造思想的一个重要場所。对教学工作者來說，首先有个教书又教人，教人先教己的問題。這個問題，我是在学习《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后才比較明确的。毛主席說，教育人的人，“有一个先受教育的任务”，“知識分子如果不把自己头脑里的不恰当的东西去掉，就不能担負起教育別人的任务”，“要作好先生，首先要作好学

生”。我想，教学工作本来就是革命工作，但若脱离政治、脱离实际、脱离学生，实际上是把自己从革命者变为教书匠。当革命教师就必须教书又教人，在教人前提下教书，而教人又要首先教育自己。教学工作也是一个改造思想的过程。在学校首先是向学生学习，同学生三同，利用各种方式接触、了解、关心学生的思想、学习与生活，同他们交朋友，从他们身上汲取精神营养。学生的問題，常常也是教师的问题。如有的学生专业思想不巩固，认为哲学工作没有前途。这也曾是我自己的想法。为了解决学生这个问题，我就要先同自己的错误思想决裂。教育学生，有个言教与身教的问题，身教是有力的“无声的命令”，身教也促使教师严格要求自己，不然，就很难带好学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教师是不是教书又教人，实际上也是能不能勇于自我改造的问题。

参加教学改革、学术斗争也是改造思想的重要方面。从事理论教学与研究，参

加学术斗争，都同政治思想革命密切联系，因而是改造思想的好阵地。宣传毛泽东思想，批判资产阶级与修正主义的观点，我感到，实际上也是对自己类似的错误认识作斗争。参加这些斗争，可以激发革命感情，磨炼斗争意志，培养政治敏感，划清思想界限。如在批判冯定的《共产主义人生观》一书时，我是把它当反面教材，对照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开展了自我批判，提高了认识。由于在这种斗争中，能够把问题提到世界观的高度去分析与解决，因而有利于自己的思想改造。

学习毛主席著作，改造思想，在我来说还仅仅是开始，体会是很粗浅的，如何学好用好，还需要今后不断努力，在实践中总结提高。我有决心和信心向工农兵学习，把他们丰富的经验逐步消化变为自己的东西。我决心在三大革命实践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努力改造世界观，做革命事业中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壮丽的革命英雄颂歌

——《欧阳海之歌》的时代意义

朱继琢 謝中征

《欧阳海之歌》是一部成功的、优秀的长篇小说。作者以雄壮的调子，写下了一代共产主义新人的英雄传记，谱成了我们时代革命英雄的壮丽颂歌。在作品中，字里行间都充满着火热的革命激情，闪烁着无产阶级革命理想的光辉，给人以深刻的共产主义教育。

欧阳海是生活中实有的青年革命英雄，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涌现出来的一代共产主义新人的典型。《欧阳海之歌》以欧阳海的真实事迹为基础，进行了艺术的创造，塑造了欧阳海闪闪发光的伟大形象。读了这部作品，我们感到一种强大的激动人心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透过欧阳海形象所体现的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欧阳海之歌》的作者，正是把共产主义理想作为贯穿欧阳海英雄性格的红线，围绕这条红线，着重表现了他一心为革命，一切为革命，为革命吃大苦、耐大劳的高贵品质和爱憎分明的火热的无产阶级感情，生动地展示了欧阳海的内心世界，概括了社会主义时代我国人民的精神面貌，体现了强烈的时代精神。

欧阳海作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他的高度的共产主义精神来源于他的共产主义人生观。他的生活目标是共产主义的最后胜利，他的生活信念是“活着，就应该为党战斗。”这是欧阳海英雄性格的核心，作品通过人物自己的活动和言行揭示了他这一性格特征。他曾对战友说：“为人民服务是我们的本分，完成任务是应该的。我们的‘额’应该是共产主义事业的最后胜利。”有了这样一个远大的生活目标，使得他胸襟宽阔，情怀坦荡，心里装着全中国和全世界的人民，时刻记着一个革命者的崇高责任，所以他处处以革命利益为重，不计较个人的得失，没有任何私心杂念。他正确处理与副指导员的关系这件事，突出地表现了他那种为理想的光所照亮，透明清彻，一尘不染的性格。作品在描写这件事情时，并没有停留在简单过程的叙述上，而是透过这件事揭示出，他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他想到“有多少工作摆在眼前！社会主义早建成一天，全世界的革命就提前一天。”

欧阳海是个伟大的革命英雄，又是普通的解放军战士。他伟大，在于他高瞻远瞩，胸怀世界，把个人融于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之中，全心全意为革命，不怕苦，不怕死，没有私心杂念；他平凡，在于他不是自命不凡，高高在上，而是勤勤恳恳地对待每一件平凡细小的工作和劳动。这是社会主义时代英雄人物的特点。作者正是把握了这一时代特点，让人物站在共产主义的高峰来理解日常生活和工作的革命意义，把理想落实到日常的每件工作上。理想变成了无穷无尽的力量，而每一件细小的工作和劳动都把生活向理想境界推进了一步。所以他事无大小，只要对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不管“分内”或“分外”，都“拚尽全力”，一股虎劲去干，不知疲倦，不知困难，不怕苦，不怕累。大家都說他是属“虎”的。如果說，在搞工建时，他干起来一个顶几个，扛着一百七、八十斤的木头顶着满山跑；鞋磨破了，脚受伤了，光着脚片子照样干，这时还夹杂某些个人争强好胜的意识，那末在突击修铁路的战斗和支援修水库的劳动中，他那顽强、猛干的虎劲，忘我的革命精神，就完全出于共产党员的革命自觉性。为了回击修正主义者背信弃义，为了加速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他忍受每天腹泻十多次的疾病，忍受着被烧伤了双手的剧痛，干起来“象刚刚出膛的炮弹，带着呼啸，有力地奔着，他就象根本没有病过，他就象从来不曾疲倦过。”每读到这些章节，使人们不能不一次又一次为欧阳海的崇高形象所深深感动。

欧阳海在旧社会中度过他十分悲惨的童年。是共产党把他从苦难里解放出来，见到了灿烂的阳光。这种经历培养了他强烈的阶级感情。这种感情凝结在一个战士身上，就是恨敌人，恨旧社会，热爱共产党，热爱新社会，立志参加解放军为天下穷人打仗，为人民杀敌立功。

欧阳海的阶级感情随着他的思想境界的飞跃，而变得更加鲜明、更加开阔了，爱憎更加分明了。他痛恨万恶的帝国主义，痛恨为虎作伥的现代修正主义，痛恨资本主义自发势力，而对人民、对自己的阶级兄弟，他有着热烈的爱和深厚的感情。他对周围同志的关怀和帮助，都是内心感情的自然流露，纯洁、真挚、质朴，没有半点矫饰和虚假。正因为他对人民充满了这样热烈的感情，所以在人民群众遇到危难的时候，就见义勇为，舍己为人，表现出高尚的共产主义风格。他一碗米、一碗饭地节约口粮支援灾区人民，为党分忧；他在齐耳深的井水中坚持托着被救的小孩；他迎着烈火冲上去，救出公社社员的生命和财产；最后，为了抢救一列车上千名的阶级兄弟和国家财产而英勇献身，做到了脸不变色心不跳。

“为共产主义而贡献一切”，“专门利人、毫不利己”，“不图名，不图利，不怕苦，不怕死，一心为革命，一切为革命”，是我们时代英雄人物共同的品质。这是我们时代彻底革命精神的集中表现，是无产阶级阶级本质的集中表现。在欧阳海身上，时代的光芒和无产阶级本质，融于他那好动不好静，顽强不屈，火辣辣的个性之中，形成了欧阳海独特、鲜明的性格，成为社会主义时代的革命英雄的光辉典型。这样，在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英雄画廊中，就增加了欧阳海这样一个全新的英雄形象。和民主革命、战争时

期的英雄人物不同，他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无产阶级英雄。

二

《欧阳海之歌》以它的全部情节展示了欧阳海从一个从雪地里捡回来的穷孩子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的光辉历程：以革命英雄为榜样，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不断改造，不断提高，最后树立起共产主义人生观。欧阳海的成长过程，是一首毛泽东思想的颂歌。

欧阳海生于旧社会，长于新中国。在旧社会有过悲惨的遭遇，在解放后参加了农村从土改到人民公社成立等一系列的斗争，经受了革命斗争的锻炼，懂得了阶级斗争的真理，憎旧社会，爱新社会，立志保卫新生活。但这朴素的阶级感情，强烈的阶级仇恨，还只是欧阳海思想发展的起点，由这个起点到共产主义的思想境界还有一大段路程。正象指导员曾武军所说的，“他凭淳朴的阶级感情出发，为什么革命这个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怎么革命，怎么才能象毛主席所教导的那样作一个纯粹的人，这还要靠他自己努力，靠我们支部多花点心血。”

欧阳海带着淳朴的阶级意识来到了部队，一心想当炮兵，向往轰轰烈烈的战斗生活。这时他还没有真正懂得一切革命工作都有联系，全国一盘棋的道理。所以他看到西藏反动集团叛乱，就连打三个报告，要求去西藏参加作战。觉得砍木头，搞工建不是当兵的干的事。党及时地教育他，用毛泽东思想“拨亮了他心里那盏灯，让他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有了全国一盘棋的观念，懂得了自己的岗位就是战场，就是杀敌立功的前线，做好自己的工作，就是为平叛出力。从思想历程说，这是一次不小的进步。

懂得了自己工作的革命意义还只是前进道路的第一步，并不是进步的终结。从农村带来的组织纪律性不强，还是他前进道路上的一块石头。党又及时地教育了他，而他又以高度的自觉性接受了党的教育，并以坚决的行动改正了缺点。作品在写欧阳海改正缺点的过程，使他的思想来了个微微的波澜，从而把组织纪律的意义更深的印在他的脑子里。

这时，欧阳海面临着一个更重要的关口：如何对待革命荣誉？他幻想着当英雄，但什么是英雄，他还没有真正认识。他向往英雄，是向往他们不平凡的行为和他们的荣誉，而对他们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任劳任怨的工作，对党无限忠诚的高贵品质却认识不足。他在部队里立了功，当上了各种各样的标兵，誉满全团。于是就产生了有点沾沾自喜和争强好胜的情绪，这种情绪连睡觉都流露出来。一旦争不到第一，当不上标兵就闹情绪。比如，连队没派他去为民兵会议作刺杀表演，他就闹情绪了。这是一个严重的关口呀！

是党在这个人生历程的严重关口教育了他，是毛泽东思想启发了他。通过指导员的言传和身教，欧阳海从指导员身上看到了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看到了一个英雄人物的本色：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对党无限忠诚，在荣誉上从不伸手。他从毛主席的著作中

接受了領袖的諄諄教導。他對照自己，進行了劇烈的思想鬥爭，認識了自己的問題。學習毛澤東思想關鍵在於“用”，歐陽海在“用”字上狠下工夫，表現了高度的自覺性和行動性。他一旦知道了自己的錯誤，就馬上改正。你看他昨天還在鬧情緒，今天天不亮就向黨支部寫了檢討，並主動幫助劉偉城克服刺殺上的不足。真是“多么自覺的戰士啊！”在修鐵路時，他們班有一點沒修好，就堅決返工，並要求連長給他們班的進度畫個“○”，評個“下游”。這些行為，表明了歐陽海精神境界的飛躍和升華，表明他掌握了一心一意為革命的共產主義世界觀。

歐陽海入黨之後，他對毛主席著作的感情更加深厚了。他為了買毛主席的書，三更半夜跋涉幾十里去排隊，把毛主席的書當作一切工作的最高指示，遇事就向毛主席著作請教，毛主席怎麼說就怎麼做。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在雷鋒、江姐等英雄人物的光輝照耀下，他的思想向更高、更闊、更成熟方面發展了。作者為了表現和展示他思想發展的新的 heights，又描寫了他吃大苦，耐大勞，勇挑重擔，奮當火車頭，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學習英雄人物的高貴品質，幫助劉延生、高翼中，正確處理與副指導員的關係等一系列的行動。

高翼中是中學生，來到部隊有些怕苦怕累。歐陽海最初看不慣小高的表現，幫助不夠耐心，批評時態度不好，引起小高的不滿。他帶著這個問題學習毛主席的著作，懂得了應該熱情幫助，耐心地等待，諄諄善誘。從此他一方面引導小高讀毛主席著作，另一方面又給予熱情的幫助。結果小高進步了。小高的轉變表明，歐陽海不僅能用毛主席的思想解決自己的問題，而且成了毛澤東思想的宣傳員。他在幫助小學教師改作業的時候，在學生的本子上寫道，“聽毛主席的話，做毛主席的好孩子。”這個細節的意義是極為深遠的。它表明，歐陽海把毛澤東思想的武器接過來，還要一代一代的傳下去。

歐陽海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正確處理與副指導員的關係，受得起委屈，表現了他的思想的成熟和高度的黨性修養，表明他在毛澤東思想的哺育下，已經成為“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這樣，在國家財產和上千人民的生命即將遭到嚴重損失的千鈞一發的時刻，他忘記自己，迎着飛馳的火車，跳上路基，推開攔路的戰馬，就成為一個完全、徹底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戰士必然要採取的行動。歐陽海以他全部生命力量，攀登上共產主義思想的高峰。

歐陽海走過的道路，是我們時代所有共產主義戰士、英雄模範人物所共同走過的道路，是青年一代走向革命化的必由之路。離開了當代最高最活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引，就不可能成為無產階級的革命英雄。毛澤東思想日益深入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心中，發揮出無比的戰鬥威力。這是我們時代的特徵。文學作品如果不寫毛澤東思想如何武裝了人的思想，就不可能真正反映我們時代生活的真實，就不可能正確理解和表現我們時代的英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歐陽海之歌》為社會主義文學如何表現今天的工農兵英雄人物，也闢開了一條新的道路。

三

《欧阳海之歌》是一部划时代的作品。它的出现，在我们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里程碑，标志着我国无产阶级文学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部作品，在如何表现新时代的工农兵英雄人物、如何表现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精神、如何运用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等问题上，都有了新的突破，创造了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进行认真的研究和总结。但首先值得重视的，我们认为，还是作者在创作这部作品的过程中，突出政治，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经验。

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号召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深入工农兵生活，和工农兵相结合，改造世界观、改造思想感情。《欧阳海之歌》的作者金敬迈同志是遵循着毛主席的指示去深入生活的。但是，据作者自己的介绍，只是当他领悟了学习毛主席这一教导，必须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感觉到从平凡而伟大的战士身上能够学到一辈子也学不完的最宝贵的东西；意识到自己和欧阳海的思想差距很大，必须向欧阳海学习，重新学习“老三篇”，把世界观这一根本问题来一番认真的改造，逐渐地在思想感情上和欧阳海靠近了一些，才产生了通过文艺作品来表现欧阳海光辉一生的强烈愿望。

向英雄学习，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认真改造世界观，这是《欧阳海之歌》能够产生并且得到成功的“关键的关键”所在。现在，“到处有生活”、艺术创作“以感情为泉源”这一类的谬论已被驳斥得体无完肤，大批文艺工作者已经下厂、下乡、下连队深入生活了。但是，对于深入生活的目的，却未必是每一个人都明确的。一个文艺工作者，假如还没有觉悟向工农兵学习，改造世界观的必要性，金敬迈同志这段体会是十分值得记取的：“不学好毛主席著作，不彻底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不努力缩小自己和这些战士思想上的差距，就根本无法理解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新人，更谈不上如何去反映他们。”①

《欧阳海之歌》的作者，不仅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到部队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吸取艺术创作的源泉，然后才进入创作过程，而且，在整个创作过程中，都贯穿着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自觉活动。例如，他从毛主席著作中，从周恩来总理和陶铸同志有关指示中，明确了小说的主题思想，把握了欧阳海的性格特征。他学习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论述，认识到写英雄人物就要写他是怎样在兴无灭资的斗争中，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他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文件，解决了处理小说中人物关系所碰到的困难。对于作品的修改和提高，作者也是按照毛主席指示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精神，走群众路线解决的。可以说，《欧阳海之歌》能够达到这样的思想高度，人物性格刻划的这样鲜明、准确、生动，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作者在创作过程中，自觉地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认真领会党的政策和领导的指示的结果。

① 金敬迈：《〈欧阳海之歌〉的酝酿和创作》，载1966年2月26日《羊城晚报》。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主席早就批判了那种认为学习马克思主义“就要妨害创作情绪”的错误观点。毛主席说：“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并不是要我们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写哲学讲义。”^①马克思主义所破坏的只是那些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形形色色的非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这正是无产阶级文艺家所应当彻底破坏的。但是，由于长期以来资产阶级和封建文人故弄玄虚，影响所及，至今还有一些人把创作过程看得神秘莫测。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资产阶级的文艺家，拼命强调创作过程的“特殊规律”，把创作过程说成似乎是除了作家本人的“艺术感觉”之外谁也不能过问的禁地。究其实，这些“理论”都不过是为了排斥和抗拒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创作过程的指导作用而已。

文艺创作是有其自身的特点的，然而文艺作为意识形态的一种，不外是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的反映，是一定阶级的作家对生活认识的产物，是人们认识生活，又反过来通过影响人的思想和感情而作用于生活的一种手段。既然我们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唯一正确的指针，为什么文艺创作过程就可以是一个例外呢？《欧阳海之歌》的创作实践有力地回击了资产阶级的谬论。它向我们证明：无产阶级的作家，必须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才能表现好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英雄人物。只有站在毛泽东思想的高度，才能把握生活的本质，抓住生活的脉搏，掌握时代的特征，将理想与现实斗争结合起来，理想落实到平凡的斗争生活上面，照亮生活的道路和前景，挖掘出平凡生活中所隐藏的不平凡的意义和强大的思想力量。《欧阳海之歌》的作者，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面对着伟大的时代，火热的生活，心潮汹涌，禁不住满腔的革命豪情，唱出了一阕激动人心的革命英雄赞歌。我们期望新时代的作家们，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摆脱一切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的文艺传统的束缚，深入工农兵，学习工农兵，创造出更多更好的象《欧阳海之歌》这样的作品！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75页。

試論所謂“中間人物”和中間 状态人物的区别

吳 文 輝

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应该根据社会主义社会的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人民群众推动历史前进，以实现文艺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崇高职责。这里所说的各种各样人物，包括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包括先进人物、中間状态人物和落后人物。描写先进人物，創造社会主义时代光輝的英雄形象，是社会主义文艺創作的中心課題。但是，努力創造英雄形象，并不意味着要排斥其他各种人物的形象；相反，英雄人物的形象，通常总是在与其他人物的联系和矛盾斗争中展开的。这里也包括了中間状态的人物。中間状态人物，在革命文艺創作中，历来都是存在着的；不过，以前极少采用中間状态人物这个名称。

虽然中間状态人物的形象早已存在于文艺作品之中，但是，关于怎样正确認識这种人物的阶级本质，怎样摆好这类人物在文艺作品中的位置，怎样恰当地描写这些人物的形象，这一系列的問題，无论在思想認識上，抑或在創作实践上，都有待于我們运用毛泽东思想，认真地总结文艺創作的經驗和教訓，正确地加以解决。

但是，邵荃麟同志提出“写中間人物”論却是別有用心。“写中間人物”論，是一种修正主义的文艺理論。所謂“中間人物”，是一个特殊的政治概念，它否定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的革命性，要求文学作品专写那种动摇于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間的人物，散播动摇情緒，鼓吹資本主义。所謂“写中間人物”，实际上是从人性論的思想基础出发，主张写渾渾噩噩的“小人物”，目的在于反对塑造工农兵的英雄形象。“写中間人物”論拿所謂以“中間人物”教育“中間人物”作幌子，取消文艺教育和提高人民的革命任务，主张欣賞人民群众的所謂“精神負担”，要暴露人民，丑化人民。邵荃麟同志提出“写中間人物”的謬論，根本不是要正确解决描写中間状态人物的問題，而是企图誘使我們的社会主义文艺脱离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革命方向，走进資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死胡同，为資本主义复辟服务。

邵荃麟同志的謬論，曾經在一部分文艺創作和文艺理論工作者中間造成了思想混乱：有一些人自觉地或不自觉地附和、追随了“写中間人物”論；而又有一些人，虽然認識到“写中間人物”論的錯誤性质，但由于界限不够清楚，在創作中，对于描写中間状态

的人物，存在着顧慮，或者在文藝評論中，對某些作品的人物創造提出了不夠恰當的意見。因此，必須堅決地批判邵荃麟同志的“寫中間人物”論，並與之正確地劃清界限，同時，對文藝創作中有關中間狀態人物的若干問題，進行深入地探討，以期求得科學的解決。陶鑄同志在中南區革命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的總結報告中，已經就這個問題作了非常深刻的分析。本文只是談談個人學習的一些心得和體會。

—

毛主席說過：“中國社會是一個兩頭小中間大的社會，無產階級和地主大資產階級都只占少數，最廣大的人民是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以及其他的中間階級。”^①毛主席在這裡所說的“兩頭小中間大”，是指中國社會的階級情況，而不是全國人民的政治態度。誰都知道，在民主革命時期，中國絕大多數人民都擁護黨所領導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毛主席又說過：“任何有群眾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較積極的、中間狀態的和比較落后的三部分人。故領導者必須善於團結少數積極分子作為領導的骨幹，並憑借這批骨幹去提高中間分子，爭取落后分子。”^②後來，我們在工作中常說的“兩頭小中間大”，都是指的在一定的範圍內群眾在思想覺悟上分為比較積極的、中間狀態的和比較落后的這種情況，而不是指群眾的政治態度。

邵荃麟同志在鼓吹“寫中間人物”的時候，竟然也引用“兩頭小中間大”作為他的理論根據。這是對毛澤東思想的極大歪曲。邵荃麟同志所說的“中間人物”，與毛主席所講的中間狀態的群眾或中間分子，是根本不同的兩回事。邵荃麟同志所說的“中間人物”，是一個特殊的政治概念。他以資產階級的陰暗心理來歪曲工农群眾和廣大人民的形象，所謂的“中間人物”，實際上是指政治上的“中間”分子，指那些動搖於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之間的人物。現實生活中當然有政治上的“中間”分子，動搖分子，但是，他把我國社會廣大的各階層，把工农群眾的大多數，都說成是這種類型的“中間人物”，這顯然是對我國人民群眾的極大的誣蔑，尤其是对我國廣大農民的極大的誣蔑。

毛主席一貫指出，人民是由不同的階級組成的，對於群眾，要進行階級分析。毛主席從來就把政治立場的問題與思想覺悟程度的問題嚴格地區分開來，從來就把政治上的中間派和人民群眾里面思想覺悟程度與革命積極性處於中間狀態的人嚴格地區分開來。例如，在社會主義時期，毛主席對人民群眾里面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的情況就有不同的分析，對農民里面貧農下中農和富裕中農的情況也有不同的分析。這些分析，表現出鮮明的階級觀點和辯證唯物主義的科學態度。對於大多數人還具有資產階級世界觀的知識分子隊伍，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作過一個非常著名的分析。他指出：在政治上，我國的知識分子絕大多數是愛國的，是願意為人民服務，願意為社會主義的國家服務的；但

① 《毛澤東選集》第3卷，810頁。

② 《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900頁。

在思想上，就知識分子对待馬克思主义的态度來說，則处于中間状态的占大多数。^①对于合作化初期的貧农下中农，毛主席指出：他們“是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的”^②。这是政治上的估計。他強調地指出：“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那些在革命时期还只会按照常规走路的人們，对于这种积极性一概看不见。”那是一种“右傾頑症”^③。这是問題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毛主席又指出：“他們中間的积极性的程度，由于种种原因，仍然是不同的，有些人很积极，有些人暂时还不大积极，有些人还要看一看”。^④这是思想觉悟上的差別。因此，毛主席指出，應該按貧农下中农的觉悟程度，分期分批組織入社。从这些分析可以看出，我們通常讲“两头小中間大”，决不是說，政治上的中間派，动摇于社会主义与資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間的分分子占了人民群众的大多数。中間状态人物，是指革命群众当中觉悟程度与革命积极性暂时处于中間状态的一部分人物；这里所讲的觉悟程度，在不同的階級和不同的革命发展阶段，又有其不同的实际內容。中間状态的人物觉悟程度和革命积极性还不够高，原因基本上有两个：一是非无产階級的階級本性未得到彻底的改造，如貧下中农还保留着某些小生产者的思想意識，知識分子还未根本改造其資產階級世界观等；另一是在某些方面受到資產階級思想的侵蝕，如滋长了某种个人主义思想等。

試拿写得較好的中間状态的人物，如汉剧《一袋麦种》中的春梅，話剧《电閃雷鸣》中的丁强，《英雄工兵》中的何万里，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中的薛新文等，和邵荃麟的“写中間人物”論的艺术标本，如小说《賴大嫂》中的賴大嫂，《沙桂英》中的邵順宝等比較一下，便觉涇渭分明。写得好的为什么写得好？关键在于对人物有正确的認識和了解。首先是在政治上充分肯定了这些人物，他們的思想意識主导的方面是进步的，他們是革命派而不是不革命派或动摇派；其次是以明确的階級观点和階級斗爭观点来分析这些人物；再次，便是能够从革命发展的观点来看待这些人物。事实上，中間状态人物和一切事物一样，都不会是一成不变的。在階級斗爭和无产階級革命不断发展的条件下，中間状态人物可以变成先进人物，也可以变成落后人物，在革命的这一阶段比較积极的人物，到革命的下一阶段，由于种种原因，也可能轉入中間状态；如丁强、何万里便是这样。中間状态人物的这个中間状态，也沒有什么固定不变的标准。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不断提高，中間状态的标准，肯定也是不断提高的。比如在薛新文身上，就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出解放军貫徹軍委扩大會議決議以后，落实四个第一，开展四好連队五好战士运动，坚持干部下連队等等革命化措施所造成的新的面貌。离开了特定的革命阶段，离开了典型环境的描写，就不能正确理解中間状态的人物，也不能正确描写中間状态的人物。这是显而易見的。

① 參閱《毛泽东著作选讀》（甲种本）下册，第497—500頁。

② 《毛泽东著作选讀》（甲种本）下册，第403頁。

③ 《“这个乡两年就合作化了”一文按語》，載《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第587頁。

④ 《毛泽东著作选讀》（甲种本）下册，第410頁。

毛主席教导我們在政治上必須堅定地相信人民群眾的大多數，同時又指出在政治上思想上不斷教育提高廣大人民群眾的必要性。這是我們認識和描寫中間狀態人物的指導思想。邵荃麟同志首先自己在政治上對社會主義發生了動搖，對農民、對人民群眾的社會主義積極性一概看不見，還以為別人也像他那樣在政治上動搖。所以他把資本主義思想極端嚴重的落後分子賴大嫂，捧為“中間人物”的范本；並且，要求人們把人民公社時期的農民，都寫成合作化初期的梁三老漢那個樣子。其實，梁三老漢這個人物之所以寫得好，在於作者寫出這個人物潛在的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性，寫出這種積極性怎樣經過教育而發揮了出來，使他由一個比較落後的人物提高到中間狀態。而邵荃麟同志特別欣賞的卻是梁三老漢身上的小生產者的“精神負擔”，這正說明了他所謂的“中間人物”，根本就不是我們一般所說的中間狀態的人物，不是實際生活中存在的中間狀態的人物。

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就可以在批判邵荃麟同志的謬論的同時，根據毛主席的指示，正確地認識中間狀態人物的本質，以便更好地去了解這種人物，表現這種人物。

二

邵荃麟同志的錯誤，不僅表現了他在政治上對社會主義事業的動搖，創造了“中間人物”這個特殊的概念，而且他還要求文藝作品大量描寫這種“中間人物”，企圖以“中間人物”來排擠英雄人物。他提出種種理由，貶低寫英雄人物的意義，鼓吹“寫中間人物”。我們要正確地描寫中間狀態人物，就必須徹底和“寫中間人物”論劃清界限，並且反其道而行之，把塑造社會主義時代高大的英雄人物形象作為文藝創作最主要的任務，使英雄人物的形象在整個社會主義文藝創作中占主要的位置，並使中間狀態人物的描寫能夠很好地為塑造英雄人物的形象服務。

邵荃麟同志用“寫中間人物”的錯誤主張，來反對塑造工農兵及其幹部的英雄形象，主要提出了如下的理由：第一，在人民群眾中，英雄人物是少數，“中間人物”是大多數，因此要大量描寫“中間人物”；第二，文藝創作要反映社會矛盾，而“矛盾往往集中在中間人物身上”，因此要集中筆力“寫中間人物”；第三，要用“中間人物”來教育“中間人物”。這些理由是根本站不住腳的。且不說邵荃麟同志的所謂“中間人物”根本不是占大多數的，即以真正屬於中間狀態的人物來說，儘管他們經常占有較多的數量，但文學藝術從來就不是按照某種統計的平均數來反映生活和構造形象的。文藝要正確反映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必須正確反映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鬥爭，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而鬥爭及其革命的發展，集中表現在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先進人物和英雄人物身上，表現在他們與形形色色的階級敵人、資產階級分子和資本主義勢力的鬥爭中，而不是集中在中間狀態人物的身上，更不是集中在所謂“中間人物”即政治上的中間派和動搖分子的身上。先進人物和英雄人物始終處在矛盾的主導方面，並決定着矛盾的發展方向，而不是所謂“中間人物”占據主要的方面。社會主義文藝要用先進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思想教育人民，先進的思想充分體現在英雄人物的身上，文藝主要通過英雄形象傳播先進思

想，教育人民。所謂用“中間人物”教育“中間人物”，實質上只能是鼓吹動搖，宣傳動搖而已。

當然，“寫中間人物”論的根本問題並不在於邵荃麟同志為這種反動的文艺主張所製造的這樣那样的理由是站不住腳的，而在於邵荃麟同志妄圖以“寫中間人物”的謬論，來否定塑造社會主義英雄形象的历史任務，使文艺背離我們偉大的時代，取消文艺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在於邵荃麟同志用資產階級修正主義所謂“寫小人物”的反動主張，來和塑造社會主義英雄形象的革命要求相對抗。

我們的時代是一個偉大的革命時代，是一個英雄輩出的時代。特別是通過群眾性學習毛主席著作的運動，通過學習雷鋒、王杰、焦裕祿的活動，先進人物英雄人物不斷地大量地湧現出來，一代共產主義新人正在成長，雷鋒、王杰、焦裕祿等同志，就是其中最優秀的代表者。這就是我們社會和我們時代的本質，這就是我們社會我們時代的特色。早在合作化階段，在談到合作化的帶頭人陳學孟時，毛主席就指出：“在中國，這類英雄人物何止成千上萬，可惜文學家們還沒有去找他們”。^①這清楚地說明，只有努力塑造英雄人物的形象，我們的文艺，才能表現我們偉大的現實，才能表現我們偉大的時代。毛主席在講到王國藩的“窮棒子社”時，強調地指出：“這就是我們整個國家的形象”^②。這裡充分表明了，先進的革命英雄形象，才具有時代的廣泛的代表性。講到河北省三戶貧農辦合作社的事跡時，毛主席又指出：“這個三戶貧農的合作社，幾個月以來，在全國農村中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大家都知道河北省有這麼一個了不起的英雄的合作社，給貧農壯了膽。”^③這裡又說明了，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從毛主席的這些指示中，我們可以深刻地体会到塑造英雄形象的重要意義。塑造工農兵及其幹部的英雄形象，是社會主義文艺創作的中心任務；工農兵及其幹部的英雄形象，必須在社會主義文艺創作中佔據主要的位置。這是我們社會主義社會的偉大現實決定了的，這是偉大的毛澤東時代決定了的，這是社會主義文艺為工農兵服務的性質決定了的，這是社會主義文艺用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思想教育人民的崇高任務決定了的，這是絕對不能動搖的。這是一個原則問題，方向問題。

既然塑造英雄形象是社會主義文艺的中心任務，既然英雄形象必須在社會主義文艺中佔據主要的位置，那麼，塑造中間狀態的人物，就正如塑造其他別的人物一樣，只能是一個附屬的任務，只能使之處於陪襯的地位。塑造中間狀態人物的形象，固然也是為了反映現實生活，而主要是為塑造好英雄人物形象服務的。塑造中間狀態人物的形象的主要目的，是要表現英雄人物密切聯繫群眾，善于用無產階級思想來團結教育群眾，並與群眾一道進行改造自然、改造社會的偉大鬥爭；同時，通過人物的先進狀態與中間狀

① 《〈合作化的帶頭人陳學孟〉一文按語》，載《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第544頁。

② 《〈書記動手，全黨辦社〉一文按語》，載《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第5頁。

③ 《〈五億農民的方向〉一文按語》，載《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第27頁。

态的对照，通过提高中間状态人物过程中的“兴无灭資”的斗争，也更有力地表现出英雄人物的先进性。凡是写中間状态人物写得比較成功的作品，无不体现出这样的原則，这样的指导思想。比如說，雷凱忠是主角，丁强是陪衬，写好丁强是为了写好雷凱忠；丁战是主角，何万里是陪衬，写好何万里是为了写好丁战；李双双是主角，喜旺是陪衬，写好喜旺是为了写好李双双；等等。

中間状态人物在整个文艺創作中的陪衬地位，并不排除个别作品以中間状态人物为主人公的可能性。但即使以中間状态人物为主人公，整个作品的画面，也应该让人们看到先进的东西始終是主流，是方向；帶有某些落后思想的中間状态的主人公，仍然是对整个光明面起陪衬的作用。例如不久以前上映的歌剧影片《煤店新工人》，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歌剧的主角是一个輕視服务性劳动的煤店新工人，但环绕着这个主人公，出现了热爱服务性劳动的經理、會計、老工人、同学，显示了社会主义的新风尚。主人公的某些落后思想沒有抹煞这种新风尚，倒是愈发衬托出它的伟大和崇高。

三

明确了中間状态人物的本质、特点，及其在文艺創作中所处的地位以后，还有一个怎样写的问题。

既然中間状态人物并不是动摇于社会主义与資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間的人物，并不是政治上的中間派，而不过是思想觉悟程度处于中間状态的人物，即革命群众中間还帶有某些落后思想因而觉悟程度还不够高的分子；那么，描写这样的人物，首先要从政治上肯定他們。例如歌剧《紅松店》，就提供了正面的經驗。剧中采购員那个角色，就是一个中間状态人物。他怕艰苦，看不起平凡的劳动，有一些落后思想；但他景仰革命的英雄人物，从本质來說，还是要求进步的。这样写来，就使人觉得可信，不会歪曲这种人物的形象。

从政治上肯定中間状态的人物，并不意味着抹煞这种人物的某些落后思想。如果以为中間状态人物与先进人物的差别，只是好与更好的差别，那就会陷入无冲突論的泥坑。而无冲突論則恰好是修正主义的溫床。先进人物团結提高中間状态人物的过程，就是帮助中間状态人物克服某些落后思想的过程。这是一个矛盾斗争的过程，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战胜資本主义思想的过程。我們的文学艺术，应该明确指出中間状态人物身上的落后思想；决不能象邵荃麟同志及其追随者那样，企图掩飾矛盾，抹煞斗争，說什么“不好不坏，亦好亦坏”，有意混淆无产阶級思想与非无产阶級思想的界綫，把非无产阶級思想說成是“芸芸众生”中“平平常常”的人之常情，大加欣賞与同情。

对于中間状态的人物，我們必須采取鮮明的态度。描写的时候首先要抓住本质和主流，对于人物的落后思想，应该写得恰如其分，而且目的是在于帮助他們克服缺点，更好地前进。象邵荃麟同志所主张的那样，拼命挖掘人物身上的落后的东西，加以夸大，有意地进行暴露，对于那些落后的东西，又采取同情、欣賞的态度，洋洋自得地玩賞一番，那是决然要不得的。那不是帮助而是暴露，那不是教育而是攻击。毛主席早已指

出：“人民大众也是有缺点的，这些缺点应当用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而进行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是文艺的最重要任务之一。但这不应该说什么‘暴露人民’。对于人民，基本上是一个教育和提高他们的问题。”^①是帮助还是暴露，根本问题在于作者的立场和思想感情，而体现在作品中，具体的标志：就是看这些落后的东西，是否写得恰如其分，使人明白这是前进中的缺点；是写成人物的全部思想性格的一个方面，一个次要的方面，还是拼命挖掘夸大，变成压倒一切的东西。邵荃麟同志及其追随者所津津乐道的“中间人物”，如赖大嫂和邵顺宝，显然就不只是有某些落后思想而已，他们简直就一无是处的。这些人物和《李双双》中的喜旺等塑造得比较成功的中间状态人物相比，是截然不同的。这种不同的根源，在于作家的立场和世界观。他们的区别就在于：“写中间人物”论者看不到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以贵族老爷式的悲天悯人、同情欣赏的态度，描写他们身上的缺点和落后思想；而正确地描写了中间状态人物的作品，在政治上对所描写的人物给予肯定，又对他们身上的缺点和落后思想，进行了必要的、恰如其分的批判。

我们的文学艺术描写中间状态人物，揭示了人物的某些落后思想以后，是否应该描写人物的转变呢？邵荃麟同志以“不能一下子解决”矛盾为名，强调可以不写转变，这也是完全错误的。我们的文艺创作既然写了中间状态的人物，既然已经揭示出了人物的某些落后思想，那么，一般来说，就应该写出人物的转变来。

文学艺术的特点是以个别反映一般。它只能描写广阔的现实生活的某一个方面，只能描写漫长的历史进程的某一个段落；但那应该是相对完整的一个方面，一个段落。这其实已经是文艺常识了。比如《英雄工兵》这个戏，就不能演到高翔被水冲走的地方停止；如果硬要在那个地方停下来，不但戏不完整，主题思想也变了；它就不再是一个歌颂工兵的革命英雄主义的戏，而会变成宣传失败主义的戏了。同样道理，写一个中间状态人物，揭示了人物的某些落后思想，不接下来写人物的转变，也就是不写先进人物对他的帮助教育，不写中间状态人物的自我思想斗争，实际上就要起宣扬落后思想的作用。这是涉及文艺用什么思想教育人们的大问题，不能等闲观之。

邵荃麟同志反对写中间状态人物的转变，主要理由是不能对思想改造的“长期性、艰苦性、复杂性”估计不足。我们承认思想改造的长期性、艰苦性、复杂性，我们也反对把人物的转变写得过分简单化；但我们要牢记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第一应当相信群众，第二应当相信党的领导。毛泽东同志非常清楚地指出：“我们一定要相信这样一点，即劳动人民中的缺点或者错误，是能够经过适当的政治工作使他们加以克服或者改正的。读者可以看到，这个乡经过政治工作，使那些做贩猪生意的社员不去贩猪了，使那些把公牛养瘦了的社员把牛养肥了。”^②落后分子都可以转变，何况中间状态人物呢！要从人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73页。

^② 《〈西乡县河坝乡党支部正确地领导了那里的互助合作〉一文按语》，载《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第1223页。

民群众头脑中彻底清除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和封建思想的残余，肯定是长期性的、艰苦的，但是在一段时间内，要帮助某一个人克服某一种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并不是办不到的。否则，我们的工作还有什么进展可言，人民群众的思想，还有什么提高可说。邵荃麟同志片面强调思想改造的什么“苦难的历程”，强调到似乎一个具体问题都很难解决的地步，实际上是对群众失去信心，对革命失去信心。如果按照邵荃麟同志的“理论”来描写中间状态人物，只提出问题，让观众自己去判断，其结果，一定要走到为写缺点而写缺点，走到暴露人民的死胡同。

×

×

×

总的来说，邵荃麟同志提出“写中间人物”的谬论，曾经把我们的文学艺术描写中间状态人物的问题搞混乱了；但通过批判他的错误观点，却反过来帮助我们澄清了问题。只要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跟邵荃麟同志的“写中间人物”的谬论正确地划清界线，我们的文艺家，当他们为了表现英雄人物的形象，为了反映实际生活的斗争，准备写中间状态人物的时候，就能够做到思想明确，大胆去写，而且有把握写好了。

蹲点通讯



和农民一起 学习毛主席著作

詹文豹 黄友林

我們沒有农村工作經驗，刚到广州市郊一个生产队蹲点时，工作遇到許多困难。经过半年多的探索，我們深深体会到，突出政治，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是做好一切工作的根本。半年多来，我們和农民兄弟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既提高了他們，也提高了我們自己，既改造了主观世界，也改造了客观世界。下面談談我們的一些体会。

“师生”結合，調查研究

毛主席經常教导我們：工作中必須要拜群众为师，必須要“眼睛向下”，老老实实当小学生。根据毛主席这个指示，我們認識到，在調查研究中不仅自己要动脑子，而且要充分发动群众，調查研究的过程，就是我們和群众一起商量問題、解決問題的过程。只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才能把調查研究搞深透，才能达到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目的。

我們蹲点的这个生产队，主要是种蔬菜，但蔬菜产量較低。原因是耕作技术落后，他們为了施肥淋水方便，把菜沟挖得又深又宽，有的沟比菜壟还大，施肥时弄条小船在沟內推来推去。沟宽了，土地利用率就不高，沟里灌了水，菜根就扎不深，一下雨菜叶就发黄，影响蔬菜的产量。另外，經營管理上也有不少問題。我們决心和群

众一道改变这种状况，采用潮汕的先进耕作經驗。但那种落后的耕种方法是祖宗多少代传下来的，要改掉它是不容易的。我們在調查中，这个說：“潮汕經驗好是好，就是要担肥挑水淋菜，那来这么多劳动力！”那个說：“我这个人就是怕担。”干脆不同意。这个队的劳动力少，确实是个問題，如果采用潮汕的耕作法，問題就会更加突出。但是我們又想，大寨式先进单位的群众敢于斗天斗地，把奇迹創造出来，难道这里連耕种方法也改不过来嗎？我們针对这个問題，首先在群众中宣传大寨式先进单位群众的斗天斗地的革命精神，和他們一起学习毛主席“有所发现，有作发明，有所創造，有所前进”的語录，使大家認識到“古老的工具，原来的种子，老祖宗的产量”不能适应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需要，树立起破保守思想的决心。然后再和老农、干部一起学习毛主席有关“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須向下作調查”，“沒有調查就沒有发言权”的語录，着重研究解决劳动力的問題。在学习討論中，我們不断向老农請教，同时启发他們回忆、总结以往的經驗。他們边学习边摆出了各种办法，如关于更合理地使用和調配劳动力的問題，縮短水源、粪池和菜地的距离問題，按耕种情况分批分期改良菜地，等等。接着，我們帶着这些意見和干部、老农一起到各块地上去实际勘

察。如为了縮短水源和菜地距离，需要在菜地附近挖些引水沟，由于老农对每块地的地势高低一清二楚，所以和他們一起制訂出来的引水规划，比較合乎实际，在短期內就见到了成效，其它改革也进行得比較順利，結果蔬菜收成提高了三成多。

在这个調查研究的学习和实践过程中，既教育了我們，也提高了群众。原来有些老农认为“老祖宗的方法也能增产”，现在认识到“有保守思想不能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懂得了要用“有所前进”的思想武装自己。原来有的干部认为“我在这里干了十几年了，情况了如指掌，还要搞什么調查研究呢！”现在懂得了不能满足于老經驗，要跟上社会主义新时代，就要重視調查研究。我們也有下面的两点体会：（一）群众是基本的实践者，他們在长期的实践中，不仅积累了丰富的感性知識，而且也有了一定的理性知識，他們的經驗是一切真知的源泉，要認真地做好調查研究，就必须虛心地認真地總結和学习他們的經驗。（二）在調查研究中也要強調发动群众，要群众和你一起动脑子，达到“师生”密切結合，才能把調查研究搞彻底。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須善于對他們做思想发动工作，使群众认识到搞生产就是干革命，把自己的生产、工作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設事业联系起来。

树立全局观点，摆正国家、 集体和个人的关系

今天的集体农民昨天还是小生产者，許多人在不同程度上还存在着小生产者的思想，有的人看問題往往从自己利益方面考虑得多些，对集体和国家的利益想得少

些。农村中經常可以碰到个人和集体关系中的許多具体問題，这些問題处理得好，可以提高农民的觉悟，促进集体經濟的发展，处理得不好，則会損害集体經濟的发展和壮大。我們在农村工作中体会到，要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的矛盾問題，最根本的是組織农民学习毛主席著作，教育农民懂得全局和局部的关系，摆正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間的关系，从社会主义立场去正确处理公私矛盾問題。

我們所在大队的社員，每戶养猪二点二头，但过去沒有圈猪的习惯，猪粪浪费很大，对增产增收很不利，环境卫生也大受影响。什么原因呢？有些社員說：“沒有材料修猪圈”。有的說：“猪在外面会长得更快。长一百斤肉，圈起来要十个月，放牧只需六个月。”有的还說：“猪在外面可吃些菜，省些飼料”。看来，圈猪問題解决得不好既有实际問題，也有思想認識上的問題。那个是主要的呢？我們作了分析比較，认为思想認識上的問題是主要的。我們着重抓了階級教育和集体主义教育，和农民一起学了毛主席关于全局和局部关系的論述，使大家知道了搞好圈猪积肥对发展生产的好处，懂得了“大鍋沒肉小碗空”，“大河有水小河滿”的道理，决心做一个社会主义时代的新型农民。社員的觉悟提高后，沒材料修猪圈的找到了材料，說“放猪长得快”的論調也听不到了。大家积极修栏圈猪，三个多月来，全队积肥近一千担。有了家肥和土杂肥，生产成本减少了，平均每戶每月增加五元左右的收入。还改良了土壤，为增产增收提供了一定的条件。社員的集体主义思想也有了进一步提高。

这个生动的事例启示我们：当前农村中每个细小的公私矛盾问题，都体现了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斗争。解决这个矛盾的根本方法，只能是用毛泽东思想挂帅，提高农民的集体主义思想觉悟，使农民懂得正确处理全局和局部的关系，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这不仅是个认识问题、方法问题，而且是个根本立场问题。社会主义集体农业经济内部的许多矛盾，都与“公”和“私”这个矛盾紧密联系着；所以必须抓住这个大量地存在着的社会主义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的矛盾斗争，不断用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农民的头脑，这样其它矛盾才比较容易解决。

学习一分为二的观点， 增强阶级团结

在农村经常遇到的另一个问题，是社员内部的团结问题。社员中有的人，常常从个人利益出发来看待一个人、一个干部，不懂得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一分为二的方法来看待人的问题，因而往往容易对一个人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造成不团结的现象。这种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在我们身上也有所反映。

生产队副队长李示恭，我们进村时就听见一部分社员说他对人态度不好，犯过一些错误，和社员的关系很紧张。从反映看来，这个人当干部的条件是不够的。由于有了这个先入为主的印象，我们和他谈起话来也不够投机。但有一次，连下三天大雨，小队鱼塘的鱼往塘外沟里跳。我们半夜去巡塘，黑暗中，看见一个人正来回在检查拦鱼的网，这个人就是李示恭。一位民兵说，李示恭为了保护塘鱼两三夜没

有合眼了。这件事使我们很受感动。李示恭这个人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我们立即深入了解他的情况。原来，李示恭是土改的根子，过去工作一向积极，一九五四年以来一直当干部。近几年因为孩子多了，老婆又生病，家庭生活困难，脾气越变越坏，工作方法简单化了，好几次伤了社员的感情，引起社员的不满。而且他有时私心过重了一点。但是，从总的看，李示恭当干部以来为贫下中农办了很多好事，在几次革命运动中立场坚定，敢于和破坏社会主义的言行进行坚决斗争，成绩是主要的。而且，和社员的一些争吵，也要作具体分析，有一些确实是他本人做错了的，有一些则是因某些社员有缺点，他看不惯而吵了起来的。吵的多了，给人留下一个不好的印象。经过调查研究后，我们想到了一个问题：必须和农民兄弟一起学习如何用阶级分析和一分为二的观点来对待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我们便和社员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有关语录。学习中联系这个干部的情况，使大家懂得什么叫做阶级分析，什么叫做一分为二；为什么看问题要阶级分析，为什么要一分为二。经过讨论，骨干和社员擦亮了眼睛，认识到“李示恭的问题主要是工作上的缺点；但他是我们贫下中农的阶级兄弟，应该耐心帮助和团结他。”有的社员还说：“房亲不如阶级亲，应该搞好贫下中农的团结。”通过讨论，社员在政治上大大提高一步。过去一些闹不团结的事也顺利地解决了。

这件事使我们也受到了一次深刻教育。我们对一个人的看法为什么会出现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的片面性呢？思想根源是什么？第一，对问题不是从实际出发，

進行調查研究。聽了一些反映，就把印象固定下來。這實際上是小資產階級的一種偏見。這種偏見往往和個人的好惡相聯系。李示恭因為對人態度冷淡，群眾對他又有不少意見，我們也就不願接近他，了解他，而輕易地給他做出結論。這實質上是一個態度問題。我們認識到，一個共產黨員對事物要用鼻子嗅一嗅，不要盲從。盲從，不問個為什麼，就會犯先入為主、印象主義、顛倒黑白的錯誤。第二，從方法上講，就是不懂得用階級分析、一分為二的方法。對一個人的評價，必須看到他原來是那個階級的，他的工作和思想主要是站在那個階級立場上，替那個階級服務的，成績和缺點比較那個是主要的，現在問題的性質怎樣。只有作全面分析，既看到他的長處，又看到短處；既看到優點，又看到缺點，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不能聽到一點風聲，一點表面的反映，就認為是本質的問題，而抱否定一切和肯定一切的态度。當然，農民也是有缺點的，農民出身的幹部，有的人也往往存在着較嚴重的自私思想。我們對待他們的態度，是要發揚他們的優點，幫助他們克服缺點，使他們能更好地為革命服務，而不是相反。

腦子裡有個“公”字， 才能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

農民兄弟能在革命實踐中很快學會用辯證法的觀點去看問題，一個根本的原因，是頭腦裡有個“公”字。“公”字樹立了，認識的方法問題也就好解決了。

開始，我們也曾試圖幫助社員學會用全局的觀點、一分為二的觀點去看問題。遇到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發生矛盾時，啟

發他們要從集體的需要出發進行處理。但有人卻說：“米缸滿的人才能講風格！”這件事啟示我們：看問題的方法問題，根本上是個世界觀問題。因此不久後我們就重視和農民一起學習“老三篇”。有什麼活思想，出現什麼問題，就到“老三篇”去找答案，邊學邊用。學習了《為人民服務》，就發動青年民兵帶頭做好事，做好事在青年民兵中掀起來後，我們又把這種精神提高到“一切工作都是為了革命”的高度上來，並推廣到社員群眾中去。女青年李金妹好事做得很多，但一次社員開會時，她卻一個人跑去拔小隊菜苗來種自留地，我們又組織學習“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明確了思想改造要長期地反復地進行，要不斷地把思想革命深化。一些青年民兵有了成績之後，就驕傲自滿起來，我們就組織他們學習工作要“精益求精”的思想，認識到“為人民服務”是無限的。通過反復學習，不斷改造世界觀，逐步樹立起為“公”的思想。

社員有了為“公”的思想，對事物的看法也就隨之變化了。過去有的人只看到個人利益、忽視集體利益的，由於有了為“公”的思想，知道了“做人不能光看到自己鼻子底下的事情，要看到集體和國家的利益”，過去對幹部、對別人看法片面的，現在懂得了“對一個人不能只看他一時一地的表現，要看他一貫的工作和思想”，“不能從對自己態度好壞來判斷一個人，要看他是否把革命集體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過去不敢展開批評的，現在認識到“批評不是為了個人，個人得失事小，集體得失事大。”思想水平大大提高了。

從這裡我們体会到，一個有很多私心

杂念的人是不可能掌握毛泽东思想的，所以在工作中一定要时时事事都突出政治，抓住帮助农民改造私有观念，树立为“公”的思想这个根本问题。毛主席说：“世界观的转变是根本的转变。”只要这个根本问题解决了，方法论的问题也就好办了。我们常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首先就是要在政治思想上进行建设，使农民摆脱几千年来小私有思想的枷锁。事实证明，农民为“公”的思想解决了，生产建设也就必然出现新的面貌。如过去有的青年出工时“屁股压个大算盘”，拣工分高的工种做，派上不中意的工作就和干部吵起来，出现

了所谓“吵架王”。有的社员在菜园中能拿的就拿，“只顾自己米缸满，那管他人饿肚肠！”现在，则是“好人好事处处有，爱护集体最光荣！”民兵为小队突击劳动不要工分。全排民兵四十人，几个月来利用中午和晚饭后休息时间，做了近五百个劳动日。挑了三千多担塘泥，修了三百多公尺水渠，割了五千多斤稻谷，种了三十多亩茄瓜。去年第四季度生产收入比上个季度提高了百分之三十以上。我们从这些社员身上，进一步看到了毛泽东思想的威力，更加提高了我们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自觉性。

史学工作者必须面向工农

余 炎 光

很多年来，关于史学工作的方向问题，一直被以吴晗同志为代表的一股反动史学思潮，搅得糊里糊涂。吴晗同志主张史学工作者脱离政治，脱离现实，钻到故纸堆中去，反对历史研究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这是一条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史学路线。

马克思主义史学不是私人科学，而只能是无产阶级总的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只能是由广大的工农群众掌握，作为兴无灭资的斗争武器。去年八月下乡以来，在革命实践过程中，我们越发感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客观实际情况是人们的最好的例证和

教材。旧社会剥夺了劳动人民掌握文化（也包括历史科学）的权利的痕迹，今天还没有完全清除。我们工作的地区是农村的一个小墟镇，这里有农民，也有手工业工人和小商贩。尽管我个人的接触面还不广，但也可以看出，他们的历史知识是很贫乏的，但又是非常渴望自己具有必要的历史科学知识。例如：这里不少人是抗日战争时期因国民党的大溃退而致家散人亡，迫得从新会、台山等地逃难来这个山区定居的。他们很想知道，日本帝国主义是怎样侵略中国的？为什么把他们弄到这样的地步？又如电影《东方红》最近在这里放映，确实是轰动一时，能看的人都去看

了，受到很大的教育。但在看这部电影之前，多数人（尤其是妇女）对于中国近百年来历史，就知道得很少很少，少数有点文化的人也很模糊。这种情况难道是正常的？难道可以说我们的历史科学已经是人民大众所掌握了的？

许多群众一方面缺乏科学的历史知识，而另一方面由于受旧小说、旧观念的影响，因此，有些人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却有着不少错误的看法。例如谈起关公来，即大赞他“义气”等等。事实表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科学，必须占领农村这个阵地。如果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科学不去占领，让那些陈旧的观点继续流传，只利于地主资产阶级的复辟活动。

所有这些活生生的事实，使我们思想开了窍：历史研究必须面向农村，为广大工农群众服务。

那么，究竟拿出什么样的成果来为工农群众服务呢？这就要求史学工作者到工农群众中去，大写劳动人民的历史，研究农民在封建统治下被压迫、被剥削的历史，研究农民的阶级斗争和农民起义、农民战争的历史，研究工农群众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被压迫被剥削的历史，研究他们的革命斗争史。一句话，必须大写四史。这样，才有利于鼓舞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才能发挥历史科学的战斗作用。

与此相反，吴晗同志认为：历史是帝王将相的历史，帝王将相“养”出了“天下安佚”的“光明时代”，农民起义是“黑暗时

代”，贫雇农“一辈子没有什么成就”，不应该写在历史上。这种资产阶级的史学观点，不仅受到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的反对，而且更将受到广大工农群众的坚决反对。

我们所在的这个小墟镇，过去是封建统治堡垒，居住小墟镇及邻近农村的地主很多，年收租谷五百担以上的大地主即有十数人，甚至有年收租谷三千担以上的。所以，群众谈起过去受压迫、受剥削的历史时横眉指发，列数封建地主阶级的腐朽和罪行，真是罄竹难书；而讲到解放后打倒地主分田地，镇压反动地主时则眉飞色舞，拍手称快！极力为帝王将相涂脂抹粉，为劳动人民脸上抹黑的吴晗同志，请下来听一听工农群众的意见吧！

我们认为，史学工作者要为工农服务，要写工农群众的历史，“就发生一个了解他们熟悉他们的问题。”同时，史学工作者又是教育者，“他们就有一个先受教育的任务。”因此，就必须到工农群众中去，向工农群众学习，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工厂和农村，实在是知识分子改造的最好学校；工人和农民，是知识分子在各方面的最好教师。

我们坚决反对吴晗同志的资产阶级史学路线。史学工作者必须面向工农，史学工作者必须到工农群众中去，向工农学习，为工农服务，写工农历史。

一九六六年三月于阳春

学术研究

一九六六年第三期（总第二十七期）五月五日出版

編輯者	学术研究編輯委员会
	广州越秀北路222号
出版者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刷者	广东新华印刷厂
发行处	广东省广州市邮局
訂购处	全国各地邮局

本刊代号：46—3 定价：每册 0.35 元
本刊每逢单月五日出版